

临沂城市名片

LINYICHENGSHIMINGPIAN

全国文明城市

东夷文化发祥地

战争年代华东暨山东解放区首府

全国双拥模范城市

中国优秀旅游城市

全国红色旅游重点城市

全国创建文明城市工作先进城市

全国社会治安综合治理优秀市

全国文化体制改革先进地区

中国市场名城

中国地热城

中国书法名城

国家园林城市

国家环保模范城市

国家卫生城市

图例

- 市 政 府
- 县(市、区)政府
- 乡、镇(街办)
- 铁 路
- 高速公路及道号
- 国道及道号
- 省 道
- 县 道
- 省 界
- 设 区 市 界
- 县(市、区)界



2012·07,4

主 办：临沂市地方史志办公室
 协 办：临沂市地方志学会
 临沂市望族文化研究会
 临沂大学沂蒙文化研究院

编委主任：赵爱华

编委委员：徐福田 李克彬 秦鸿伟
 何相军 尹云川 王长利
 赵宗远 康德忠 刘兆东
 李凤军 王泽远 孙建中
 李延杰 曲文军 王纪明
 呼国英 高 雷 胡拙安
 王稼玉 尹传贵 王士岭
 顾怀亮 杨沂成 卢廷运
 李忠山 董保东 韦瑞芳
 朱海涛 王瑞柱 伊永航
 杨兴文

主 编：朱海涛
 副 主 编：曲文军 刘兆东 王纪明
 呼国英 高 雷

本期执行主编：呼国英

责任编辑：杜 帅 贾 梦

美术编辑：胡拙安 宋夏娟 周轩正

编辑出版：《沂蒙史志》编辑部

刊 号：鲁连内资（2011）第Q1023号

地 址：临沂市北城新区
 天元商务大厦634室

邮 编：276000

电 话：0539-8727560

邮 箱：yimengshizhi@163.com
 szbyw2010@126.com

博 客：yimengshizhi.blog.163.com
 blog.sina.com.cn/u/1914056311

网 址：http://www.linyisq.gov.cn
 《沂蒙史志》栏目

印 刷：临沂玉峰印刷有限公司

目 录

【本期特载】

张云逸在山东的岁月 初学者好吧 04

【峥嵘岁月】

忆符竹庭同志 方 晓 08

“你是灯塔”——忆沙洪、久鸣 王 滨 12

“北豹窝战斗十三勇士” 王 文 14

国共合作史上的共同抗日范例
——王家庄子战斗 李亮亭 李祥瑞 17

【文化掇英】

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
苍山泥塑：万象奇态手底来 张铁民 20

【蒙山沂水】

大范庄遗址与蛋壳陶杯 徐淑彬 徐 宁 24

【古城旧事】

老城夜话（连载） 刘家骥 27

刘氏献宝记 寇玉坤 32

【诗画赏析】

左宝贵书法艺术初探 徐 斌 34

览蒙山胜境 抒诗家情怀
——《沂蒙诗话》之七（续二） 李兴河 38

【探索发现】

孝悌临沂——《二十四孝》探源之四 大荒堂主 43

【名人素描】

	忆民间针灸大师钱士芳先生	奕 垚	45
【沂蒙名医】			
	华丽舞步——记马颖霞	惠东波	47
【史料辑存】			
	1916—1949：临沂早期的报纸（下） 呼国英	刘金柱	52
【百家渊流】			
	东海郑徐氏	唐士文	58
【文史论坛】			
	沂水纪王崮春秋墓主初探	李 泮	71
【影像沂蒙】			
	攻克莒县	本 编	76
【沂蒙乡亲】			
	“体育歌后”韦唯	石 头	78
【史志动态】			80

封面：二十四孝图之“戏彩娱亲” 绘画/陈少梅（清）

封底：书法/胡石



本刊声明

凡本刊发表的文字、图片，均视为双方自动接受如下约定：

1、本刊刊载的文字、图片，未经许可，不得转载。来稿不查不退，请作者自留底稿，两个月未采用者可另作处理；请勿一稿多投。

2、作者文责自负，若侵犯他人权益，本刊概不承担连带责任。本刊发表的文字、图片，即拥有在“临沂市情网”和本刊主办单位编印的出版物及资料上转载的权利。

张云逸在山东的岁月

初学者好吧

抗战胜利后，中共中央为实现“向北发展，向南防御”和“夺取东北，巩固华北、华中”的战略方针，指示华中新四军调8万兵力到山东、冀东。根据中共中央指示，1945年10月，张云逸率领华中局及新四军军部北移山东临沂。12月15日，中共中央书记处电示批准，由陈毅、饶漱石、张云逸、黎玉、舒同5人组成华东局常委，饶漱石任书记，陈毅、黎玉任副书记。1946年1月7日，中央军委决定，新四军军部和山东军区合并，统一指挥山东和华中部队，陈毅为新四军军长兼山东军区司令员，张云逸为副军长兼山东军区副司令员。陈毅于1945年秋从延安回到山东，即亲赴前线指挥，组织从徐州到济南津浦路沿线的战斗，直至国共双方签订停战协定后的第二天即1946年1月11日，才回到临沂。在这期间，张云逸在临沂主持军部和军区工作，为调整、组建部队做了许多工作。

1946年2月，张云逸去延安，三四月间从延安带一些干部回到山东。这时，他一面揭露国民党破坏和平谈判和停战协议、发动内战的阴谋；一面领导华东军民开展减租、生产和练兵运动。为了做好自卫战争的准备，华东局和山东军区决定开展百日练兵运动。张云逸在给部队作报告和为《大众日报》写的《全军加紧训练，迎接整编任务》专论中，强调这次练兵运动的内容，应当是七分政治，三分军事；提高思想认识；整理组织机构；整顿部队军容。经过百日练兵运动，全军提高了对当时形势发展的认识，增强了全军上下团结，并使党外民主人士认识到新四军真正是为和平民主而斗争的军队。百日练兵结束后，针对国民党正准备发动全面内战的形势，张云逸同华东局的领导人，又于1946年5月29日再次发出练兵工作的指示。指示提出练兵教育的内容，应以练射击、刺杀、投弹等三大技术为主，并辅以必要的土工作业、爆破作业；加强防空与反坦克、防炮的教育。强调搞好练兵是决定战争胜败的重要因素，应当把练兵工作看做目前部队的中心任务之一，要再次掀起备战热潮。

1946年6月，全面内战爆发。陈毅主要是在前方指挥作战，军区的军事工作主要由张云逸主持。这期间，他领导了山东军民配合野战部队进行的自卫战争。6月21日，国民党第五十四军由青岛沿胶济路向西进攻，先后占即墨、南泉等地。7月5日，国民党军又开始从济南沿胶济线东犯，先后占济阳、邹平、周村、淄博、张店、金岭镇等地，企图与青岛西进之国民党军打通胶济铁



张云逸

路。张云逸同黎玉等根据当时形势和敌我力量对比，于7月26日发出指示，要求各军区与国民党军做长期纠缠斗争，牵制国民党军；以地方武装同民兵结合开展游击战争，迷惑、消耗敌人，寻求敌之弱点，然后集中主力歼灭其一部，积小胜为大胜，并配合野战军的南线作战。8月27日，张云逸等又指示胶济线上各兵团，应各自集中主力寻找敌较弱的一点或数点坚决打击消灭之，胶东兵团应集中优势兵力有重点地打击国民党军第五十四军西进部队，歼灭其一路或一部；鲁中渤海兵团及地方部队，须在胶济西段积极向国民党军第七十三军、第八军之侧后不断打击，以牵制其不能东犯，配合胶东兵团作战；各地方武装、民兵则应广泛发动游击战争及地雷战，有力地配合主力作战。根据这些指示，山东军区部队经过两个月在胶济西段连续阻袭及反击敌人，歼灭了国民党军第七十三军、第九十六军等部7300余人；在胶济东段的胶县、高密等地也给国民党军第五十四军等部以重大杀伤，使国民党军企图在半个月内打通胶济线的阴谋完全破产。

当得知国民党军正部署向胶东北部进攻、企图切断山东解放区与东北海上联系时，张云逸同黎玉等于1946年10月31日发出指示，要求胶东各地党、政、军、民紧急动员起来，充分备战，以迎接和粉碎国民党军的进攻。指示还要求加紧主力部队的整训，总结集中主力歼敌之一路的经验；加强地方武装游击队、武工队、民兵之组织配备，作为就地展开游击战、地雷战的准备。10月下旬，国民党军第八军、第五十四军共6个师的兵力，开始向胶东北部地区进攻。张云逸组织胶东军区、鲁中军区部队于11月1日发起平（度）安（邱）战役。他首先组织部队实施顽强阻击，而后抓住战机实施反击。参战部队在胶东地方党政机关和广大群众密切配合下，时而阻击，时而视机反击，不断给国民党军以重大杀伤。此役历时约半月，取得了歼敌1.5万余人的胜利，粉碎了国民党军切断胶东与东北海上联系的计划。

张云逸在主持山东军区军事工作期间，对于组织和建立地方武装极为重视，并做了许多工作。1946年下半年，他在一次会议上作了《关于组织地方武装应注意的几个问题》的发言，专门阐述了建立地方武装的重要意义以及在组织地方武装中应注意的问题。他指出，在蒋介石反动派集中全力向解放区进攻，我们需要集中主力机动作战的情况下，如果没有坚强的地方武装配合，要取得胜利是极端困难的。张云逸还就建立地方武装要保证党的领导、地方武装干部的配备和培养、地方武装成分的纯洁和新老成分的调剂、武器和火力的配备、地方武装的供给以及政治、军事的训练等问题做了具体的安排和布置。在张云逸的领导下，山东的地方武装得到了广泛的发展，发挥了重大的作用。

为了适应形势发展的需要，1946年12月25日，中共中央决定华中分局与华东局、华中军区与山东军区、华中野战军与山东野战军机关合并，使华中与山东的领导力量得以统一。1947年1月，中共中央决定取消新四军番号，分别成立华东军区及华东野战军。陈毅、粟裕分别为华东野战军正副司令员；陈毅、张云逸分别为华东军区正副司令员。华东军区的军事工作主要仍由张云逸主持。同时，张云逸兼任华东军政大学校长。

在1947年2月进行的莱芜战役中，张云逸等领导组建起来的地方武装起了重要作用。当国民党军以8个师分3路北犯临沂，北线李仙洲集团3个军南下新泰、莱芜策应，企图与华东野战军主力在沂蒙山区决战时，华东野战军主力为了北上莱芜歼灭李仙洲集团，在南线则以一部阻袭敌人，主动于2月25日撤出临沂城。张云逸领导各地方武装，以积极行动向胶济线展开破袭战，一夜之间将坊子至兰村200余里的铁路完全破坏。莱芜县委组织了10万余民兵，对铁路连续7夜大破袭，完全切断了国民党军的交通，为主力部队分割歼敌创造了条件。战斗打响后，各地组织的120个子弟兵团，村村布雷，日夜袭击国民党军。鲁中警卫第五团在配合歼击国民党军第七十三军之第三十七师战斗中，将该师师长击毙，俘敌及缴获也不少。

其他地方武装在配合主力作战中也取得很大胜利。



张云逸（左）与
罗炳辉（右）将
军在临沂

1947年4月，国民党军开始对山东解放区进行重点进攻。张云逸组织、指挥地方部队坚持斗争，避免了损失，赢得了胜利。8月，华东野战军挺进鲁西南地区向国民党军进攻，开始了外线作战。此时虽然民兵、地方武装进行分散的群众性的游击战争大大减少了，但张云逸对地方武装和民兵自卫队的建设仍然十分重视。1948年7月6日，他在华东局高干会议上提出的《山东人民武装今后工作的意见》中就明确指出：解放区的民兵自卫队不是可以不再加强领导，不再加强建设，甚至可以取消了。相反还要努力广泛地建设民兵自卫队武装，扩大充实其组织，加强其训练，增加其质量与数量。只有这样，才能作为警备力量巩固后方民主政权，才能在边沿区坚持游击战争，保卫人民，才能在后方防止和镇压地主阶级的反抗，保护农民的土地改革，同时支持人民解放战争。他还阐述了民兵自卫队是劳武结合的人民武装的性质，提出了普遍发展民兵，使之成为国民后备兵的民兵发展方向。

1947年8月初，为便于支持主力作战，华东局和华东军区机关由张云逸、邓子恢率领转移到渤海惠民地区，组成华东后方工作委员会，张云逸为书记。1947年下半年，华东解放区的财政经济出现了困难。华东局工委召开了高干会议，通过了关于“精简编制”、规定“供给标准”、“清理资财”三大方案，以克服财政的暂时困难。张云逸在这次会议上作了《坚决反对山头主义、本位主义与贪污浪费》的发言，指出：必须在部队中、共产党员中，深入进行教育，使每个指战员、共产党员懂得党和阶级的利益高于一切，个人和少数人的利益要服从党和阶级利益，懂得人民军队是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不是为个人或少数人服务，才能彻底执行会议通过的三大方案，克服暂时的财政困难，支援战争，夺取战争的胜利。

在贯彻执行三大方案、克服财政困难、支援战争中，张云逸同邓子恢、曾山等带头把自己的小厨房取消了，同大家一起吃大灶。由于他们在后方的出色工作，依靠党政军民的共同努力，在困难的条件下，仍然保证了对前方的后勤支援。在三年解放战争中，山东人民有700多万人参加了支前工作，将8.5亿多斤粮食及巨量的作战物资运到前方。1947年秋，为解决解放军转入外线作战部队的冬装问题，惠民地区的党和政府发动群众，全力以赴，组织人员调集布匹、棉花和生产工具，日夜赶制。只用了不到两个月的时间，就提前完成了赶做棉衣的任务。在整个淮海战役中，山东解放区每天平均运出原粮300万斤，在各解放区支援前线的4.5亿斤粮食中，山东就占了2.3亿斤。淮海战役后，

为支援解放军渡江南进，张云逸主持军区后勤工作，在1949年1月初就提出了对前方需要的兵员、弹药、被服、粮食、现金、医药、电讯器材、运输工具等必须抓紧时间及早做准备。对于所缺物资，又提出了清理仓库、加紧生产、尽力采购、厉行节约等办法加以解决。解放军在渡江南下时，山东人民“推着小车”，载着支前物资下江南，为渡江战役，以及解放南京、上海作出了巨大贡献。

张云逸对拥军优抚工作十分重视。为了加强荣军工作的领导，成立了华东荣军管理委员会，张云逸任管委会主任委员。在1947年4月16日的第一次管委会上，做出了统一和加强荣军工作的决定，采取了建立荣军学校、规定伤残荣军的分类及复员安置生活待遇等措施，并切实加以贯彻落实。这对于鼓舞前方将士、安定后方工作起了积极作用。

1948年1月24日，张云逸在渤海军区政工会议上作了《目前建军中几个基本要求》的报告，针对当时解放军存在的各种问题，提出了军队建设的基本要求：要保证党在军队中的绝对领导；认识目前政治任务；保持无产阶级思想的纯洁性，在组织上要有明确的阶级路线，防止阶级异己分子混入；加强铁的纪律，发扬民主作风等。随后，根据中共中央关于开展新式整军运动的指示，他又组织领导山东各地方军区进行“三查三整”，提高了干部战士的觉悟，增强了军队的政治素质。

在军事建设上，张云逸除了注意战略战术、军事技术外，还重视建设新的技术兵种。1946年，在研究山东军政干校的教学方针时，张云逸提出要建立特种兵。根据当时的需要和可能，他特别提出要建立炮兵，要训练炮兵干部，在军政干校中要成立炮兵大队。鲁南战役后，缴获了不少坦克、大炮，在张云逸的提议和其他领导人的积极支持下，成立了特种纵队。张云逸还十分重视军队干部队伍的培养提高，他亲自担任山东军政干部学校校长兼政治委员，后为华东军政大学校长兼政治委员，培养了大批军政干部，解决了军政建设中干部的急需。

1948年11月1日，中共中央军委颁发了全军整编命令，华东野战部队整编为华东野战军（1949年1月15日又改称为第三野战军），同时按地区建立各级军区，华东军区为一级军区，下辖山东军区等二级军区。张云逸任华东军区副司令员兼山东军区司令员，继续在后方主持华东军区和山东军区的军事工作。

1949年3月，张云逸赴河北平山西柏坡，参加中共七届二中全会。会后，他返回驻地，主持召开了山东军区会议，作出了关于建军、治安、生产、支前等工作的指示，并在4月2日举行的山东军区正式成立大会上传达了这些指示。

建国前夕，张云逸离开了山东赴华南任职。1949年9月22日，中共中央决定张云逸任中共中央华南分局第二书记，并担任中共广西省委书记兼省政府主席。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会议上，张云逸被选为政协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委员、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委员。10月19日，张云逸又被任命为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

忆符竹庭同志

方 晓



符竹庭同志为人民战斗牺牲已40周年了。每想到他，我们就有无限的感慨、怀念和惋惜。竹庭同志是党培育的优秀儿子，忠贞的无产阶级革命战士，是我军一位军政兼优的高级将领。

1940年底教导二旅在鲁南组建时，符竹庭同志由一一五师教导三旅调到教导二旅任政治委员兼鲁南区党委书记。1943年初，一一五师所属教导旅的番号撤销，滨海军区组建，他继任滨海军区政治委员兼滨海区党委书记。是年11月26日敌人奔袭赣榆县吴山地区马家旦头时，竹庭同志壮烈殉国，年仅31岁。

我与竹庭同志朝夕共处三年多，我是他的一个参谋，他的一举一动给我很大的感染力，我始终不会忘怀。现就他三年中所组织指挥过的重大战役、战斗，作些片断回忆，以便学习他的英勇业绩，激励我们前进。

1941年初，教导二旅在鲁南刚组建不久，部队生活非常艰苦，吃上顿没下顿，连队所发生的夜盲现象约占15%—20%。为了摆脱这种窘境，适当分散兵力，寻机歼敌，发动群众，渡过难关，决定教导二旅东进滨海，向南海岸敌薄弱部分进击。3月初，符竹庭同志率四、六团离开鲁南山区，直下郯、马，迅即挥师东进，夜渡沂沭河，挺近临赣边（朱范、徐班庄、城头、刘福村东西一线）。稍作整顿，由山纵二旅配合，3月24日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对青口展开了强大的攻势，激战两昼夜，攻克了赣榆县城，全歼伪第三团孙谦昭部，毙俘伪军1500余人，缴获甚众，收复了七

个伪据点。并对新浦援敌给予重大杀伤，大杀了日伪守敌的威风。

青口战役后至10月份，我教导二旅在符竹庭同志领导指挥下，又先后在鲁南和滨海轮番发起了三次讨顽剿匪战役。

五十七军一一二师霍守义、荣子恒部驻费县以南山崮口驼阳地区，切断我们的东西交通线，对我威胁很大。为了改变这种被钳制封锁的局面，1941年5月我军派曾国华旅长率四、五两团配合地方武装，对敌顽发起进攻，激战三日，歼敌一部，其余带着创伤，溃退至崮口山区，从而解除了敌对我东西交通的控制局面。

1941年8月，符竹庭同志又亲率六团和四团的一、三营，向日照甲子山区顽五十七军一一一师孙焕彩部发起讨顽战役，收复了甲子山区，毙俘顽300余人，余敌狼狈逃遁到日莒公路以北的山区去了。

战斗之前六团还住在赣榆，时值炎日盛夏，又下着滂沱大雨，长途奔袭非常艰苦，能否按时到达参战，大家有些担心。山东分局书记朱瑞同志亲自作了战斗动员，他说：“六团是一支战无不胜，攻无不克，具有革命光荣斗争历史的部队，我熟知你们的战斗力和战斗作风……”他铿锵有力的动员，鼓舞了全团士气，大家表示：天下刀子，也要按时到达。这次战役，参战部队士气都很高昂，全部按时到达，准时发起攻击。冲锋号一响，我六团健儿如猛虎扑羊似的直奔向甲子山巅，杀声和枪炮声交织在一起，硝烟滚滚，随风游荡，一营主攻，三营侧击，四团也同时冲锋，激战两小时，全部攻下了敌山顶阵地，控制了甲子山巅。真是“一览众山小”，山下敌之全部村落阵地均在我火力封锁之下。符竹庭同志和我们参谋人员随四团之后，不顾枪林弹雨，在距敌400米之地亲自指挥。我们很担心他的安全，他倒反问我们，你们看我们的战士多么英勇啊！这个可歌可泣的战斗画面，至今仍浮现在我的面前。

1941年9月下旬，符竹庭同志又率四团返回郯、马，组织了剿匪战役。惯匪刘桂堂盘踞于平邑县以南地区，为虎作伥，对我以陶峪、郑城、常庄为中心的根据地，不断进犯，实施蚕食政策，对我威胁甚大，为此组织了这次剿匪战役。竹庭同志率五团和四团两个营配合地方武装给匪以严重的打击，激战三日，歼匪一部，收复匪占村庄十余处，余匪跑到锅泉托车沟以南去了。

一年中，我以主攻之势连续发动了四次战役，都是在极端困难的情况下进行的。六渡沂沭河，往来于鲁南滨海之间，实处于两面作战态势，兵力分散，八面应付，直到11月初，上级才决定教导二旅主力（四、六团）集中于滨海地区，进驻临（沭）赣（榆）边陈巡会、大兴镇、蛟龙汪、朱范、徐班庄、欢墩埠一带，方结束了这一东西两面作战的局面。

1942年在滨海地区又进行了三次较大的战役、战斗：8月下旬讨伐日照伪军李永平；九月第二次甲子山讨顽五十七军；11月海陵反蚕食战役，三次战役皆以胜利而告捷。

日照伪军李永平部，盘踞于日照城东北泊儿口一带，为敌驱使，反共坚决。为了开辟滨海沿海地区，必须给该敌以有力的打击。8月下旬符竹庭同志率六团和四团一部盛暑远征，穿越日莒、日诸公路敌封锁线，自滨南向滨北挺进300余里，以奔袭挖心战术，展开对李伪的攻击。我六团首战泊儿以西据点攒牛场，毙俘敌180余人。四团攻占凤凰山亦有斩获。这次长途奔袭，以迅雷不及掩耳的挖心战术有力的教训了敌人，同时也锻炼了自己。致敌伪长期蜷曲于濒海一隅，苟延残喘，不敢妄动。

1942年9月组织了第二次甲子山讨顽战役。顽五十七军一一一师孙焕彩部，在第一次甲子山战役被我击溃驱至滨北后，是年末又卷土南来，甲子山区人民又陷入水深火热中。我陈、罗、肖首长指示我们，决定再给该顽以有力打击，以示惩罚。为了集中兵力歼敌，除教导二旅四、六团参战外，又将苏北（沭阳、海州、灌云）的教导五旅（旅长梁兴初）率十三团（团长江拥辉）调回滨海归建参战。这是我一一五师自1939年6月入鲁后第一次集中三个主力团（四、六、十三）于一地作战。



左起：徐向前、符竹庭、宋任穷、萧华

顽敌盘踞在甲子山前，以刘家东山、纸房、李家彩、石扬、朱楼为中心，组成坚固的村落防卫阵地，对四周高山（甲子山）高地没有坚固设防，只派出警戒监视部队，与第一次战役设防不同。上级决定六团和十三团分别担任刘家东山、纸房两地的攻击，四团为预备队。十三团攻击刘家东山敌师部驻地，战斗打得十分激烈。三日来与敌进行了反复冲杀，乃因十三团不习惯山地作战，伤亡较大，一营营长卢迪同志光荣牺牲。六团对纸房之敌发起四次攻击，打得也很棘手。此时，顽敌欺我炮火不足，负隅顽抗，拼命挣扎，战场出现了胶着局面。政委罗荣桓亲自作战地动员，符竹庭同志也亲自到六团前沿阵地观察。决定采用近迫作战的方法围而歼之。时值秋雨连绵，顽敌被我围困得人困马乏，饥寒交迫，不到一周时间就狼奔豕突。是役毙俘敌800余人，缴获甚众，甲子山区再度收复。

1941年11月我又发起海陵反蚕食战役。叛逆杨步仁，1941年夏叛逃至新浦投敌，为敌鹰犬，狡猾阴险，经常带领特务向我赣南墩尚一带窜犯。后来敌人又委任杨逆为别动军司令，纠集伪、特、反、坏武装500余人，以海陵县董马庄为巢穴，以牛山火车站为依托，疯狂向我海陵南部蚕食推进。不到两个月时间，以横沟罗庄为中心，一气安设了六七个据点，气焰十分嚣张，对我危害很大。为贯彻罗荣桓政委所提的“翻边战术”，竹庭同志亲自率领四团和六团一部，展开对杨逆的进攻，在短短的一周之内，悉数拔除所设据点，毙俘敌300余人，杨逆率残部遁逃新浦。而后便投靠了伪匪李亚蕃。

1943年3月，为了实施党的一元化领导，教导二旅和山纵二旅番号撤销，成立滨海军区，司令员由一一五师参谋长陈士榘同志担任，符竹庭同志任政治委员兼滨海军区党委书记。这样指挥起来就更加得力了。

为了不失时机地消灭敌人，符竹庭同志趁着过春节敌人不备之际，率四团和六团三营轻装奔袭郟城，一举攻下，毙伤日伪军400余名，俘日军7名，缴获甚众。不待敌人出援，我迅即撤回临沭根据地，借祝郟城大捷，军民一起过了一个愉快的新春佳节。

赣榆战役是以奇袭（奔袭）方式夺得胜利的典型，以极小的代价，换取了另一个大的胜利。是役全歼伪三十六师七十一旅李亚蕃部1800余人，又在扩张战果中收复敌沿海据点七

处。这次战役详情已由解放军总政治部联络部杨思德同志撰写了回忆录，我仅对符竹庭同志在赣榆战役中英勇指挥的事迹补充一些没有说到的情况。

1943年11月19日发起赣榆战役。是日下午16时，符竹庭同志由军区策马到达六团驻地土城西北一带，了解情况，给部队作战斗动员，决定六团担负攻城任务，一营搞突击，战斗英雄何万祥带二连突击城门。黄昏后，部队疾速行军挺近赣榆，命令规定，保持肃静隐蔽，逢村绕道通过，丝毫不让敌人发觉。月光朦胧，朔风轻吹，大地呈现着一片苍茫景色，夜是宁静的，只听远处村庄有几声犬吠。部队行走如飞，只听到部队嚓嚓的脚步声，一村村闪闪而过。初冬的天气带着浓厚的寒意，但都被战士们身心沸腾的热气所消逝。符政委从后赶来，追上先头二连，和何万祥讲这次战役的意义，奇袭、强攻的方法……只讲得何万祥发出噓噓笑声，并用浓厚的甘肃口音回答说：“听清楚了，保证完成，请首长放心。”他一路随部队急行了30里，由城北绕到城的东北门，距城门两百米处停了下来，卧倒，屏着喘息，静待先头小组骗取城门。这时城楼上下的问答声听得一清二楚。片刻，火光一闪，这是骗门成功的信号，二连不待命令，一跃飞奔突进城门，占了城楼。接着突击一营迅疾地涌到城里，在竹庭同志和团长贺东生的指挥下，开展了激烈的巷战，翌日（20日）14时全歼守敌，赣榆城攻克了。赣榆战役胜利结束后，六团随军区机关至吴山以西的黑林大叔地带进行休整。这时海赣之敌伪又纠集了1800余人，对我实施报复性扫荡，轻装奔袭，行动诡诈，但在我有力的阻击下，节节溃退。孰料对进犯柘汪之战疏忽了，致敌趁夜奔袭了我驻地马家旦头。就在这次战斗中，我们崇拜的年轻的指挥员符竹庭同志，不幸壮烈牺牲。他的牺牲对党对人民都是不可弥补的损失。黄土无情埋忠骨，滨海人民思亲人，全区军民闻之挥泪悼念，沉痛万分。

竹庭同志在滨海地区战斗了三年，战果辉煌，功勋卓越。从1941年开始他以滨南为主要根据地，经过三年军事斗争的胜利，发展了滨中，开展了滨北，扩大了我根据地范围。西起沂沭河与鲁南相接，南至陇海铁路与海、沐、灌，南北联成了一片，濒海一线的重要海口，岚山头、柘汪、海头等地，基本为我控制。日寇长期以来企图打通海（州）青（岛）公路的美梦，始终未能得逞。

竹庭同志不仅是一名优秀的指挥员，也是一位卓越的政治家。在频繁的战斗空隙里，他及时提出发展生产，保证供给，在洙边、十字路、大店、黑林一带开荒种地，开设作坊，办起了军械、被服、医药、修理等生产服务部门，为保证军队供给提供了物资条件。与此同时，他还提出：“靠山吃山，靠海吃海”的口号，利用当地物资，渔、盐业等，组织工、农、商等生产自救，改善了人民生活。

竹庭同志的短短一生，为党为人民做了大量的工作，对党、对人民作出了极大贡献，人民是永远忘不了的。他的革命精神和革命业绩如日月同辉，海山有光，永垂青史。

写于1983年11月

“你是灯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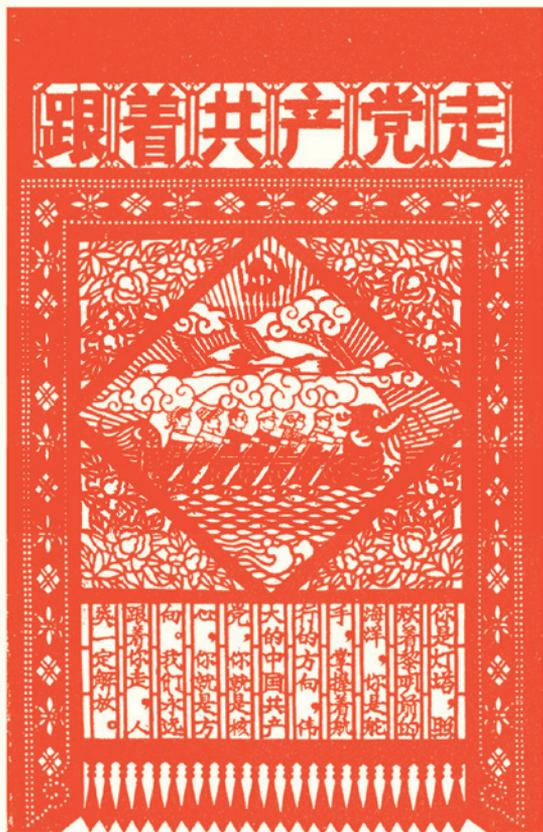
——忆沙洪、久鸣

王滨



老战友老搭档沙洪（左）和久鸣在一起

抗日战争时期，是中国新音乐运动最活跃的年代，以《义勇军进行曲》为代表的救亡歌曲起到了唤醒军民的巨大作用。在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敌后各抗日根据地，在八路军、新四军中，也出现了一大批优秀歌曲。其中经典革命历史歌曲《跟着共产党走》，又名《你是灯塔》这支歌，就是沙洪、久鸣同志于1940年“七一”前夕，在山东抗日根据地沂南县孙祖镇东高庄村抗大一分校驻地创作的。当时，文工团党支部书记史屏、文工团团团长袁成隆为向抗大一分校党代会和纪念建党19周年献礼，组织、创作了这首歌曲。这首歌由年仅20岁的沙洪作词，22岁风华正茂的久鸣（原名王岳，曾任河南省音协副主席）谱曲。歌词把党比作灯塔、舵手、核心、方向。结尾满怀信心地唱到：“我们永远跟着你走，人类一定解放！”坚定而奔放的旋律，完美地展现了歌词的形象及其丰富的内涵，充分表达了人民的心声。1987年2月25日，徐向前元帅为其题辞：“动地军歌唱凯旋。”久鸣同志在他著的《老战士的歌》后记中写道：“当日本侵略军的飞机在上海倾泄成千上万颗炸弹时，热血方刚的我，投奔延安进抗大，后在延安鲁艺进行了短暂的却是终生有益的学习。在那战争年代里，我用‘1234567’作武器，用歌声呼唤人民和战士，鼓舞他们的斗志，歌颂我们的共产党。”鲁艺音乐系主任、中国音协名誉主席吕冀同志，在久鸣这本歌选的序言中说：“久鸣同志这些歌，的确不是出于偶然的冲动，而是他参加革命战争、建设事业的产物。特别在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剧烈的斗争生活中，他和词作者同样受到感动和教育，使他们要把人民的苦难和希望歌唱出来，以鼓舞人民和他们自己进行顽强的斗争，他们所创作的歌曲，真实的反映了人民的斗争，对



于胜利的呼唤，所以受到广大人民的欢迎，并一年一年地传唱下来。”久鸣对歌词有着很强的理解力，又有着很强的表现力。他用丰富的音乐语言，又用熟练的技巧组成完美的曲调。他作的曲人人都爱听，是人民大众的声音。此歌从上世纪40年代写成并在全国广泛传唱。然而，50年代却遭到“禁唱”的厄运。这首优秀的革命历史歌曲，经受了时代的考验，1980年成为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文化部向全军推荐的十二首歌曲之一。战斗的号角再一次响彻祖国大地。

沙洪和久鸣从延安到太行山区、晋东南和山东沂蒙山、滨海区抗日根据地，一直是歌曲创作的老搭档。他们合作的歌曲还有《今年要报仇》、《放夜哨》、《空舍清野》、《打游击》及《抗战三周年》等。这些歌曲短小精悍，易学易唱，能够深入到千家万户。

《晨歌》是沙洪和久鸣在中断合作40年之后的1981年再次合作的一首歌曲。接着他们又创作了《祖国》、《颂歌》、《心声》、《您好》、《难忘的友情》和《沂蒙母亲》等。同时，沙洪又与著名作曲家时乐濛、陆祖龙、黄庆和等合作了《迎接新世纪》、《朝阳和夕阳》、《为了未来》等歌曲。沙洪作为一位长期从事党的组织、宣传工作的干部，利用工作之余，以旺盛的革命热情，创作了大量的歌曲。

2002年8月，中国对外友协会会长陈昊苏同志看了《永远的歌声》给笔者来信，热情称赞“歌曲的两位作者是令人尊敬的革命文艺战士，经历了严峻的考验，向党和人民证明了自己的忠诚，这首反映人民心声的歌，终于被历史认定为时代前进的号角，我想这是对两位作者的最好告慰。”

中组部原部长张全景同志在《永远的歌声》一书的序言中写道：“《跟着共产党走》是一个革命者铿锵有力的誓言，坚定的理想信念，人生的方向、目标、力量的源泉。《跟着共产党走》将永远唱下去，走下去。”

久鸣和沙洪两位令人尊敬的革命文艺战士，先后于1995年8月和2004年1月离世，但是他们留下的传世之作《你是灯塔》，被历史认定为时代前进的号角。将永远激励和鼓舞着沂蒙人民和全国人民放声歌唱，永远跟着共产党走，奔向光辉灿烂的明天。

“北豹窝战斗十三勇士”

王 文

解放战争时期，“北豹窝战斗十三勇士”的英名被广为传颂。他们的英雄事迹在《鲁南时报》刊登，勇士们的照片曾在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展出。

那是1947年9月16日，还乡团头子王洪九纠集其反动武装3000余人，分两路对费县县委、县政府、县大队驻地马庄、崮口一带山区发动突然进攻，妄图一举消灭我党政机关和县区武装。凌晨，敌人就悄悄进了山。其中一路抢先占领了豹窝一带几座山头，准备由南向北进攻。

马庄区豹窝乡武装分队驻在南豹窝村，听到王洪九部进犯的消息后，抬上正养伤的县政府通信员马德全，就撤出南豹窝村，向南转移至坡山脚下。坡山已被敌人占领，再看周围的兰山、小山子、锅框子山等几个山头都被敌人占领。“我们被包围了”，乡分队长徐家均当即决定“朝北撤，向县大队，区中队靠拢”。这时敌人也发现了我乡分队，接着大队人马就向他们追来。徐家均命令队员们轮流掩护，边打边撤。

敌人越追越近，越来越多。乡分队只有13个人，还要照顾马德全，敌我力量悬殊。他们迅速撤到北豹窝村。继续撤，有可能被敌人追上，后果不堪设想。于是迅速占领了村东头的一座炮楼。炮楼为上中下三层，由石头砌成，外与村围墙相接，内与住房连为一体。整体建筑较为坚固，当年曾为防土匪袭扰发挥了重要作用，从建成以来从未被攻破过。1945年7月，王洪九部进山抢粮，我联防大队曾坚守炮楼，打得敌人不敢近前。今天乡分队要依托这屡立战功的炮楼与敌人展开殊死搏斗。

队长徐家均命令把人员分为三部分，分别守一、二、三层炮楼。队员们刚占领炮楼，把伤员马德全背上二楼，敌人就追上了。凶恶的敌人象饿狼一样扑到炮楼下。乡分队一顿手榴弹，炮楼下留下一片尸体，其余抱头鼠窜。

这股敌人共有1个营、8个保公所和3个区队的武装约1000余人。敌人见靠近攻打不行，就把全部27挺机枪、3门迫击炮集中起来，撤到远处向炮楼射击。子弹象雨点似地向炮楼倾泻，炮弹呼啸着飞向炮楼。大概是王洪九的乌合之众军事素质太差，炮弹都远远躲开炮楼爆炸，没有一发能命中炮楼；倾泻而来的机枪子弹，也没有几发能打进炮楼。这样，打了半天，炮楼仍岿然不动，乡分队无一损伤。

敌人见单用机关枪、迫击炮无济于事，便驱赶士兵在火力掩护下向炮楼逼近，徐家均要求大家“把敌人放近打”，200米、100米不打，50米不打，30米，20米，打！队员居高临下，瞄准最前面的几个“叭叭”几枪，几个敌人应声倒下。后面的见状，没有一个敢向前的，象受惊的羊群，扭头狂奔，当官的堵都堵不住。

正面进攻不行，敌人又想一招。远远地绕到村北，顺围墙向南，隐蔽着接近



炮楼。可在炮楼上层的队员看得清楚，等敌人挨到楼下20米的院子里，一个手榴弹飞到院子，两个当场毙命，其余四散而逃。

天已过午，敌人攻势不减。机枪、小炮仍响个不停。队员们虽已大半天没吃饭，但谁也没说饿，斗志仍很高昂。只是子弹不多了，手榴弹只剩下几枚。节约子弹是当务之急。“准备石头。”敌人再攻近炮楼下时，便饱饱地吃了一顿石头蛋，有的倒下，有的鼠窜。

半个多小时后，敌人调整了部署。不再使用六零炮，将几挺机枪调到村内，从北西两个方向对炮楼射击，封锁炮楼门口。在机枪掩护下，一群敌人扛着秫秸，抱着柴草，一齐拥向炮楼门口。

敌人要下毒手了。他们将秫秸、豆秸、豆角皮、杂草和从村民家抢来的辣椒堆在门口、点着火。火借风势，风助火威，时间不长，炮楼的木门烧着了。浓烟烈火扑进炮楼。坚守在一楼的队员撤向二楼，这时，浓烟已通过楼梯口钻进二楼，队员们赶紧把梯子推倒，用石板把楼梯口盖上。

敌人继续加柴添草，浓烟烈火越来越大，坚守二楼的战士们被熏得不住地流泪，呛得不住地咳嗽。楼下敌人趁机大声叫喊：“快下来投降吧，不下来就烧死了！”“你们不行了，别给八路卖命了。”队员们听了这些话，恨得牙都快咬碎了。坚守在三楼的张金生瞄准那个喊得最急的敌人，扣动扳机，“叫你烧包！”随即便没了声息。敌人仍在往炮楼下加柴，全光启把最后一颗手榴弹投到运柴草的敌人中间，虽没爆炸，却把敌人吓得四散逃命。

火势越来越大，浓烟铺天盖地。炮楼的楼板是在一根根木梁上铺的石板。二楼一根根木梁被烧断了，石板一块块往下掉，二楼队员全部撤到三楼上。

呛人的浓烟又钻进三楼。大部分队员开始咳嗽、流泪，每个人的眼睛都熏得通红。他们以顽强的意志，与敌人和浓烟烈火搏斗，决心与炮楼共存亡。忽然，一颗手榴弹飞进炮楼，“哧哧”地冒黑烟，滚到李英勤跟前。他毫不犹豫，抓起来投向敌人，未及着地，便在敌人的头顶上爆炸了。又一个手榴弹，落到炊事员杨宗海跟前，当即被杨宗海“还”给了敌人。徐家均正在向敌人瞄准，突然一个手榴弹飞来，砸在墙上，落向徐家均头部，他甩头一顶：“你回去吧”。手榴弹掉到了炮楼下正好砸在一个敌人头上爆炸了，炸得敌人脑浆四溅。

这时，一个刚进乡分队不久的人，颤抖着对徐家均说：“二哥，别打了，咱下去吧，还真要蹲在炮楼里等死吗？”张金生一步跨过去，夺过他的枪，对徐家均说：“队长，不能投降，死也不当俘虏！”“剩一个人也打！”李宗海坚定地说。大家异口同声：“对，谁也不能当孬种！”徐家均走过来，枪指着那个动摇分子说：“你要投降，我先崩了你！”一脚把他踢倒，那人连滚带爬，躲进墙角，不敢吱声了。这人从小游手好闲，其父母见乡分队能出息人，便让徐家均带着他在分队学个好。但这小子不争气，一到关键时刻就动摇了。

手榴弹没有了，子弹只徐家均、王光堂、张金生3人的枪里还有几发。敌人在炮楼下继续添柴，火势更猛。队员们清楚地觉得，脚下的楼板开始烫人，支撑楼板的木头啪啪作响。

炮楼危急，千钧一发！

战斗打了将近一天。北豹窝村和附近村庄的群众心急如焚，但有劲使不上。一些老大娘只好在家烧香磕头念佛，祈祷：“神灵保佑，炮楼里都是好人，可别叫那些王八羔子打开炮楼。”

下午5时，县大队炊事员老窦了解到北豹窝战斗的情况，火速跑去报告县大队领导。这时，县大队经一天激战，将来犯的2000余敌人击溃，敌残部逃回临沂。当地群众送来饭菜和各种慰问品慰劳他们。鏖战一天的县大队指战员连水都没能喝上一口，战斗结束了，才觉得又累又饿，不想多走一步。但一听到乡分队在北豹窝被围的消息，大家立即振作起来。随着大队长的口令，全大队跑步赶到北豹窝村，随即向敌人发起猛烈攻击。敌人知道来了援兵，再也顾不得炮楼，便仓惶逃走了。

炮楼解围了，乡分队得救了。他们先用绳子把伤员送下来，其余顺县大队竖在炮楼跟的长木杆滑下来。勇士们终于跳出火海脱险了。

事后，县委在马庄区张家墩村召开县大队、区中队、乡分队参加的军人大会，宣布鲁南军区命名坚持北豹窝乡分队队长徐家均，队员李宗海、刘洪仓、张金生、全光启、刘洪瑞、马德胜、王可德、王兴堂、刘夫才、李英勤、李凤来、马德全为“北豹窝战斗十三勇士”。

国共合作史上的共同抗日范例——

王家庄子战斗

李亮亭 李祥琨

1938年8月，中共鲁东南特委在大店建立。

大店是鲁东南军事重镇，古道莒（州）青（江苏青口）路穿镇而过，鼎盛于明清时期300余年，拥有72堂号的庄氏庄园，素称“人行千里不宿别家店，马行千里不吃外姓草”，势冠鲁苏，富甲鲁南，名扬九州。1938年3月，日军侵占大店，并安设据点。

日军在大店设立据点后，经常派兵四处“扫荡”，烧杀、劫掠、奸淫，无恶不作，给人民带来了深重的灾难，引起了鲁东南人民群众的强烈反抗。发生在1939年农历十二月二十三的王家庄子战斗，集中体现了中国人民同仇敌忾抗击日军的爱国主义精神，在中国抗战史上写上了浓墨重彩的一笔，成为国共合作抗战的范例。

1939年农历十二月二十三，一支200余人的扫荡日军在日照石臼所登陆，顺岚兖公路从东向西浩浩荡荡地前进，步兵、骑兵、炮兵一路耀武扬威，尘土飞扬，他们就是日军第六混成旅喜早支队，中队长申中信更是不可一世，他带领一个中队准备到达大店据点。

此刻，国民党第五十七军一一一师正驻防莒南甲子山区。第一一一师原是张学良的东北军。师长常恩多是抗日名将，参加过著名的台儿庄会战等，被誉为“常胜将军”。西安事变前，他曾同红军将领徐海东有过接触，逐渐明白了革命的道理。西安事变时，是秘密向张学良将军提议兵谏蒋介石的将领之一。西安事变后，身为中将师长的常恩多亲身聆听过周恩来等中共领导的教诲。1939年初，他率部开赴山东，并秘密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不久他便率部驻扎在甲子山区。

得知日军行动后，常恩多命令第三三三旅旅长王肇治和六六六团团团长关靖寰具体指挥作战。他们经过精细研究，决定伏击地点设在大峪崖村前大崖头下的河川。这里从西南方和西北方有两条小河到此处交汇流入龙王河，南面是陡崖高岭，北面也是高岭长坡，西面是长一华里的陡坡，是日军必走之路，此处是伏击的最佳地点。

为了配合第六六六团争取时间，在日军到达之前，第一一一师部又派一部骑兵在坪上以东尾追、牵制日军。约下午四时，日军进入设伏河川时，第六六六团还未到达伏击圈，尚距伏击地点三华里，只好在北高庄前河和杜家岭村南暂时隐蔽起来。当日军聚集到大崖头下开始爬坡时，友军骑兵同日军展开激战。日军边战边爬坡，艰难地到达大路北面高地时，已是傍晚时分。天黑时，日军在一向导的引导下进驻王家庄子村。

王家庄子村周围都是3米多高的围墙，通往村外有6个大门，大门顶上建有岗楼



子（也叫炮楼）。日军占领后，每个大门都安排岗哨，岗楼上各配备一挺机枪。有的村民来不及跑，被日军抓住，给他们烧水、铡草、喂马。村内有两处坊子，内有酒篓，日军打开酒篓，先让抓来的村民喝，见无毒后，即狂饮起来。

第六六团侦察员刘排长在村民王风田的帮助下，换上便衣，先把守门的敌哨兵干掉，然后进村察看地形和日军火力点。原来王风田是被鬼子抓住，给鬼子铡草喂马的。在村外碰到侦察员后，他把村内的情况向侦察员进行了描述。刘排长摸清情况后，大胆行动。干掉敌哨兵后，当他们见到有几个鬼子喝醉了倒在大街上，还有几捆枪竖在一起时，就趁机把两捆枪掀到汪塘里。原来日军刚到中国时，有每到一个地方就把枪架在一起的习惯。

日军布防主要兵力在坊子附近，骑兵在村北面，村北有一条南北沟，北面叫操马湖沟，在村东头流入村前小河。沟东岸有荆棘灌木林，日军的战马都拴在沟西边。

得知情报后，关团长命令一个营从大峪崖河滩到王家庄子东边约300米处的岭坡上隐蔽，担负主攻任务。另一个营隐蔽在王家庄子南岭东西两个干沟内。其余兵力由关团长带领隐蔽在王家庄子西南3华里处的赤眉山顶北坡。王肇治旅长命令把炮兵设在山顶北测玉皇庙部位。

莒南县大队得知日军侵占王家庄子村后，战士们摩拳擦掌，纷纷要求参加战斗。莒南县大队成立于1939年7月，到年底发展到200余人，设三个中队，是由中共莒南县委直接领导的地方武装。大队长张子亮曾是莒南十字路抗日游击大队和莒县独立营主要领导。第二天一大早，张子亮带领50余名战士，从虎园村奔赴王家庄子，在与友军取得联系后，迅速投入战斗。

24日凌晨3时，攻击战斗打响。王肇治旅长命令炮兵炮轰敌骑兵阵地，接着向村内叠发炮弹。村北面主攻营兵分两路，一路从操马湖沟东岸沿着岭坡有利地形，很快接近王家庄子村东；另一路抢占操马湖西岸一高地庙子岭。此处距村约200米，可用火力控制全村。日军正在醉梦中，被突如其来的枪声惊醒，仓皇应战，乱作一团。由于炮火非常猛烈，天亮时日军全部被压到村内。在火力掩护下，突击队数十人手提大刀，沿操马湖冲上前去，打死两匹日军战马，夺获其余50匹战马。村出口大门被日军控制着，东北角有一董家土炮楼，开始被日军占据，用火力阻止友军前进。友军官兵从村东头搭人梯进入村内，开始展开巷战。不久，董家炮楼被友军抢占，迫使日军从村内向西逃窜。

激战到午后二时，日军支撑不住，开始向西北大店方向突围。第一队50余名日军沿前河北岸的小路逃往西去，正撞进我县大队伏击圈。在相距大约150米时，“打！”只听大队长张子亮一声令下，我英勇的县大队指战员所有火力一齐射向日军。突如其来的打击，让日军摸不着头脑，晕头转向。随着一阵猛烈枪声，日军当即倒下十几个。不一会儿，日军又组织起来，企图抢占北面50米处的柏树林墓地。当日军进入柏树林后，赤眉山顶上友军炮兵居高临下，用八二迫击炮连发3炮，第1炮落在柏树林东边，第2炮落在了树林西边，第3炮正好落到了树林中央，当场炸死日军20多名。有一名日军脑浆都甩到树干上，树干被炸去一半。剩余日军慌忙调头，狼狽往村内逃窜。这时，村内已被县大队和友军控制，日军被逼到了村西的打谷场上。

日军见突围不成，便疯狂用野炮朝东北打了一炮，炮弹落到了5华里外的一个山坡上爆炸了。第二炮往西打，把赤眉山顶玉皇庙炸穿了一个洞。日军这种野炮射程远，在这次近距离战斗中未能起到作用。此刻，日军打炮的目的是发信号，请求大店据点的日军前来救援。

刚打了两炮，北面庙子岭上友军官兵轻重机枪一阵猛烈扫射，50多名日军被打死在打谷场上，剩余百余人被县大队和友军火力压制在村前河滩上。日军被打得蒙蒙撞撞，便从东西干沟之间往南逃窜。

日军刚到岭半坡，也就是东干沟南头西边麦地，这儿正是洼处，友军炮兵向他们连发数炮，接着东西干沟的伏兵一齐跃起，展开激烈交火，短兵相接，浓烟滚滚，枪声喊杀声响成一片。激战一个多小时，中队长申中信被击毙，除十名日军向岭南逃窜外，其余全部被歼灭。

南逃的日军在龙潭村北岭、磨石岭等村被村民打死，有1名日军在拉马沟石缝中被温泉水村民兵打死，有1名日军逃至十字路西边的石桥村要水喝时，被一铁匠打死。还有3名日军逃至筵宾西边的邢家水么村，被民兵打死1名，另1名日军因伤势重，用仅有的一粒子弹结束了自己的生命。只有1名日军逃往大店。

激烈的枪声停止了，赤眉山上响起了胜利的军号声，我县大队和友军官兵开始清理战场，25日前全部撤离战场。战后，县大队与友军举行了联欢大会。

这次战斗胜利结束，共击毙日军喜早支队200余人，缴获日军三八野炮1门，九二式重机枪2挺，轻机枪3挺，其它枪支大宗，战马50匹，两瓦无线电台1部。友军将士阵亡4人，县大队50余人参战，无一人伤亡。这次大捷，沉重打击了侵略者的嚣张气焰，极大地鼓舞了中国人民的抗战信心和斗志。

两天后，驻大店日军出动了300多人来王家庄子收尸，见其惨状，便疯狂报复老百姓，有6名村民被打死。临撤退时，日军愤恨地对王家庄子村放起了火，致使大部分房屋被烧光。

1940年2月10日，《大众日报》发表文章称：“这次战斗是两军配合粉碎敌人“扫荡”的极好范例。”莒南县大队也受到中共鲁南特委军事部通令表扬。

苍山泥塑：万象奇态手底来

张铁民

苍山县兴明乡小郭村，是苍山泥塑的发源地，它位于县城西南15公里处，始建于明洪武（公元1368—1398年）年间，原名古洛王城。这个名字听起来有点幽深遥远的感觉，其来龙去脉，已经很少有人能够说得清楚；但透过历史烟尘的气息，依然可以意识到脚下这块土地，文化积淀的厚重。小郭村四季分明，气候宜人，土地肥沃，属黑土质，以盛产水稻闻名。黑土地下1—2米深处的生疆瓣土，呈黄色，捣碎成泥，晾干不易裂，因此这里历史上就有挖黄泥捏泥人的传统，泥塑技艺也世代传承，如缕不绝。

泥塑艺术是我国一种十分古老的民间艺术。它以泥土为原料，以动物或人为题材，手工捏制。制成的艺术品，或素面朝天，或施以彩绘，气象万千，争奇斗艳，可谓万象奇态手底来。

我国手工捏制艺术品的历史，可以上溯到距今4000至1.2万年前的新石器时期。浙江余姚河姆渡新石器时期文化遗址出土过陶羊、陶猪。河南新郑裴李岗新石器时期文化遗址，曾出土古陶井及泥猪、泥羊头等。上述出土器物的制作时间，约为6000—7000年前。

历史的长河流淌到两汉，泥塑已成为艺术长廊中重要的品种。考古工作者从两汉墓葬中发掘出了大量的陶俑、陶兽、陶马车、陶船等器物就是明证。其中有手工捏制的，也有模



制的。汉代时兴厚葬，人们认为亡灵一如生前，也有物质生活的需求，因此为其制作了大量的陪葬品，其中就有代替人殉的泥偶。这种丧葬习俗，在客观上推动了泥塑艺术的发展和演变。与此同时，随着佛教的传入和道教的创立，佛寺、道观、庙堂蓬勃兴起，香烟缭绕，梵呗声声，空前热闹的礼神活动，强烈刺激了泥塑偶像的需求，有力地推动了泥塑艺术的发展。

唐代，泥塑艺术空前繁荣。被誉为雕塑圣手的杨惠之就是唐代泥塑家的杰出代表。杨惠之和吴道子同师张僧繇，吴道子聪颖勤勉，及早学成；杨惠之不甘落后，毅然焚毁笔砚，发奋专攻泥塑，几经磨砺，亦成名家。吴、杨堪称唐代丹青与泥塑界之双璧，时人赞叹：“道子画，惠之塑，夺得僧繇神笔路”。

泥塑艺术发展到宋元，神庙里的塑像继续繁荣，小型泥塑玩具也开始出现，展现了蓬勃的生命力，涌现出众多的专业艺人。他们制作了大量精美的“泥玩”，作为商品出售。这也是泥塑走向市场的发端。据孟元老在其所撰《东京梦华录》中的记述，北宋时东京（今开封）有著名的七夕吉祥物，持荷童子“魔合罗”，于七月七日前后在“瓦子”及繁华的街市出售。无论平民百姓抑或官宦之家，都要买来供奉“乞巧”或赏玩。魔合罗又称磨喝乐、摩喉罗，是唐宋以来一种流行范围很广的精制泥娃娃，为七夕上供所用。其造型早期为坐在莲花里的男孩，后来演化成手持荷叶的童子。它的来源说法不一，一说魔合罗是释迦牟尼的儿子，一说是佛教的天龙八部神之一，六岁出家成佛，称为“童佛”。据《醉翁谈录》记载，泥娃魔合罗做得细腻、端正，大小不一，种类繁多，价值不菲。应它该是我国泥玩娃娃的初始造型。

历经明、清、民国，泥塑艺术品在社会上一直长盛不衰，尤其是清代，达到了高峰。被称为“泥玩”、“耍货”的小型泥塑，几乎在全国遍地开花，其中久负胜名的有无锡惠山泥人、天津“泥人张”，陕西凤翔造型神秘古朴的彩绘泥塑，河北白沟大可近尺、小不盈寸的泥娃娃，山东高密集型、色、声为一体的动物泥塑，河南淮阳泥泥狗、浚县泥咕咕以及北京的素色泥塑等。

二

下面我们来考察一下苍山泥塑的前世今生。

据《苍山县志》记载，苍山小郭泥塑，始创于清咸丰年间（公元1851年）。已有150余年的历史。首创者是一位叫做李宗标的艺人。李宗标年轻时去天津投奔“泥人张”，学习雕塑神像的技巧，后又吸取无锡惠山泥人艺术之长，技艺渐趋成熟。出师返乡后，便利用本地黄泥塑成人和动物玩具，涂粉着色，到四乡赶集出售，是为小郭泥塑的开山祖师。

由于年代久远，李宗标的作品没有保留下来。但他的技艺却由儿子李占云、孙子李宪志、重孙李玉法，代代相传，继承下来，李家也成为小郭村最具代表性的泥玩艺人世家。

旧社会，小郭村的泥玩艺人都是穷苦人家。为了养家糊口，他们多在农忙期间趁早就晚，一家男女老少齐上阵，挖来黄泥，踩砸加工，泥模成型，晒干后放置起来。到了冬闲，再涂粉着色制成成品，到集市上或走街串巷出售。极盛时，销售区域遍及鲁南苏北。从枣庄、临沂、徐州、连云港等地来村里批发泥人的商贩，络绎不绝。遇到歉年，为了度荒，艺人们就带上一些制作工具，到南京、丹阳、开封、洛阳以及河北等地，就地取材捏制泥人销售。泥塑成为活命的手段。有民谣“小郭挖泥做孩忙，背井离乡卖泥郎，大江南北都走遍，泥娃哭声响四方”，就是当年小郭村泥塑艺人背井离乡，四方叫卖的真实写照。

最初，泥塑只是一种养家糊口的手段，一家一户制作，并不太注重它的艺术性，因之，作品的造型、色彩都比较单一粗疏，后来随着市场的竞争日趋激烈，艺人们不断创新，开发新品，泥塑作品开始向丰富多彩、生动形象、具有珍藏价值的艺术观赏品方向发展。

苍山泥塑发展的200多年，大致可分为以下几个时期。

一、起源和形成时期。即李宗标从师天津学成归来，传给其子李占云的初始阶段。先是五六户人家制作，后逐渐遍布全村。传承方式大多是家传或亲戚之间的传授，尚未形成规模。

二、鼎盛时期。清末、民国至解放初期，是苍山泥塑艺术发展的兴盛期。这期间，除李宗标祖孙四代外，还出现了一大批技艺较高的泥塑艺人。如张永西、张其荣、刘庆昌、李玉祥、刘秀芝、刘秀臣、李现信、田秀可等。他们的泥塑作品丰富多彩，各有千秋。销售范围也逐渐向外扩展。此期，小郭村外出卖泥人的很多，李凤航到过烟台，刘秀芝到过四川，刘秀廷到过兰州。在外地卖泥人，生意做好了，除了解决温饱外，还能有余钱回家建房。周围村的不少人，受小郭村影响也都学着做泥玩具。这些村的艺人大多与小郭村有亲戚。小郭村有的艺人还把泥塑这门绝活教给闺女作为嫁妆。

三、20世纪60—90年代的低潮期。在这一漫长的时间内，百姓翻身解放，告别了穷苦的日子，致力于归田耕作，泥塑作为一种行业，进入低潮。但也有一些老艺人不愿放弃手中的绝活，农作之余仍坚持捏制泥人。代表人物为苍山泥塑第四代传人李玉法（1933—1994年）。他的父祖辈都是泥塑高手。受家庭熏陶，李玉法8岁跟父亲学捏泥人。由于天生聪敏，心灵手巧，更加勤奋好学，很快就掌握了捏塑技术。十几岁就能随心所欲地捏塑各种人物和飞禽走兽，作品造型生动逼真，彩绘得当，栩栩如生。作为苍山小郭泥塑第四代传人，李玉法对泥塑技艺的创新与发展，居功至伟。20世纪70年代，他在传统泥塑的基础上大胆创新，创制了烧制泥人和画面泥塑及写意泥塑等多种新品，使苍山小郭泥塑发扬光大，成为我市民间工艺美术中的一株奇葩。

三

苍山泥塑的艺术特色鲜明，风格独特，在泥塑百花园中格外引人注目。

题材广泛，花色品种繁多是小郭泥塑的一大特色。现有的100多个品种中，既有戏曲人物、仙佛神像，又有飞禽走兽、果蔬食品。塑品造型完整统一，夸张传神，简洁而不粗俗，为百姓喜闻乐见。

形体作局部夸张、色彩简约浪漫，是小郭泥塑最具个性的艺术特色。小郭泥塑的原料礞瓣土，可塑性很强，可塑捏成各种形体，但牢固性较差，易断易裂。艺人们为规避此缺陷，大胆采用了压缩人体比例，简略人体四肢，让泥人横向夸张等方法，出人意料地造成了一种既富于浪漫色彩，又极具现代气息的艺术效果。例如所做鬃髻娃娃，往往夸大头部，做成肥头大耳，头几乎和身子等高，表现了儿童一派天真无邪的稚气。由于“压”得巧妙，“简”得当，“不似之似”让人感到比写





实的人体更为耐看。

苍山泥塑的制作主要有两大工序：第一道工序为泥塑（泥模）的成型。第二道工序为泥塑（泥模）上色。泥塑的成型有三种方法：第一种是手捏成型；第二种是模印成型；第三种是半捏半印成型。“模印成型”是用泥巴在模具上压印出来的泥塑，又称“压模泥塑”，多用于批量生产。一般要通过十几道工序。1、做模型：艺人称捏“仔”，泥塑模子就是从“仔”脱出来的；2、取泥：泥土皆取自当地两米以下的疆瓣土；3、泡泥：洒水浸润；4、砸泥：用木槌将浸润好的泥块捣细；5、和泥：不能让泥中带块、带沙，做较大的泥玩具要加入棉絮，与泥土打透布匀；6、踩泥：赤脚或穿上麻绳鞋底鞋，用力反复踩揉；7、做坯：将和好的泥拍成薄饼，放在两片模子里；8、合胚：将两片模子合在一起，挤压封边；9、做哨：用鸡毛翎伸入芦苇内，投去内膜，削成大小不一的芦管，加纸舌制成；10、安哨：一般安在泥塑的底部，与两页模子合成一体；11、脱坯：将合模拆开，泥塑成型；12、修光：将成型的泥塑边沿部分去掉；13、打孔：投制吹哨气眼；14、修饰：用竹签修整泥塑细部或加工人物头部装饰；15、晾坯：将成型的作品放在透风处晾干；16、制粉：泥塑的底色一般为白色。传统制粉方法，取枣庄山亭区干沟的白石块，砸碎过滤即成；17、粉坯：将泥模在调好的白颜色中蘸一下，白颜色即挂满泥模，泥人的底部和背部大都微露几点泥土的本色，突出泥人的质感。18、上色：泥塑的上色是需要有一定笔墨功力才能完成的一道工序。彩绘一般用黑、大红、粉红、绿为主要颜料。粉红和绿黄是主色调，富有热烈、明快、活泼的气息，然后用墨来提神。压模泥人用色追求单纯、概括和悦目，既省工省料又有利于流水作业。有的泥人勾描较为简洁，不必把每一个结构线交待清楚，而是讲究“意到笔到”，往往是一笔出彩，很少重复，达到见笔见色的艺术效果。

苍山泥塑是劳动人民艺术想象力和创造力的结晶，是沂蒙地区典型的民俗文化产物。它在民间艺术、民俗学及美学领域的地位，十分重要，受到专家学者的高度重视。1983年，南京工艺美术学院选取李玉法的6件作品作为直观教具，使看似粗头乱服的小郭泥人，走进了高等学府的课堂。苍山泥塑的工艺美学特色，引起了众多工艺美术院校的广泛关注。1984年，北京工艺美术学院和北海团城中心玩具厂，选购李玉法制作的泥玩具200套，小郭泥人第一次在首都北京登堂入室。近年来，每年都有一些大专院校的师生及民间艺术研究人员，来小郭村考察、学习、从事研究。

绚丽多彩的苍山小郭泥塑，至今依然保持着旺盛的艺术魅力，源于它的正宗和唯一性。它造型上的夸张和绘画中潇洒自如的笔法，不仅对国内甚至对世界都具有很大的吸引力，成为弘扬民族特色文化的一张名片。多年来，许多作品被省、市、县作为文化交流的使者，带着深情厚谊，走向五洲四海。

大范庄遗址与蛋壳陶杯

徐淑彬 徐宁

大范庄遗址是临沂市乃至山东省为数不多的新石器时代晚期重要遗址，因为出土了众多精美的龙山文化时期的蛋壳陶杯而著称于世。

大范庄遗址位于河东区相公镇东大范庄村西0.5公里的岚（山头）兗（州）公路南侧几十米处，因遗址高出四周平原地表0.5至1.5米，大范庄村群众称其为“西岭”。

大范庄遗址是上一个世纪的70年代由于当地农民取土以及“农业学大寨”造田发现的。经群众多年来不断取土使用，“西岭”面积逐渐缩小，其上层商周、汉代遗存已遭破坏。1973年3月，原临沂县文物组组织人员抢救清理，获得一批新石器时代晚期至商周时代的文化遗物。那次考古工作，主要是配合农田施工。发掘清理位置主要位于遗址中段偏西，于1973年3月25日正式开始，经过22天的连续作业，至4月15日基本结束。参加者有杨殿旭、张鸣雪、刘心健、赵海峰、唐士文五人。以地面采集为主，小规模发掘清理为辅，收获巨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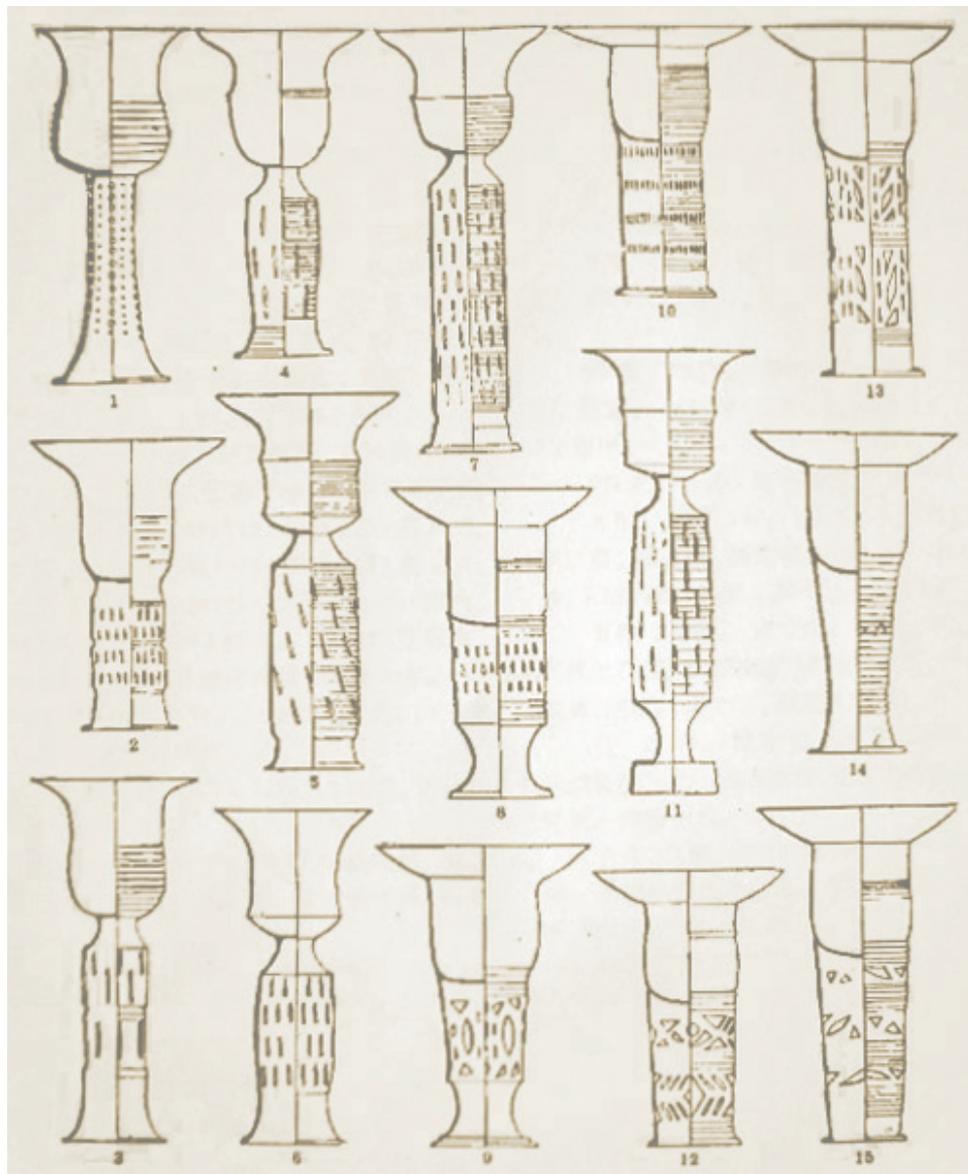
遗址概况

大范庄遗址地处沂沭河之间的冲积平原，海拔只有66米。遗址所处的西岭，经实地测量，南北长160余米，东西宽140余米，总面积近3万平方米，计有26座古墓葬。这里墓葬的特点是：分布密集，排列比较整齐，虽深距地表0.5至2米不等，但无叠压现象和相互打破关系，可确定为氏族公共之墓地。墓室均为长方形土圜（无棺槨），少数筑有二层台，墓主人头南向，70°至90°方位不等，皆系单体仰身直肢葬，骨质已腐朽不全。随葬品或置于死者头部，或置于足部，或置于遗体之一侧。

出土的文物

大范庄遗址共发现文物768件，分为陶器、石器和骨器三大类。陶器数量最多，有725件，其中夹砂灰陶494件，泥质黑陶





212件，夹砂白陶14件，夹砂红陶5件。石器有牙璋、铲、镞、鏃、凿、钺和佩等，计20件。骨器为镞、针、锥和獐牙等，计23件。随葬品主要是日常生活用的陶器，平底器有背壶、瓶、杯、碗、匜等；三足器有鼎、鬲等；圈足器有豆、镂孔高柄杯等。背壶在陶器中数量最多，达284件。其中有部分物品体积很小且火候较低，乃非用性的明器（即冥器，是专为随葬而制作的象征性器物）。墓葬中随葬品分布情况是：7座墓中有獐牙，15座有陶鬲，17座有背壶，18座有豆，19座有黑陶镂孔高柄杯（17号墓发现4件，23号墓发现5件），23座有泥质黑陶壶。许多重要的文物是地面采集的，如牙璋等等。它们的脱层，造成对文物所属层位与文化年代判断的困难。

大范庄遗址出土器物中最具价值的是被称为“蛋壳陶”的黑陶镂孔高柄杯，共出土30件，一次发现数量之多，居全国第一位。这些黑陶镂孔高柄杯一般口沿的厚度在0.05厘米左右。其通体乌黑发亮，质地极为细腻，轮制技艺精湛，造型优雅美观，因胎壁薄如蛋壳（不足半毫米），故被称为“蛋壳陶”。因“蛋壳陶”的柄部精雕着密集的几何形镂孔，所以称镂孔高柄杯。一件高20厘米的黑陶杯，重量仅有50克左右，堪称国宝。它作为龙山文化时期制陶工艺的最高峰，为研究山东新石器时代文化提供了极其珍贵的资料。这些蛋壳陶杯中的较完整者，现在多被定为国家一级文物。

遗址的文化时代

大范庄遗址出土的器物，根据陶器的器物特征以及与日照东海峪同期文化遗存的比较，可以看出它们属于大汶口文化晚期到龙山文化晚期。其中背壶、细颈鬻、台座折腹豆、黑陶镂孔高柄杯等，属于大汶口文化晚期的器物；深腹平底罐、罐式鼎、绳纹匝、粗颈小袋足鬻、浅盘豆、黑陶壶和镂孔蛋壳陶高柄杯，属于龙山文化早期的器物；盆形鼎、长流粗颈大袋足鬻、镂孔粗柄豆、大平底盘，属于龙山文化中、晚期的器物。主要的墓葬处于大汶口文化晚期向龙山文化过渡的时期。而牙璋（过去称作“石钺”）的出现，则有可能是夏商时期了。在文化时代上来说，大范庄遗址可能代表了氏族部落时代向夏商周发展的不同时期。

相关文化的比较

大范庄遗址出土随葬品有两个方面重要的价值与意义：一是墓葬中随葬品数量悬殊很大，如第17号墓有85件，而第16号墓只有1件夹砂灰陶盆。这种现象表明，当时社会已经出现私有制，贫富差别已存在。而男女合葬墓则表明当时父权制已经确立，进入了父系氏族社会。二是“蛋壳陶”工艺的成熟标志着新石器时代制陶工艺达到最高峰。即使在今天，想复制大范庄的蛋壳陶杯，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大汶口文化的前身是发布于鲁南、苏北的北辛文化（在苏北称青莲岗文化）。山东省滕县北辛遗址的发掘，从层位和文化面貌上初步确定了大汶口文化对它的继承关系。大汶口文化的后续是龙山文化，这不仅有地层和年代数据作证据，而且，龙山文化的鼎、豆、壶、鬻等陶器的造型与装饰风格，拔牙习俗和葬俗，都表明它是由大汶口文化发展而来的。

关于大范庄遗址与附近地区同时代文化遗存的比较上，罗庄区的湖台遗址、临沭县的东沟头遗址、日照市的东海峪遗址、日照两城遗址，它们几乎是同一个时代的。它们有一个共同的特点，都显示了大汶口文化晚期向龙山文化过渡的过程。



老城夜话

(连载)

刘家骥

老崖头渔夫捉怪 鹅头峰猎户救鹤

过去小涑河的流向是流到城西门处再向北流，经北关再向东流，经东关的东侧由西向北拐弯时汇成了一个深水的渚子，俗称老崖头。此处水深鱼多，成了渔民打鱼的好去处，夏季则是人们洗澡、游泳的浴场，东关居民还在此处养鸭子。这年发现鸭逐渐减少，打鱼的说是被一黄色的怪物拖下水去吃了，还有人看见怪物在渚中出没。于是居民纷纷传说老崖头出现了“水怪”。养鸭子的从此不敢在此放了，洗澡的也不敢下水了，打鱼的也非常害怕。几个老渔民经过仔细观察，发现此“怪物”头大嘴阔，全身是黄色，足有两米长，便断定是一条大鱼。但如何能抓住它呢？渔民们经过观察，发现它冬天喜欢到北岸浅水处晒太阳，于是渔民们组织了20余人，各带一大眼网，在它出没处等候。这天正是晴天，大鱼又到浅水处晒太阳。渔民们突然一起撒网，果然将它网住了。大家一齐用力将它拉上岸，一看才知道这是一条大黄鲢鱼。离开水后这大鱼很快就死了，渔民们抬着进城卖给了专做鱼菜的泰丰馆，人们听说后都到泰丰馆观看所谓的“水怪”。老崖头又恢复了往日的平静。



涑河岸边

小涑河经老崖头向北再向东就汇入了沂河。在沂河入口处北岸形成了一个沙丘，像个鹅头一样，当地人俗称鹅头峰。这一带自然景色甚美，鹅头峰上长了很多杨树和柳树。入口处还形成了一个小岛，人们叫它琅岛，上面也长满了柳树，夏天人们常来游玩消暑。这岛上夏秋有野鸭出没，冬季经常落大雁，鹅头峰的北侧是一片平地，野兔很多，因此这里猎人经常光顾。

1934年的冬季，天气十分寒冷。一天晚上下了一场雨雪，树上都结了冰凌，人们都躲在屋内取暖，而猎人则借此好机会外出打猎。当时有关东的两位猎人来到了鹅头峰，但未发现猎物。又向河中琅岛一看，发现了冻僵的两只灰鹤。他们踏着河面冰走上琅岛，将两只灰鹤抱回家中。灰鹤被救活了，他们又买来鲜鱼悉心喂养，两只灰鹤很快恢复了健康。这时有人出钱要买灰鹤，猎人却怎么也不卖，他们将两只灰鹤抱回琅岛，将其放归自然。据说两只灰鹤在空中徘徊很久还不肯离去，似是对恩人的留恋。

药王庙创中医会 龙神祠设水龙局

民国二十年(公元1931年)，在药王庙成立了中医会，参加者为中医师、中医研究者和中药店，但不吸收卖西药者和针灸及卖药膏者参加，经费为各中药店捐助。

成立大会上选举王思衍为名誉会长，狄建鳌为会长，主要成员有刘宪邦、陈伯熙、沈桐华、陈允升、姚文灿等人。中医会逢旧历的初一和十五两次集会，研究时疫的诊治和诊病中遇到的疑难问题，平日则有一名医生在大殿坐堂。求医者先由医生诊问病况，然后让求医者去指定的签桶抽签，抽出的处方再由值班医生重新加减另行开方。名义上是求神医，实际上还是医生诊治，但病人康复后还要来向神医还愿。这庙中的和尚也颇懂医术。中医会的活动



受到了广大市民的欢迎，可惜1938年日寇侵占临沂时将药王庙夷为平地，从此再也没有这样的中医组织和集会了。

清朝同治十一年(公元1872年)以前，临沂城没有专门的消防机构。发生火灾称为“走水”，也就是俗称的失火，鸣锣为号并喊着“走水了”，听到的群众则自发地提着水桶前来救火。清光绪十一年设立了“水龙会”，负责消防工作。其经费来源为南关太公庙的税收，救火设备则存于县署中。光绪二十六年(公元1900年)又由城区绅董捐办。宣统二年(公元1909年)邑绅吴叶泰捐置新式水龙一架，设在城区保卫团，也就是城隍庙西侧的龙神祠。真正启用还是民国二十三年(公元1934年)范筑先任县长时。因临沂当时无工业用电又无自来水，范筑先对水龙做了改进，改进后的水龙是用人力抽水，用汪水和井水灭火。这年的6月，城西南隅的富户刘海峰家发生火灾，水龙会马上前去灭火，将附近双井口的井水抽出喷向火场，很快就将火扑灭了。事后迷信的人还是强行让刘家在火神庙唱戏三天敬火神。

演武厅按时点卯 司令部演练骑射

临沂古城清代有两个练兵场，城内的叫做小教场，南关外的称大教场(今华东革命烈士陵园址)。这大教场的正北有一座演武厅，是官员每天早晨给兵丁点名的地方，因点名在早晨卯时故称点卯，前去应点的兵丁称应卯。按照规定，每天晚上7点关城门，早上5点开城门，因此应卯之人5点就开始向大教场集合了。冬季天亮得晚，还得打着灯笼前往。临沂城没有旗兵，只有绿营兵。绿营兵在清末时腐败得很，他们早上睡懒觉，自己不去应卯而是花钱雇人替他应卯。辛亥革命后，点卯制度就废除了。

古城的西北隅北门里路西是清朝驻军的协台衙门，这里住过守备、千总、副将、都司等不同级别的武官。这协台衙门的大门坐北向南，门前的一对石狮是原来泾王府的石狮(今在华东烈士陵园内)，大门后是仪门，东侧是官厅，仪门后是五间正堂，堂西是演武厅，后面是花厅和官员的内宅，大厅前是军人练武的场所，西侧有射箭的箭道，后成为箭道街，骑兵的演练场不在此处而是在东北隅的小教场，平时骑兵在此演练，故小教场还有一座马神庙和马厩(送文书的驿马厩不在此处而是在北门里路西)。这座协台衙门民国时改成司令部，依旧驻部队。这里又住过统领、军长、师长、旅长等不同级别的武官，民国二十二年(公元1933年)六十六旅就住在此处，而旅长李占标的公馆安在大夫第。1938年日寇进犯临沂时，司令部被飞机炸为平地，后来汉奸在此建了一片住房。1945年临沂解放，将山东各地投降的日军集中住在这里，然后遣送回国。新中国成立后在这里建起了体育场。

仓房巷清官放粮 财神庙贪官敛财

明清两朝临沂古城皆有国家的粮仓。明朝时，设在城西南隅的称大廩，设在西北隅的称永丰仓，设在东北隅的称义仓。到了清朝时改为南北两仓，南仓在今沂州路北段路东的南仓房巷内，巷东首路南即是南仓。北仓在今兰山路的颜家巷口西侧路北向北去的一条名北仓房巷的北端称北仓。南北二仓皆是砖建筑。上面是瓦顶，仓内离地面80厘米上架起木板，上面便是粮囤，仓顶还有天窗可以通风。这种建筑形式民国后就不存在了。后来临沭县韩家村大地主王林翰家仿照县内大仓修建了一个粮仓，可惜也在上世纪50年代“大跃进”时拆掉了。仓内放什么粮食呢？这在古代皆有记载，北方皆是谷子，不是小米；南方则是稻子而不是大米。临沂城南北两仓内存粮最多时达十万斤以上。平时只有当地行政官吏和驻军及秀才中的廪生可按时领取一定粮食。大批用粮是要国家批准才行。

清朝雍正年间，因为动用了一次仓粮引发了一场大案。这就是知县李方膺为救灾民而入狱的事件。原来清雍正十二年，山东总督王士俊搞的所谓开垦荒地的害民政策，李方膺进行

了抵制。王对此十分不满。恰巧当时岁饥，为救饥民李方膺采取以工代赈的办法，让饥民前来修城墙，然后发放粮食。王士俊得知后，即以私开国家粮仓的罪名将李方膺关进监狱。百姓闻之哗然，皆曰“公为民故获罪”。前往探监，狱卒不让进，民众遂将“钱贝鸡黍自墙外投入，瓦沟几满”。乾隆元年李方膺被平反。消息传来时正值晚间，全城为之欢腾，鞭炮齐鸣犹如过年。平反后李方膺马上要调走，百姓爱恋不舍，挽留了数日。

沂州路北段路西向西有一小巷，西面直接东更道。东更道的东墙向里有一座财神庙，因此对着它的小巷就称财神庙巷。军阀六十六旅旅长李占标的“缉查处”就设在这里。按说“缉查处”应该缉查匪盗毒品等事项，但李占标却将矛头指向了富商和富户，诈取钱财。他们以通匪的罪名将人抓捕然后罚款。这实际上就是绑票。当时被“抓捕”的富户有狄月樵、刘海峰等人，皆交了2000大洋才被放出来。抓的最大富户当属南关西园的刘某，他们将刘某抓来后诬其通匪。最后刘家交了一万大洋才被放出，刘某从此逃往青岛再也没有回来。另一户是崔家巷的崔家被绑去，被迫交了5000大洋。这样造成了很多富户皆逃到了外地，对临沂的工商业是一次严重的摧残。李占标用诈来的钱财从上海买回一辆轿车，天天开着在大街上兜风。此外李占标为了敛财，还替地主下乡收租，提取好处费。可见军阀搜括民财是不择手段的。

西北角易攻难守 东哨门见证历史

古城的城池虽然防御效果很好，但也有薄弱环节。城墙虽然一样坚固但城河却有漏洞。城南面的城河因涑河的水注入，称青龙河。水深河阔，非常不利进攻。而西北方向的小涑河离城较远，护城河中基本无水；东岸又可作为掩体，因此最易进攻而不利防守。据明末抗清义士李国经的《明季轶史》所记，清兵攻城数月不下，最后是从西北角攻入的。1938年日寇进攻临沂城也是长攻不克，最后也是在西北角攻入的。最典型的还是1945年八路军解放临沂城时，由于城内汉奸和王洪九匪部死守，久攻不下，最后也是采取措施在城西北开挖地道直到城根，放上炸药才将城炸开，八路军才攻入城内。1947年国民党军占领临沂后，接受教训加固了西北角城墙的建筑，又在城内建了第二道防线，但这也是无济于事。未等修完，1948年10月10日夜，王洪九匪部就逃跑了，从此临沂城就永远回到了人民的手中。当年城西北角的工事现在连影子也没有了，说明真正的长城不是城墙而是人民。

临沂城的南关可说是临沂的外城。从南城门向南，笔直的大街正南面便是外城的城门——南阁子门观音阁。观音阁的建筑和四城门一样，上面也是有阁楼。门匾“观音阁”三字为明征西前将军杨肇基所书。阁上是一座绿琉璃瓦的三间大殿，殿内有杨肇基铸造的铜观音造像。阁外金银两雀山对峙，甚是壮观。南关的其他门，像正西方向的称西大围门，其他皆称哨门。这哨门中惟有东哨门最为重要，它是旧粮食巷的最东端。旧粮食巷西端是一片繁华的商业区，东首路北是美国基督教堂，路南是美国医院的大门。这医院是临沂地区当时最大的医院。东哨门外是一条直通沂河渡口的大道。过去沂河渡口主要是北面的老河口。木桥和渡船皆在那里。自从台潍公路大桥修好后这里就成了沂河的主要渡口了。出东哨门穿过东姜园村向东路北有王璟墓，再东路北有青龙寺，路南有天后宫。再东便是当时的沂河大桥。就是这座东哨门和沂河大桥见证了近代临沂的几件大事。

第一件大事是1936年7月12日，临沂人欢送清官县长范筑先就是从东哨门而出直奔沂河大桥，当时约有万人之上。

第二件大事是见证了张自忠的五十九军和庞炳勋的四十军在临沂阻击战的历史。为了保证台儿庄大战的胜利，四十军和五十九军在临沂阻击战中阻止了日军向台儿庄的会合，取得了台儿庄大战的胜利。临沂城的防守是大战的一个重要环节。沂河大桥的争夺战又是最壮烈的一战。战前两位军长就是出的这东哨门前往沂河大桥察看阵地。战士们大刀杀敌使日寇未



东哨门

能前进一步，在临沂传为美谈。

第三件大事是1945年日寇投降后解放临沂的战役。八路军就是经过大桥和东哨门到达临沂的。解放后在东哨门上写上了“明朗临沂”四个大字，见证了临沂的解放。

第四件大事是淮海战役时的支前大军皆是经过东哨门和沂河大桥奔赴前线的。当时是支前队伍为防止敌机的轰炸改为白天休整夜间行军。故夜晚后东哨门灯火通明，大桥上人马欢腾，支前大军顺利的南下支援了前线，取得了淮海战役的胜利。

此外还有1946年罗炳辉将军的送葬灵车也是从东哨门经过，葬在大桥西头的烈士陵园(原青龙寺)。1947年孟良崮战役后张灵甫的空棺运往南京时也是从东哨门经过大桥去南京的，记得当时七十四师留守处的官兵痛哭流涕，哀叹七十四师的覆灭。更有意义的是1948年10月10日王洪九匪部夜间逃跑时也是从东哨门而出经大桥而南逃的，见证了临沂城永远回到了人民的手中的那一刻。

刘氏献宝记

寇玉坤



临沂这座古老而美丽的城市，不仅在革命战争年代传诵着诸多为保家卫国流血牺牲可歌可泣的英烈人物，就在和平建设岁月里，也不断涌现着为建设家乡而做出无私奉献的模范人物。

上世纪50年代初，临沂城内外传诵着“刘氏爱国献宝”的故事：挑水巷刘氏将祖上遗留多年埋藏的一宗元宝捐献给国家。政府根据中央领导“造福于民”的指示修建了南关护城河大桥，沟通了城内外的交通。一些知情者老人还铭记在心。事隔多年，南关大桥已成为沂州路交通要冲，人马车流川流不息。约在上世纪70年代初，一次偶然的机会，笔者与当年城关镇邓镇长在桥畔漫谈时，提起修桥这件往事，邓镇长遂回忆讲起当年他亲自处理的刘氏献宝的经过。

1954年秋，临沂县城关镇政府接到南京市农业大学一封信：提到在校生刘庠拟向国家献宝一事，并附刘庠劝导母亲向政府捐献祖上埋藏多年元宝的信。邓镇长持此信到南门里挑水巷刘氏家中进行开导。刘氏深明大义，支持儿子爱国奉献的行动，决定献出此宝，遂将埋藏元宝的地址标记告之。这消息不胫而走，传遍了城内外。到了挖宝那天清早，街巷人空，人群跟随着邓镇长来到南大街路东人武部门前（这原是刘氏的祖宅）观看。邓镇长一行人进到门里院

内，刘氏指引着众人顺着一条砖铺甬道弯弯曲曲前行，向东行几步，转向北几步，便来到北屋月台前花池。花池内一棵枝叶繁茂的樱桃树，刘氏向树旁一指，大家便开挖。挖到5尺多深，露出了石板，掀开一开，下面有四个大瓷坛，内装着白花花的银元宝和散乱的银元。邓镇长当即约来了银行有关人员，清点了数目，随后封存入库。当时在场的人武部刘部长感慨地说：“我们天天在这院里出出进进，没想到脚下就踩着这些元宝。”

刘氏献宝一事，由临沂县政府上报省和中央，周总理亲自批示：“造福于民”。建国初期，临沂百废待兴。南门外护城河大桥年久失修，县领导于是决定将这宗元宝转成经费修建石砌起拱的大桥。

此事由于岁月久长，邓镇长对这宗元宝具体数目也记忆不清，笔者也为此事查询多年，未有答案。可巧，就在今年春，一次老同学聚会时，笔者遇到了刘氏的儿子——刘庠，交谈中，他谈起了母亲及其所献元宝的过程：母亲原名宋淑君，书香门第知情达理，一生勤俭持家，含辛茹苦培育子女读书成长。1954年我和妹妹考上大学及师范，达到老人的心愿，但学费困难，母亲遂将保存多年祖上流传的一只银元宝托付我到南京交给学校领导当学费用。经过教育我提高了觉悟，就写信给母亲劝导把元宝献给国家建设用。母亲深明大义，慷慨捐献，于是领着城关镇邓镇长去老宅院（当时南门里南大街路东“信泰”货栈）挖宝，共挖出银元宝18只（每只约48小两），银元约200枚。政府奖励了2000元人民币（当时一元人民币兑银元一枚），帮助我读完大学，现在临沂大学任教。我妹妹刘坤也是退休教师，晚年幸福。母亲享年89岁。



左宝贵书法艺术初探

徐 斌



有诸多文物资料证明，清代著名民族英雄、爱国将领左宝贵，即是一位造诣颇深的书法家，然而百余年来却一直被其忠烈名声所掩，他精湛的书法艺术就鲜为人知了。所幸，当代著名书法家王相生教授，最近提供资料，发现在其藏《中华名匾》一书中，有收录左宝贵当年题写的两块木匾；与平邑县博物馆收藏之左宝贵所书奏折、信函、平邑清真寺悬挂之匾额字体相互比对，断定均系左宝贵手迹，为研究左宝贵书法艺术增添了文物资料。据此，笔者不揣冒昧，对左宝贵的书法艺术略陈管见，以就教于方家，并恳请有兴于此者发表高见，作深入探讨。

一

左宝贵（1837年—1894年），字冠廷，回族，平邑县地方镇人。少年就读，敏而好学，后因父母双亡、孤无所依而辍学。1856年，携弟宝贤、宝清流落江南，不久从军，走上了报效祖国的戎马生涯。在几十年的军旅征途中，他驰骋疆场，屡立战功，叠升千总、游击、副将、高州镇总兵等职，被封为建威将军、记名简放提督。

光绪二十年（公元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爆发，左宝贵奉命赴朝抗倭。他坚守平壤玄武门，登城督战，亲自操炮射击，屡挫进犯日军，不幸中弹身亡，壮烈殉国。左宝贵牺牲后，光绪皇帝亲笔为其撰写祭文、碑文，追封太子少保，谥忠壮，并降旨在家乡地方镇为其建衣冠冢。当时，左宝贵与邓世昌被国人誉为“双忠”，朝鲜为其建纪念碑，奉天为其铸铜像，许多忠臣良将为其衣冠冢、门坊、华表撰文书联，歌其功德，颂其英名。《清史稿》、《沈阳县志》、《费县志》、《山东省志》、《平邑县志》等陆续为其立传。建国后，许多学者、教

授、文史工作者，相继搜集、整理、研究左宝贵的生平事迹，发表了很多有史料和学术价值的文章。尤其古史学者李常松近30年来，一直没间断研究左宝贵，并征集到左宝贵为平邑清真寺题写的“天方正教”木匾、《左宝贵书信集》、《左宝贵奏折》等珍贵文物资料。费县、平邑县史志部门联合编辑了以传记为主体的近30万字的《民族英雄左宝贵》。原济南大学校长、山东省伊斯兰教协会会长丁文方教授，运用翔实的资料，撰写了近40万字的《回族抗倭名将左宝贵》。综览上述文章、著作、资料，对左宝贵的生平事迹，诸如：出身经历、忠义爱国、军务战事、开发矿山、兴修铁路、关注民生等方面，都做了详细精辟的论述。但是美中不足的是对其文化素养、特别是书法艺术基本上都未涉及，有的则是只言片语，不能不令人遗憾。

二

截至目前，发现左宝贵存世书法作品共5件，其中书信1件，奏折1件，均系馆阁体小楷；题匾3块，均为正楷榜书。

左宝贵的书信和奏折，系平邑县地方镇大井头村胡乃德于1984年捐献。书信是左宝贵写给春山的。看其内容，左宝贵在派兵镇压夹荒佃农聚集抗租的同时，指出肇事起因于政府丈地加租，说明他尚能体察民情。奏折是左宝贵奉答皇帝制策提问时局政事的。长117厘米，宽30厘米，共10余折，每折6行，每行20—24字。现存10折、58行、1300字。从内容上看，主要陈述治国之道在于务实；东北三省是国家的根本重地；守土之要在于加强海防。同时强调得人心者得天下，希望“皇上亲政之初”、“兢兢业业，日进无疆，锡极以诚民，披图以度地，理财以足用，柔远以睦邻”，确保国家长治久安。字里行间彰显出他忠君爱国的思想品德。

左宝贵题匾3块。其一，“开天古教”木匾，悬挂于黑龙江省依兰县清真寺正殿正中。匾长200厘米，宽130厘米，厚6厘米。“开天古教”四个大字阳刻。上款“光绪八年九月初九日谷旦”，下款“钦命提督军门统领奉天督标亲军马步军营翼长巴图鲁左宝贵敬”，上下题款均为楷书。其二，“诚意敬心”木匾，悬挂于辽宁省沈阳市新民县清真寺大殿北侧券门之上。匾长220厘米，宽88厘米，红边绿地黄字。上款竖书“总理奉天营务翼长统领中前右亲兵马步等晋记名提督军门左宝贵”，下款竖书“光绪九年巧月上浣谷旦沐手敬立”，均为楷书。右上角钤押首章，左下钤印两方，上为阳文“总兵巴图鲁”，下为阴文“左宝贵印”；上方中心处钤“总领奉军中前右亲兵马步前营之关防”长方印一方，印章中心一直行满文将印文分为两行。其三，“天方正教”木匾，悬挂于平邑清真寺大殿内。匾长208厘米，宽73厘米，厚5厘米。落款是“光绪拾捌年岁次壬辰叁月谷旦”、“钦命头品顶戴赏穿黄马褂简放提督广东高州总兵总理奉天营务翼长总统奉军马步等营铿色巴图鲁左宝贵敬”。此匾是左宝贵当年应家乡回族群众请求书写的。“文革”初丢失，1984年11月重现。“开天古教”、“诚意敬心”两方木匾的照片、资料，均收录于1992年辽宁人民出版社出版的《中华名匾》一书。另有资料显示，左宝贵还曾为江苏镇江等地清真寺题过匾，详情不得而知。

三

那么，上述书法作品是否是左宝贵的手迹呢？笔者的回答是肯定的。理由如下：

第一，专家考证鉴定，确系左宝贵遗墨。

《中华名匾》是全国第一部匾书，系补白之作。该书共收录包括：宫殿楼阁、院校堂馆、关隘城堡、府第民居、庙宇寺观、陵墓祠堂、塔碑牌坊、洞窟摩崖、园林亭台、店铺商场、其他等11个类型的500多块名匾。中国古书画鉴定专家、国务院古书画鉴定小组成员、辽宁省博物馆名誉馆长杨仁恺先生，对名匾“逐个做了考证鉴定”、“对文稿逐篇审读，品评取舍”。对左宝贵所题名匾下的断语是“为左氏难得的遗墨。”当代著名书法家王相生教授则更加坚定

地说：“此乃左将军的真迹，毋庸置疑也”。

第二，依据惯例判断，书匾者理当是左宝贵。

考究历朝历代的名匾，都是由帝王将相、名家才人题写的，这是千古不易的惯例。据此判断，已发现的“天方正教”、“开天古教”、“诚意敬心”等名匾，都应当是左宝贵辄身其任、亲力亲为的。否则，由别人代笔，岂不是沽名钓誉而貽笑大方吗？古往今来，无此先例，更何况是堂堂正正、名耿千秋的左将军呢！世人一般认为，他行伍出身，文化不高，不可能写出那么漂亮的字，这实际上是个误解。

第三，工文擅书，左宝贵具备书匾的实力。

左宝贵虽不是靠科举取士发迹的，但在“书法中兴”时代背景的影响下，又加天资聪颖而勤奋，始终是坚持文武兼修的。有资料显示，他祖父左凤友，“曾在济南清真寺念过经，做过海里凡，习过武术”。父亲左世荣，“略通文墨，读过《古兰经》”，心地善良，乐于助人，乡亲们都称他“庄户秀才”。左宝贵的启蒙老师是地方镇清真寺的沙洪章阿訇，他是山东一代经师常志美阿訇第三代嫡系弟子，其精通《四书五经》和《古兰经》，又练就了一身好武艺，文武兼备，享有盛誉。左宝贵拜师入寺后，成了最小的海里凡。他上午读《古兰经》，下午学《四书五经》，早晚习武功，“眨眼就是五个春秋”。他读的书主要有：《百家姓》、《三字经》、《名贤集》、《论语》、《大学》、《中庸》、《孟子》、《诗经》等。他甚是聪明，读过的书，“不但能探明其义，而且能……背诵下来”，“对……一些格言名句都记得清清楚楚”。“他心灵手巧，对经文、汉文的书写，都有独到之处，为以后率军、从政撰写文书奠定下基础。他之书法很有些功底，现在尚存平邑清真寺匾额上‘天方正教’四个闪闪发光的大字就是见证”。这些出自《回族抗倭名将左宝贵》一书中的话语，显示了左宝贵工文擅书的根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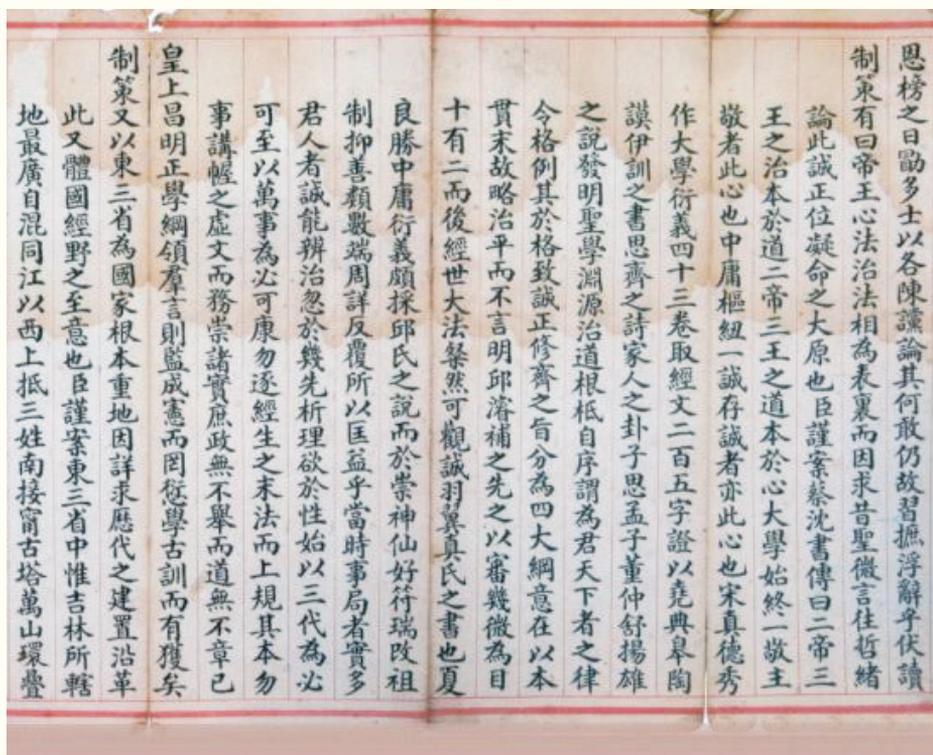
诸多学者认为，书法家不仅要有熟练的技艺功力，还要懂得文学、美学等方面的知识；书法家首先应该是文学家，因为字外功夫比什么都重要。事实上，左宝贵不仅字写得好，而且诗、文也非常出众。例如他辍学之前随老师游览泰山和曲阜“三孔”之后所写律诗，即初显其胸怀和才华：

日月轮替数千载，自古华夏多圣贤；
忠孝仁义礼智信，万世相继天地安。
而今人间欠坦荡，内忧外患堪艰难；
若能救民扶邦国，不妄一生热血男。

又如清光绪十七年（公元1891年）孟冬，左宝贵“谨志”的《左氏祖莹碑记》：“……宝贵不幸幼失怙恃，又乏恒产以谋生理。咸丰初祚，发逆肆扰于南方，遂挈弟宝贤、宝清，奋志从戎，驰驱锋镝，艰苦备尝。……仰赖朝廷威灵，多获克捷。叠蒙殊恩，荐至提督……简授广东高州镇总兵官，并遇覃恩给与三代一品封典。……皇仁稠叠，萃于一门，非先世培植深厚，曷克致此！用勒贞珉表于墓，愿后世子孙永怀旧德，勿坠家声。上继累世忠厚之遗，下开奕祀降祥之报。或耕或读，为善为良，延先泽于未艾，即以报国恩于万一。乃正于此有后望焉”。上述碑文，由左宝贵亲笔所撰。通篇言简意赅，文笔流畅。从逻辑、语法、修辞角度讲，是一篇准确、严谨、鲜明、生动的范文，没有一定的文学素养是难以写出来的。由此看来，左宝贵工文擅书，文者、书者乃将军之表也。

四

鉴定、评价书法的主要依据是时代风格和个人风格。推究左宝贵从戎咸丰、同治、光绪年间，为清代的中晚期。此期不论官场还是考场，都盛行馆阁体。凡奏折、考卷，必须以馆阁体书写，而且一定要亲笔。此体要求行行齐整，字字匀称，横平竖直，又光又圆。把千人不同的



笔体，变成一种字形，隐去了锋芒，没有了棱角，丢掉了自我。若以此鉴定、评价左宝贵所写奏折、书信，只能让人感到工整、隽秀，实难找出其个人风格。

书法是一种融合哲理的艺术。人生、美感、情思等多种观念，都集中体现于书法之中。人品影响书品，书品又折射人品，观其书而知其人也。到目前为止，左宝贵的行草尚未发现，评价他的书法，只能看其楷书。“楷书无欺”。苏轼云：“书法备于正书，溢而为行草。未能正书，而能行草，犹未尝庄语，而辄放言，无足道也”。可见学书应从楷入手，循序渐进，方为正道。

左宝贵虽行伍出身，其一生内外兼修，有勇有谋，又文又武，堪称儒将。若单从书法角度评价，无异于管中窥豹。尽管他的遗墨极为有限，然仅凭现存几块匾额，亦足以看出他的书品和人品。笔者以为，他的楷书法于颜、柳，亦颇受苏东坡的影响。依据时序分析，“开天古教”匾书于光绪八年（公元1882年），左宝贵是年45岁。查其年谱，1880年，“自古北口练军回防，盛京将军岐元奏请朝廷：留左宝贵统领奉军并总理营务兼翼长。得旨，以提督总兵记名简放”。1881年至1882年，相继在奉天创办牛痘局、同善堂，设立施粥厂、栖流所、育婴堂、义学馆等，关注民生，广行慈善。无疑，此时他官运亨通，情绪甚为高涨。因此，他书写的“开天古教”四个大字端庄遒劲，恢宏奇伟，气壮山河，颇有几分将帅之气。“诚意敬心”匾书于光绪九年（公元1883年），结体宽博而气势恢宏，笔力遒劲而气概凛然，颜体风格尤浓，这正是左宝贵与颜鲁公高尚人格相契合的缘故。“天方正教”匾书于光绪十八年（公元1892年），比“开天古教”匾晚10年，左宝贵时值55岁，政治上成熟，仕途上稳定，精力上充沛，书法上更是本于颜、柳而出新意，因此，他所写的“天方正教”四个大字，结体严谨沉稳，章法紧凑规整，笔墨饱满秀润，端庄而不呆板，方整而不瘦细。特别“天方”二字，左低右高，体态欹侧，正是苏书脱胎于颜书而又不同于颜书正面取势的特点，越发显得不拘法度而变化生新，既老气横生，又天真率意，真令人拍手叫绝！由此断定，“天方正教”四个大字，乃左将军书法之代表作，亦系其书法之巅峰矣。惜老天不佑，遽尔魂亡，仅过二年其竟于平壤壮烈殉国，世人不尽哀思。

烈烈忠壮公，赫赫伟业绩，必藉楮墨而长存；忠义贯日月，书文妙天下，名垂青史永不朽。逝者已矣，来者可期，同心同德，共兴中华。

览蒙山胜境 抒诗家情怀

——《沂蒙诗话》之七（续二）

李兴河

六

明代蒙阴公氏家族百余年间一门考中5个进士，其中最后两个进士都选为翰林院庶吉士，授编修。从此“五世进士，父子翰林”之称，名闻遐迩。明末，由皇帝敕令在蒙阴县城修建了一座“五世进士，父子翰林”石坊。石坊高大，雄伟壮观。五位进士皆擅长诗文，均有吟咏蒙山的诗篇传世。

公勉仁，公鼐的从高祖。明弘治三年（公元1490年）进士。历任江西道监察御史、太仆寺少卿、都御史等。著有《东山集》。家乡的名山秀水、田园风光，深深地铭刻在作者的脑海里。作者在外做官时，一次舟行中忽然忆起故乡的美景，便写下诗篇《舟行忆东蒙旧庄》：

野馆篱边秋水清，竹阴深处掩柴荆。鱼灯乱集澄潭下，樵唱时闻隔浦声。

泉石梦中千里远，烟波江上一舟轻。何年了却人间事，静向云林闲养生。

这是一首七律。诗中赞美了家乡的美景，表达了去官归隐的情怀。诗的首联，写故乡房宅的篱外滨临着一条清澈的河流，茂密的竹林深处掩蔽着简陋的柴门。诗的颔联，写入夜可以看到渔人聚集在水潭捕鱼的点点灯火，白天可以时时听到隔岸传来樵夫的阵阵歌声。诗的颈联，



写梦中的家乡山水田园已相距千里之遥，现正乘一叶轻舟行驶在烟波浩渺的江上。诗的尾联，写由思乡而产生的心愿：希望尽早结束为官生涯，以便回归故里山水竹林闲静地颐养天年。诗通过梦中忆念家乡之美景，来抒发归隐之心情，表现手法颇为新颖。

公跻奎，公鼐的曾祖父。明嘉靖十四年（公元1535年）进士。历任山西潞安府知府、湖广沅州兵备道按察副使。著有《中岩草》。游览蒙山时写有《蒙山叠翠》：

名山高并已无多，此去遥天能几何。雨过烟光明翠黛，日斜树色映青螺。

斗牛森列仙峰近，虎豹参差鸟道讹。安得拂衣凌绝顶，白云丛里发长歌。

这是一首七律，诗运用夸张、比喻的手法，写出了蒙山的高峻、奇险和美景，表达了作者攀登绝顶、云里高歌的意愿。诗的首联，极言蒙山之高，写象蒙山这样高峻的名山已经不多，此山高距遥天也没有多远。诗的颔联，写雨过天晴，烟光日影辉映着青翠的群峰。突出了“蒙山叠翠”的特色。诗的颈联，写蒙山高路险绝，繁密排列的斗牛等星辰临近仙峰，参差错落的怪石如虎豹蹲踞鸟道。诗的尾联，写作者欲凌蒙山绝顶、云中引吭高歌的豪情。这两句诗充满豪气，自然能给人以鼓舞。

公一扬，公鼐的从祖父。明嘉靖三十八年（公元1559年）进士。曾任河南裕州知州、工部郎中等。著有《闲音集》。居家时写有《蒙山叠翠》：

芙蓉千叠绕银河，秀出东蒙翠不磨。好是春来新雨过，石华香结白云多。

这首七绝咏的也是“蒙山叠翠”，但在立意与写法上并不同于公跻奎的那首《蒙山叠翠》。诗的首句用“芙蓉千叠”比喻蒙山群峰之美，以“绕银河”衬托蒙山群峰之高。这样写既形象又新颖。诗的第二句，紧扣“叠翠”的题旨，写神秀的蒙山翠色永不泯灭。诗的三、四句，写春雨过后，葱翠的山中，白云飘浮，山花烂漫，香气郁结，景色更加迷人。这样写，自然比单纯写“叠翠”内涵更丰富，诗味也更浓。

公家臣，公鼐之父。明隆庆五年（公元1571年）进士。初选翰林院庶吉士，后授翰林院编修。后任南京户部主事。著有《柳塘集》。居家时写有多篇吟咏蒙山的诗，《蒙山道中》就是其中之一：

几度攀缘宁惮险，孤征终日岂知劳。傍溪乱石白齿齿，出谷幽禽啼嘈嘈。

平野云铺麦翻浪，茂林风入松作涛。好山夹道看不足，驴背推敲兴转豪。

诗的首联，写独自在蒙山道上攀缘，既不畏惧险阻，也不知道疲劳。诗的颔联，写在蒙山道中看见许多白石齿齿布列在溪边，听到许多鸟儿嘈嘈鸣叫在深涧。这两句诗突显出道空谷的幽静，颇有王维诗句“泉声咽危石”、王籍诗句“鸟鸣山更幽”的韵味。诗的颈联，写攀登到高处，远望平野，浮云飘动，麦浪翻滚，静听茂林，清风吹来，松涛阵阵。诗的尾联，写山道两旁奇峰胜景目不暇接，诗兴油然而生，便认真推敲着诗句。全诗赞美了蒙山的美景，表达了对蒙山的热爱，也抒发了不畏艰险、勇于攀登的豪情。

公鼐，文学家、诗人。明万历二十九年（公元1601年）进士。曾任翰林院编修、礼部右侍郎等。死后追赠礼部尚书。有《问次斋集》行世。他论诗主张“一时代有一时代的声情”，反对复古摹拟。人们评其诗“不屑屑摹古，亦不沾沾是今”，皆得真趣。清初著名诗人王士禛誉其“诗文淹雅，绝句尤工”，称其《南竺寺》等一些诗“不减唐人风致”。公鼐对蒙山情有独钟，吟咏颇多，仅《问次斋稿》即收入近百首。这里选出几首予以鉴赏。

《望蒙山吟有寄》：

蒙山秀出东海边，海上白云相与连。昼倚晴峰望五岳，夜凌绝磴攀青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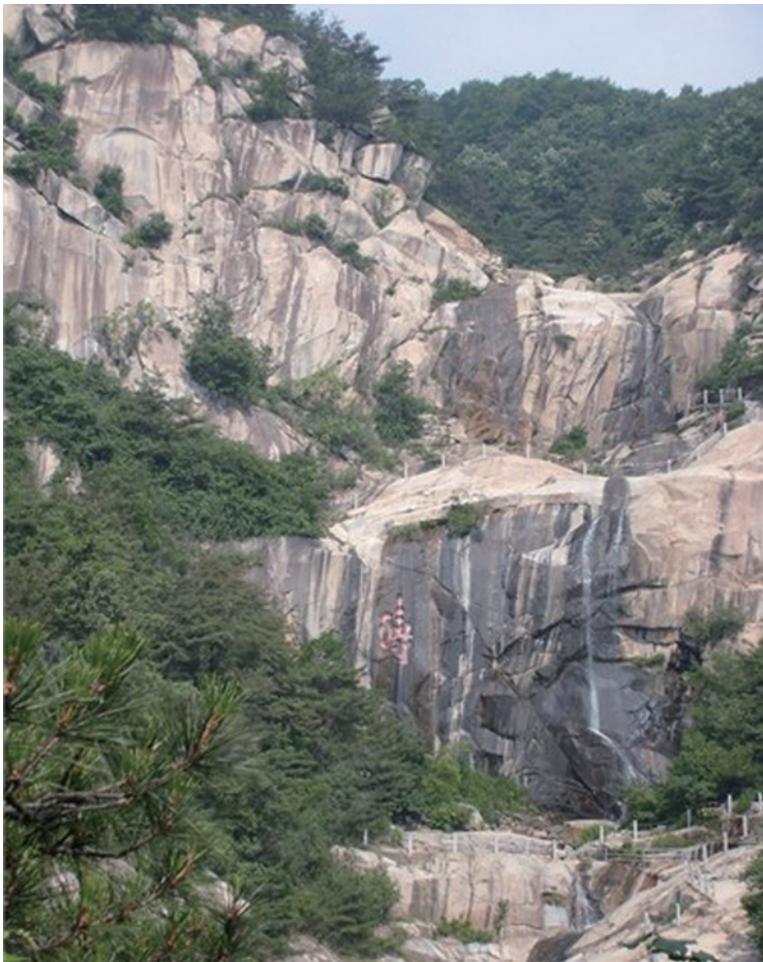
月明正照峰头树，猿猱乱啼不知处。周围林麓接桑田，中有幽禽来自去。

六月重阴爽若秋，初平牧羊在上头。拍手大叫空谷应，振衣长啸万壑幽。

齐鲁千里平如掌，俯视一气恒泱泱。眼底不生京洛尘，物外自有烟霞想。

嗟君只在此山南，欲往从之蹊路艰。豺狼昼出当道卧，一望使我摧心颜。

燕客初成怀旧赋，山高鸿雁不得度。安能握手蓟门来，桃花正开春未暮。



这首七言古体诗，是吟咏蒙山寄给山南一位朋友的。风格豪放，景语壮美，情语含蓄。“蒙山”以下4句，主要写蒙山横亘海右，云海苍茫，气势磅礴，高大奇险。“月明”以下4句，写月明高树，猿猱乱啼，密林桑田，鸣禽翔集，蒙山胜境，清幽宁静。“六月”以下4句，写蒙山森林茂密，遮天蔽日，炎夏盛暑，凉爽如秋，大叫长啸，空谷回响，风清气新，令人心旷神怡。“齐鲁”以下4句，写从蒙山之颠俯视齐鲁大地，平野千里，烟霞弥漫，山中没有京洛污浊之尘，是超然物外颐养天年的理想之地。以上是诗的前半部分，侧重写景，并由景生情。“嗟君”以下8句，是诗的后半部分，主要写作者对居住山南的朋友的思念。本想前去探望，只因蹊路艰险，又有豺狼当道，难以前往。欲托鸿雁传书，无奈山势高峻，雁难飞度。故邀请朋友来此山中观花赏景，畅叙情谊。诗的后8句虽重在言情，但语意含蓄，似有难以明言之情。

《止龟蒙绝顶》

石磴松萝挂紫烟，摩崖苔色不知年。龙湫远自空中落，鳌背疑从海外悬。

历览中原鲁国小，特崇华表岱宗前。云深更是真仙境，岂必蓬壶问洞天。

这是一首七律。写作者在蒙山主峰龟蒙顶上所见的景象和由此产生的心境。诗的首联，写山顶的石级松树古藤都笼罩着紫色的烟霭，布满苔色的摩崖石刻已难以辨认是什么年代。诗的颔联，写龙潭瀑布从很远的高空落下，龟背状的巨石好象是从海外漂悬而来。诗的颈联，写在山巅能一览中原大地，感到鲁国很小，只有受人崇拜的高大泰山才可以与蒙山媲美。诗的尾联，写蒙山的云深之处才是真正的世外仙境，又何必去海中的蓬莱山去另寻洞天呢。诗中赞美了蒙山高远神妙的景色，表达了乐于在此山隐居养生的心愿。

《望蒙山》

蒙山最高是双峰，上有云烟几万重。我欲峰头一伫立，却从天外数芙蓉。

这首七言绝句，主要写作者仰望蒙山所见的景象及欲登顶一望的心情。诗的首二句，写蒙山主峰龟蒙顶及第二高峰云蒙峰上烟云缥缈，苍茫无际。诗的三、四句，写诗人欲伫立峰顶从天外俯瞰群峰竞秀的奇观。这里以秀丽的“芙蓉”来比喻奇丽的群峰，既形象又新颖。诗中表达了作者热爱自然、奋发向上的豪迈情怀。

《游蒙山长林峪》

看山每易尽，不尽是兹山。众刹旃檀隐，千村竹柏环。
峰高云不去，水落涧常关。更觉前岩好，藤萝未可攀。

长林峪是蒙山中一条很长的山峪，峪中林壑幽美。这首五言律诗写的是作者游览长林峪所见的景色。诗的首联说，看别的山每每容易穷尽，只有看蒙山是难以穷尽的，这是因为蒙山横亘百里，高耸千峰，山重水复，景深莫测。诗的颔联，写众多的寺塔掩隐在山中的旃檀密林中，许多的山村居落环绕着茂密的松柏修竹。诗的颈联，写高高的山峰有烟云缭绕，幽深的仙洞常被飞落的水帘遮掩。诗的尾联，写感觉前面的奇峰景色更为美好，挂满藤萝的云崖还未来得及攀登。诗中表现了一种身入佳境，乐于寻奇探幽的情趣。

《至花涧峪》

入谷阅重险，侵衣惟白云。春鸣鸟不断，午坐鹿成群。
涧响花中没，岩光树梢分。却疑仙路近，鸡犬隔峰闻。

花涧峪，位于云蒙峰北侧，三面高峰环峙，峪内清溪蜿蜒，花木繁多，翠光碧波，如诗如画。春夏时节，山花烂漫，百鸟争鸣，令人陶醉。这首五言律诗，就是写春天花涧峪的迷人景色及作者游览的欢快心情。诗的首联，写花涧峪谷险壑深，林海花潮，烟云弥漫，侵湿人衣。

“侵衣惟白云”句，颇有唐张旭的名句“入云深处亦沾衣”、王维的名句“空翠湿人衣”之妙。诗的颔联，写峪中有鸣声不断的春鸟和悠然自在的群鹿。静中有动，自然使花涧峪显得更充满生气。诗的颈联，写涧水在花林下哗哗流淌，岩光在树梢上明灭闪耀。写景有声有色，十分迷人。诗的尾联，写仿佛是进入了世外仙境，有鸡犬之声从山那边传来。全诗写景优美，愉悦之情，融于景中。

《山寺遇雨》

山雨满崖谷，四围如笼烟。石磴悬流水，处处闻飞泉。
林梢澹深翠，风声垂高天。盈盈一壑内，邈若隔人寰。

这首诗是写作者在蒙山寺中观赏雨中的奇妙景色。诗的首联，写山雨骤来，茫茫烟雨笼罩着崖谷。诗的颔联，写山路石级上流水湍急，到处都听到飞溅的泉声。这两句诗，颇有唐王维诗句“山中一夜雨，树梢百重泉”的韵致。诗的颈联，写树梢摇动着深翠的枝叶，呼呼的风声从高天吹来。诗的尾联，写观赏这山雨中的美好景色，仿佛有与世隔绝之感。陶醉山中美景的心情自然流露出来。

《蒙山瀑布》

岂是银河落，飞来万丈余。谪仙如可见，不复问匡庐。

蒙山瀑布是蒙山的一大景观，位于云蒙峰北侧，气势恢宏，景象壮丽。有人赋之：“水源高悬若挂之于云外兮，如天河之飞追。其形如滚雪兮，其势若霹雳。如天花之散彩兮，若细雨与尘飞。绝壑万仞，断岸千尺，虽非龙门之倾峡兮，亦何啻黄河之奔流。”公鼐在诗中并没有细写蒙山瀑布之景象，而是采用了与庐山瀑布对比的方法来写。李白在《望庐山瀑布》诗中说：

“飞流直下三千尺，疑是银河落九天。”公鼐诗中说：蒙山瀑布“飞来万丈余”，比“银河落”还要恢宏壮观。李白如果看见，也许就不至于对庐山瀑布那样惊叹了。应当说，蒙山瀑布与庐山瀑布都是大自然赐予的奇观。遗憾的是，李白与杜甫联袂游蒙山时正是深秋枯水季节，自然没有看到蒙山瀑布的壮丽景象。公鼐是幸运的，他既看到了蒙山瀑布，也看到了庐山瀑布。他在《庐山谣》诗中说：“香炉紫烟落银汉，飞来泉响三峡长。傍岫云生初冒絮，万壑溟濛不知处。涛声喷雪玉龙飞，倒卷翻湖半空注。”赞美之情，溢于言表。大自然是美的，在诗

诗画赏析

人的笔下变得更美。

《南竺寺》

野寺倚南山，悬崖置僧室。云横翠殿重，林密浮图出。

其二

山门俯浅溪，隔水孤峰秀。野径无人问，飞鸟啼清昼。

其三

晚霞挂重塔，微月碧殿空。林壑松桧响，十里闻秋风。

其四

南竺倚修岭，幽人朝夕来。迎车山犬吠，夹道野花开。

其五

早岁志城阙，壮心竞隐沦。几年京洛客，今日入空门。

其六

南山向晚晴，天镜落悬瀑。爱此坐中庭，衣裳栖白露。

南竺寺，即寿圣寺，坐落在蒙山北麓蒙阴山之阴的南竺院。始建于唐，规模宏大，盛时僧众达千人。这6首五言绝句真实生动地写出了南竺寺的清幽之景、天籁之音，表现了作者厌弃官场、隐居山林的闲情逸致。诗写景清新自然，语意高雅，诗语清淡，确有“唐人风致”。





孝悌临沂

——《二十四孝》探源之四

大荒堂主



单衣奉亲（砖雕）



戏彩娱亲（砖雕）

（四）单衣奉亲与戏彩娱亲

闵损是孔子的高足，以德著称，同时他也是二十四孝中的著名人物。其故事称作“单衣奉亲”。作为临沂的名人，曲筱鸥女士已在本刊的著文《闵子骞与〈鞭打芦花〉》作了详尽的介绍，这里不再赘述。

下面谈一谈老莱子以及“戏彩娱亲”。

首先，老莱子是何方人士？

古人考证：老莱子不是老子，另有其人，本名莱子，以莱为氏，而以寿考称老莱子。《通志·氏族略第二》：“莱氏。子爵，其俗夷，故亦谓之莱夷。今登州黄县东南二十五里有故黄城是莱子国。襄六年，齐灭之。”老莱子原籍应为胶东。

《庄子·外物》：“老莱子之弟子出薪，遇仲尼，反，以告，曰：‘有人于彼，脩上而趋下，末偻而后耳，视若营四海，不知其谁氏之子。’老莱子曰：‘是丘也，召而来。’”意思是说，老莱子的弟子出外打柴，遇到了孔丘，回来告诉给老莱子，说：“有个人在那里，上身长下身短，伸颈曲背而且两耳后贴，视天下为囊中之物，不知道他是什人。”老莱子说：“这个人一定是孔丘。快去叫他来见我。”说明孔子与老莱子为同一时代人，孔子生于前551年9月，而前567年齐灭莱，莱灭以后老莱子去国，其年龄应该大于孔子。

其次，老莱子“当时世乱，逃世，耕于蒙山之阳。莞蔑为墙，蓬蒿为室，杖木为床，蓍艾为席，菹苳为食，墾山播种五谷（《史记·老庄申韩列传第三·正义》）”。这里的“蒙山之阳”就在今天临沂境内。

最早被称其为“蒙山”山麓的只有这里的蒙山，《诗经·鲁颂·閟宫》：“泰山岩岩，鲁邦所瞻。奄有龟蒙，遂荒大东。至于海邦，淮夷来同。莫不率从，鲁侯之功。”也

只有住在蒙山之阳，地近曲阜，与孔子比邻而居，方便交流，所以才有上面的故事。

第三，老莱子的楚人身份。

说老莱子是“楚人”的，影响最大的当属《史记·老庄申韩列传第三·正义》引文，这其中只是对《史记》正文的解释，司马迁的原话是：“或曰：老莱子亦楚人也。”模棱两可的口气。没有定论。

皇甫谧《高士传》中所言“人或言于楚王，王于是驾至莱子之门。莱子方织蚕，王曰：‘守国之政，孤愿烦先生。’老莱子曰：‘诺。’王去，其妻樵还，曰：‘子许之乎？’老莱曰：‘然。’妻曰：‘妾闻之，可食以酒肉者，可随而鞭捶，可拟以官禄者，可随而铁钺。妾不能为人所制者。’妻投其蚕而去。老莱子亦随其妻，至于江南而止。曰：‘鸟兽之毛，可绩而衣，其遗粒足食也。’仲尼尝闻其论，而蹙然改容焉。”“王於是驾至莱子之门。”似乎也不能作为老莱子在楚的依据。或者前533年鲁、宋、楚会于陈，楚王顺道探访老莱子，也是有可能的。

老莱子的德行主要表现为隐与孝。孔子曰：“德恭而行信，终日言不在尤(忧)之内，在尤之外，国无道，处贱不闷，贫而乐也，盖老莱子之行也。”（《大戴礼记·卫将军文子篇》）

更能表现老莱子思想的，当属《孔丛子·抗志篇》，内中说：“子思见老莱子，老莱子闻穆公将相子思。老莱子曰：‘若子事君，将何以为乎？’子思曰：‘顺吾性情，以道辅之，无死亡焉。’老莱子曰：‘不可顺子之性也，子性刚而傲，不肖又且无所死亡，非人臣也。’子思曰：‘不肖固人之所傲也。事君，道行言听，何所死亡。道不行，言不听，则亦不能事君，所谓无死亡也。’老莱子曰：‘齿坚易蔽，舌柔常存。’子思曰：‘吾不能为舌，故不能事君。’”

最早记述老莱子孝行的当是汉时的《列女传》，其保存的只言片语中讲：“老莱子孝养二亲，行年七十，作婴儿自娱，著五采斑斓衣裳，取浆上堂跌仆，因卧地为小儿啼，或弄雏鸟于亲侧。”

发现于敦煌的《孝子传》，其中也记载了老莱子，原文为：“老莱子，至孝。年七十，不言称老，恐伤其母。衣五彩之服，示为童子，以悦母请（情）。至于母前为儿童之戏。或眠伏，或眠与母益养脚，跌化（仆）地作婴儿之啼。楚王闻名，与金帛征之，用为令尹，辞而不就。六国时人。”这里透露出老莱子娱亲，发生在楚王招贤纳士之前，也就是“耕于蒙山之阳”之时。

至元代郭居敬将老莱子列入二十四孝，名之为“戏彩娱亲”。

其中称：“周。老莱子至性孝。奉养二亲，备极甘脆。行年七十，言不称老。常着五彩斑斓之衣，为婴儿戏于亲侧。又常取水上堂，诈跌卧地，作婴儿啼以娱亲。有诗为颂，诗曰：戏舞学骄痴。春风动彩衣。双亲开口笑。喜气满庭帟。”

这就是我们今天看到的版本。

人老反哺，时日无长，老莱子为博双亲开心一乐，不惜装痴卖呆，此乃善之大，孝之至也。

老莱子有著作十五篇，“言道家之用修道而养寿也。”到隋唐时已亡佚，后人从《庄子》、《孔丛子》、《尸子》、皇甫谧《高士传》辑得四节，附考为卷。



忆民间针灸大师钱士芳先生

奕 珏



钱士芳先生（1944年摄于临沂国光照相馆）

今年，正值民间中医针灸大师钱士芳先生诞辰112周年，亦为先生驾鹤西去36周年。伊人已逝，世事如烟。然先生救死扶伤，妙手回春的功德往事却遗惠乡里，于乡野耆老间口耳相传，使人忘却不得。

一、青年发愤读诗书

先生于清朝末期的1900年，出生于沂州府双月湖畔湖南崖村一个农民家庭里。先生的少年兵荒马乱，旱涝蝗灾频发，沂州大地上盗匪四起，疾病肆虐，民不聊生。因生活所迫，先生无钱入学念书，自幼便与父亲一起披星戴月，春耕秋收，为温饱而奔波。日复一日，年复一年，一家人挣扎在生死线上。国乱家贫，天资聪颖的他意识到：要摆脱贫困的窘境必须先摆脱愚昧，要摆脱愚昧必须先行读书，只有读书方能兴家，欲成大器必应先学文化。于是，年近20岁的他下定决心自学文化。不能进私塾便利用农闲及一切可能拜私塾先生和当地秀才为师，与中医先生交友，与账房先生结朋，行走坐卧如饥似渴地习字诵文。耕作之余，他用柴棍草棒在地上写划，饭前餐后他于餐桌墙壁上挥洒，阴雨长夜更成为他与村中断文识字者研经读论的好时机。功夫不负有心人，用了10多年时间，先生不但熟练地掌握了常用汉字的基本用法，还练就了一手好书法，通读了很多历史文化典籍，尤其是对《四书》《五经》和《三国志》等典籍更是烂熟于心。

二、不为良相为良医

民国年间，各种疾病肆虐流行，乡村缺医少药，不少患者因得不到有效医治而命丧黄泉，先生看在眼里痛

在心里。为此，已识文墨的他怀着“不为良相为良医，甘为百姓除病疾”之志，决心做个像名医扁鹊那样的人，开始了对中医理论知识的钻研学习。当他看到古医籍云：“祛病之功，莫捷于针灸”，“拯救之法，妙者用针”后，即立志学习针灸。于是，遍访民间名老中医而求教，与本地名中医李振堂先生等十里八乡的针灸医师切磋钻研，熟练背诵研究《玉龙歌》等针灸名篇，并将理论用于实践。为体验针感和疗效，他以坚强的毅力以身试针，经常针刺自己的穴位，反复体验针疗效果。同时，融合灸法和中草药疗法，充分体现中医阴阳平衡和脏腑经络相互表里辨证施治的原则。又结合自己的实践先后研读了《伤寒论》、《本草纲目》、《针灸大成》等医学典籍，逐步掌握了人体700多个穴位的针灸疗法以及中草药的治病原理。经过多年的刻苦努力，他的针灸医术日渐成熟，逐渐形成具有钱氏特色的针灸疗法。从先为本村乡亲治病，到名传四里八乡，求诊问病的人越来越多，而先生不论求治者贫富贵贱，都一视同仁予以精心诊治，往往是针到病除，于是名声渐起乡里。在几十年的行医过程中，靠着两盒银针抢救治疗了无数患者，成为周边数十里范围内为平民百姓解除疾病痛苦的乡村郎中，被乡民誉为针灸大师。

三、妙手医德惠身后

先生勤奋耕读，虽半途而习医道，然因善于钻研，勤于实践，却登堂入室，深得祖国传统医学之精髓。每遇病患遵辨证施治之则，行针灸草药并施之术，常常收到妙手回春之效，起沉痾于危笃之中。有一年冬天，先生去外村出诊，正值大雪纷飞，刚走到邻村村头，便看到一个面色戚然的男人正在地上用谷草包裹一个孩子。职业的敏感使先生不禁停下脚步，向男子询问详情。男子泣不成声地告诉先生孩子为其儿子，已经五岁了，因患急病突然死亡，现正准备到村南棺地掩埋。看到这一幕，先生让男子停止包裹孩子，忙拉出孩子手腕，细细切脉后感到孩子一息尚存，忙解开针包施以急救之术，用三棱银针刺入孩子人中穴，略施手法，孩子应针而醒。孩子得救了，男子喜从天降，跪拜千恩万谢，后将此事广为宣传，先生也被当地传为“神医”。此类事件在先生的行医中何止一例，对一些因急症昏死的病人，先生用银针施救，复加人工呼吸、经络按摩和中药调理，多能使病者转危为安，给人以死而复生之叹。

先生为人诊疗治病，以救死扶伤为己任，医德高尚，从不以医技谋私利。有人求医，不论烈日当头的酷暑还是雨雪交加的半夜，只要有人相求便慨然应允。有时一夜出诊三四次不得安眠也无怨无悔。1946年，沂州城南几个村庄流行霍乱，该病发病急，传染性强、死亡率高。许多人染病后得不到有效医治不久便死亡，有“上午他抬死者，下午别人抬他”之说，一时乡间传为不治之症，闹的人心惶惶，谈病色变，有的人甚至携眷带幼离家出走躲病。钱先生依靠两盒银针解民危难，并以中药调理防范自己染病，日夜奔波为病人诊治，几个月救活乡民百余人，被誉为“华佗再世”，深受大家拥戴。

先生不但善于治病，而且注重医学经验的总结。新中国成立后，钱先生一边忙于农耕，一边义务行医。他挖掘祖国医学宝典，深入研究了《黄帝内经》、《濒湖脉学》等医学典籍，结合自己几十年的行医经验，总结整理成《中医简易针灸疗法》手册，以精练的笔墨介绍了中医针灸治病的历史渊源和基本方法，意欲将其付之梓版，以使自己的经验传于后人。遗憾的是书稿尚未刊印，一场史无前例的浩劫便席卷而来，书稿与陪伴他半生的医学典籍和几盒银针一起被视为“四旧”查抄损毁。

先生熟谙诗礼，中正平和，待人彬彬有礼，宽宏仁厚。他勤劳节俭，善待生命和自然界的一草一木，常在宅旁院落广植树木，以求遮荫成材。1976年，先生终因积劳成疾医治无效去世，享年76岁。

华丽舞步

——记马颖霞

惠东波



马颖霞立志从医，是看着9岁弟弟清澈明亮的眼睛决定的。

上世纪70年代第一个炎热的盛夏，马颖霞正在蹒跚学步，呀呀学语，便随支援沂蒙山区建设的父母来到临沂。青岛蓝天白云、白墙红瓦的美丽景色便日渐淡薄、模糊，临沂的古城石街、淳朴民风却逐日清晰、亲切。她虽仍记得大海的辽阔浩瀚，很为随父母在海边散步的点滴记忆而自豪，却更加钟情于沂河岸边的葱郁清新并为之流连。

童年的学校生涯总是充满乐趣的，她和许多孩子一样，酷爱课堂，崇敬老师。老师们的博学令她倾倒，在老师那里，她走进了一个个新奇的崭新世界：数学家中睿智如高斯者，文学家博大如鲁迅者，哲学家深邃如洛德维希·费尔巴哈者……这期间她对老师的印象尤其深刻：优雅的板书动作，抑扬的讲课声音，亲切的慈祥笑容凭添了尚显幼嫩的向往，理想的种子开始萌动发芽。

于是，在面对爸妈及长辈关于“长大想干什么”的永恒问题时，她总是清脆而决断地回答：“当老师！”

然而，一场变故的出现竟然改变了她似乎已经确定的人生方向。9岁的弟弟因一次意外，眼睛严重受伤。眼看着年幼弟弟的痛苦表情，她心急如焚却无能为力。有一次她偶然听焦虑的父母说到，弟弟的左眼球似乎保不住了，有摘除的可能，她的心不能自己的颤抖，恨不得用自己的眼睛换取小弟的康复。她在焦灼痛苦中祈祷、期盼，只能看到日复一日父母的泪水、穿白色隔离衣的医生、护士叔叔阿姨匆匆进出的身影。当希望渐渐被绝望吞噬的时候，在医生、护士门的精心治疗、护理下，弟弟的眼睛开始向好的方向转化。终于，奇迹出现了，弟弟的眼睛恢复了清澈明亮！姐姐在欣喜若狂的同时，内心对医生这个职业陡然产生尚无理性的追求，以至于成为当即立断的决定：

“我要当医生！”

少年确定的人生目标是强大的推动力。在初、高中的6年中，她象一个听到发令枪响后冲刺出去的马拉松女孩，开始了漫长的奔跑。在这个现行教育体制铺就的跑道上，从始至终都是汗水，间或出现疲劳期，不断敲打着这个少女的意志，但她却矢志不渝，因为目标在前。

1987年9月，她如愿以偿以高分考入青岛医学院临床医学系。放下行李，她跑到海边，任海风扑面而来裹满全身，伸展双臂，默默呼喊：

“青岛，我回来了；青医，我来了！”

二

大学的5年，在人生历程中是短暂的，却是至关重要的。一方面，在优雅安静的校园里，她能感受到的就是对知识心无旁骛的孜孜吸取，而不被一个青春期女孩的美丽欲望所左右，最终以优异成绩毕业，成为一名医学学士。另一方面，5年的求学历程也为她提供了一次选择机会。青岛这个享名中外的美丽城市，对一个本来就是青岛小嫚而又刚毕业的大学生来说，发展的空间、机会，适宜的生活环境，众多的亲属的关照，无疑都是不可轻易拒绝的诱惑。她掂量着伯伯、叔叔、大姨关于留在青岛的劝说，心中却不免想起沂蒙山区人民面临的医疗状况；漫步于景色如画不忍割舍的海滨风景中的时候，眼前却总是浮现出救治弟弟的那些医生护士的身影。几经权衡，她毅然回到了临沂市人民医院，做了一名心内科医生。

平凡琐碎的劳作开始了。她每天奔波于门诊和病房，上班最早做准备工作的人中有她，下班后走的最晚的人中也有她。笑脸是她的个性特点，成为患者和同事们眼中的风景。这期间，她的医术渐趋成熟，也收获了自己的爱情，迎来了自己的女儿，成为一个美满家庭的主妇。同事们羡慕着她与公婆的和睦，丈夫女儿的温暖，渐渐提高的业务地位。她有时也感到，年轻人追求的生活，似乎可以称得上满足了。

然而，基于人天生惰性的闪念并不能改变好强争胜的马颖霞。孩子快一岁了，开始了生命自主行走的第一次尝试，也撩动着她看似几乎沉静却并不安份的心。她决定考研。她的决定在令全家短暂沉默后，得到了一致支持。丈夫爱她，包含爱她的执着；爸妈搞了一辈子机械，对从医的女儿心中的追求非常理解；公婆熟悉医疗行业，更渴盼家中出现医术精湛的成员。他们的共识很快达成：努力吧，家里有我们安排，孩子由我们照顾。

经过一年多的边工作边复习的努力，她考取了母校心血管专业硕士研究生。此时女儿刚刚两岁半。

貌似一次折返的过程，实为一次升华的起点。

三

如果说专业的选择是科研的起点，那么专业的深化便是科研的基本标志。

我们可以试着打个比喻，如果把心血管专业比作昆仑山脉和唐古拉山脉的话，那么研究的范围就太大了，譬如此山脉是如何形成的，气候特点是什么，对自然界的影响有哪些，等等，无穷无尽。而任何一个有抱负，有责任的科学家，都不可能将其穷尽，只能选择其一，追其究竟。这其中，高血压病如果比作长江源头的话，作为一项科研课题，便是她无悔的选择。

马颖霞投身到这项专业。

伴随着改革开放后国家经济的持续发展，人民生活水平也在显著提高。在不长的时期内，人们似乎还没从吃饭是第一件大事反应过来，竟然自己也想吃什么有什么了。这对泱泱中华来说，自然是好事，但却带来了一些负面问题。当人们满足口腹之欲而飘飘然之际，从各种数据看，我们民族中身体状态发生了悄悄的变化。高血压人口在增多，各种衍生疾病比例在提高，对人们生命健康构成的威胁亦在加大。这几乎成为一个带有明显时代色彩的诘问：谁来在这种经济环境、人文环境下做一个人民健康的卫士？

读研的日日夜夜里，马颖霞在这个专业上苦苦追索。她每天为患者服务，积累临床经验，寻找规律，晚上挑灯苦读，做理性的科研专题，思念女儿和家人几乎都成了奢侈。学业过去两年后，又通过一名教授的推荐，带着青医的基础，跳出青医来到北京大学医学院学习了一年。其间，她结识了许多国内外声名远播的教授、专家，视野开阔了许多，科研推进的有声有色。以至毕业时，北大医院已不舍这个年轻开朗的女研究生的离去，动议让其留下，但她婉拒了。她的事业和学业，浸透着沂蒙山多少人的期望，蕴含着家人多么深切的情感，寄托着临沂市人民医院9年培养的多少心血，她都知道，并成为她选择的理由。

研究生毕业后，她悄无声息地回到了临沂，回到了那个曾经十分熟悉的心内科，在不知不觉中成长为心血管专业的骨干力量，进入同事和院领导的视野范围。她专心致志地为专家做着助手，在心脏介入中，成为放射线下穿铅衣的为数不多的女大夫，为临沂这个综合性三甲医院在全国领先的心脏介入医疗中默默地做着贡献。同时，高血压专业仍是她主攻的方向，深入研究，触类旁通，积累资料，纵深探讨成为她医



在以色列做访问学者

疗工作中的重要部分。

四

人们常说，机会是为有准备的人准备的。其实，只有对有准备的人，机会才成其为机会，从这个意义上讲，机会的出现本身就和有准备者的努力密不可分。

2002年10月，医院领导准确把握了社会的需求和自身人才的实力，成立了老年心内科，任命马颖霞为主任，而其主攻任务便是高血压病的防治与诊疗。院领导对她的医术已了熟于心，语重心长地交代：“高血压病人逐渐增多，它导致的并发症致死率、致残率更高，都给社会和病人，尤其是老年人带来了严重后果。我们没有理由不重视高血压，应该有专门的医生来研发高血压，来治疗高血压病人。老年高血压病人占高血压病人的大多数，要静下心来做这个行业，并争取做大做强！”马颖霞记下了这些话，开始用实践来应答这或许不仅仅只是院领导个人的嘱托。

老年心内科成立伊始，病人多且杂，而且每个人都牵扯到几个家庭，必须小心翼翼，精心治疗，用温暖的心和精湛的医术使他们在生命之路上尽可能走的远一些、再远一些。而这是一个新设科室，人员医术水平乃至工作理念各有千秋，无不加重着这个年轻主任的压力。面对如此境况，尤其面对几乎从不间断的危重病人，这6年中，她几乎很少睡过囫圇觉。半夜起身赶往危重病房成了家常便饭。这期间，她养成了24小时不关手机的习惯，总是将其放在右耳侧伴其入眠。蜂鸣音一响立即起身，处理完后再蹑手蹑脚回来躺下，家人都经常不能觉察。

她的医术和医德感动了很多人，患者口头传播着，同事也在观察着。2005年，以色列来了个名叫博纳的老年病学专家，到临沂市人民医院作学术交流，不长时间，马颖霞的工作和专业素养就进入了她深邃的褐色眼睛。最初的两周，这位异国他乡的慈者不时出现在马颖霞的工作现场，后来十分绅士地和她作了一次开门见山的交谈。他说，以你的责任感、价值观念和专业技术，完全有必要出国深造。并为其如何申请以色列MATAT组织去以色列做访问学者，做了明确具体的交代。教授的热情邀请感动了马颖霞，也感动了院领导，不久便顺利成行。

作为以色列最大都市的特拉维夫和博纳教授，以犹太民族的友好热情接纳了年轻的马颖霞。巍峨的凯萨利阿古城、迷人的加利利湖以及与青岛海滨相媲美的特拉维夫西海岸，无不使

马颖霞惊讶与叹羨。但是她知道，她不可为此沉湎，她了解她的使命。在那短暂的三个月里，她如饥似渴地从MEIR医院的每位老师、每个细节中汲取有关的营养。博纳教授以犹太人特有的精细为她安排了缜密的学习计划。从怎样认识社会老龄化问题，到如何进行老年病医疗以至于如何管理老年患者，无不周到细致。她无法不被这里的氛围感染，以她特有的中华民族女儿的求知欲望和耐劳精神，如饥似渴的学习着，仅笔记就记了十余万字，在诸方面都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与进步。

谈到这段时间，她总是说：这真是我人生的升华阶段。

华丽的舞台上，必是演员汗水、天赋、环境、协作等因素的融合后，才能产生动人心魄、长盛不衰的剧目。在这之后，拉开的大幕展现出来的是珍珠般的成果。

2002年开始，连续获市科技一、二、三等奖一个；

发表《急性心肌梗死直接往皮腔内冠状动脉形成前后CK-MB的动态变化》等论文10余篇；

2006年获临沂市卫生局“十佳女医生”称号；

2007年荣获临沂市妇联“三八巾帼建功十大标兵”称号；

2008年荣获临沂市第三届“青年科技奖”；

2008年10月，任临沂市人民医院北城新区医院副院长、高血压科主任。

五

专家上门诊，看完前一个病号后，往往头也不抬地说：“下一个。”——这再普通不过了。

马颖霞有一次在北京安贞医院，随中国第一个高血压科主任余振球先生在门诊学习。她以女性特有的细心看到听到一个细节：余教授在处理完前一个病号后，对助手说：“请把下一个病人请进来。”

马颖霞的心灵便深深地震动了，就因为一个博导、一个中国高血压声高望重的专家的这一个“请”字。



关于医德，历来是马颖霞从医后心中的图腾，在这个自然的不能再自然的“请”字面前，她猛然醒悟到医德修养的无止境。在一个相对不发达市的医院，她最关注的是那些从农村来的患者，常常对同事更是对自己说：农村病人多不容易，哪个县到临沂也是几十上百公里，他们往往早晨四五点钟就起床，奔波半上午来到医院，排队挂号，然后检查、化验，一折腾就是下午了。我们不能尽力给他们一些方便，对不住良心了。

还有些山区农民，尚在没有完全脱贫的境况下，为了看病，有时是倾其所有。曾有一位农村患者，复诊时病历都被老鼠啃了，可见生活之窘迫。为此她时常感到怅然，只能尽力为他们多做一些，做好一些。

她尽量对患者热情，给患者方便，患者便记住她。一天她接待了一个山区来的甲亢患者，用很便宜的处方药，便使其疗效显著。几天后，这位山区患者竟带来了几个同类病人，点着名挂她的号。她解释，你这是常见病，不必专找某位大夫，都会看好的。他们却说，我们就找您，因为您这个大夫人好。一句话，差点把她说出眼泪。

为此，她结交了很多农民患者朋友，时常会有老人背着些萝卜、花生之类的农产品来看望她，原因便是那种亲和力。农民患者说，我们看病走科室耽误时间，人家马大夫会给我们引路，打电话介绍，弄得我们被一些科室当成马大夫的亲戚。亲戚嘛，哪有不走动之理？

患者的感激之情，有多种表达方式，其中也有些会在诸如病历、化验单什么的中间夹上几十甚至几百元钱，她总会把笑脸拉下来：你这就办的不合适了。这钱我拿了，我就看不起自己了；你们用到需要的地方，我心里就高兴了。相信你们会让我高兴的，你们也就高兴了，对不？

六

高血压，这个逐渐有肆虐迹象的病魔，在医学上还不能攻克。一想到这里，马颖霞心中总有些怅然以至悲壮，但更多的是不屈服。

市人民医院领导对此也有深刻见地，并于2011年4月成立山东省第一家高血压学术组织——临沂市高血压专业委员会，组建了高血压科。对此，一向深居简出的北京安贞医院高血压科主任余振球教授专程来临沂义务坐诊，并四处宣传：我就是为我国地市级医院第一个高血压科的建立而来的！是为支援马颖霞主任的工作而来的！

对于院领导和专家们的理解、支援，马颖霞似乎没有更多的感激语言，她有更多的梦想。梦想在她这代医学工作者中，能使高血压病得到更有效的治疗和控制，以造福于同类及其子孙。立志容易但毕竟苍白，重要的是不懈的努力。她于2011年又考取了山东大学医学院在职博士生，全力以赴在人生的巅峰时期登上高血压病学术研究的顶峰。

岁月在不经意间流逝。当年她立志为医学事业而拼搏并在最艰难起步中降临的女儿，已到了迎接高考的年龄。17岁的女儿是看着妈妈日夜为患者奔波中长大的，是听着妈妈有关医学的独特语言长大的。妈妈外出学习或上班时，爸爸偶染小恙，她总能说出个简单治疗方案、药品及用量，竟然十分准确。马上升高三了，马颖霞一天吃饭时突发灵感随口问女儿：

“闺女，明年考大学准备报什么专业？”

“当然学医了。”女儿脱口而出。

“就没有别的选择？”

“那就不知道选什么了。”

马颖霞一愣，随即欣慰地笑了。

1916—1949：临沂早期的报纸（下）

呼国英 刘金柱

三、解放战争中的不断胜利推动报纸成长壮大

抗战胜利后，随着解放区的不断扩大，作为山东解放区核心的沂蒙山区，以共产党及其领导的军队创办的报纸得到了迅速发展。1946年6月全面内战爆发后，国民党军队大举进攻山东解放区，迫于形势的恶化，有些报纸停刊、转移或压缩出版规模，一度进入低潮。进入解放战争后期，随着解放军不断取得胜利，国共两党军事实力此消彼长，战争形势发生了根本的变化。随着解放战争的不断胜利，党的新闻事业得到了迅速发展。一些一直坚持出版的报纸如《大众日报》不断成长壮大，成为具有巨大影响力的主流媒体。一些被迫停刊的报纸逐渐恢复出版，同时新的报纸纷纷创办，而且逐渐由农村转向城市。这一时期，在沂蒙山区的主要报纸除了《大众日报》外，还有《鲁南时报》、《鲁中大众》、《滨海农村》等。

创刊于1940年的中共鲁南区委机关报《鲁南时报》，抗战胜利之时改为铅印，报社人员也增加到269人。随着内战的爆发，报纸的宣传重点也转移到战场上。1946年底，解放军发起鲁南战役，期间，《鲁南时报》记者深入前线重点报道。战役前，发表了军区司令员张光中《谈鲁南战役前鲁南战局》的讲话，刊登了《蒋军在铜、枣、临、邳侵占区欠下人民一大笔血债》的文章。战役过程中，及时报道大量战绩、战况的消息通讯以及对战役的评论。如消息《解放峯县活逮马励武》、《峯县民兵、武工队收复三处敌据点》、《担架队捉俘虏》、《平邑七村群众忙着出担架》、《赵傅三区日夜忙着办给养》，评论《以积极的战斗动员来庆祝鲁南前线大捷》、《两个地区打胜仗说明了什么》等。

1947年春，国民党调集60个旅、45万人对山东解放区发动重点进攻，为适应战争需要，《鲁南时报》进行了整编，工作人员精简到173人，社长为赵宏弼，总编辑先是黄华，后为靳耀南，下设编辑部、新华社鲁南分社、秘书处。机关兵分三路：一路组成武装小分队，就地坚持斗争，保护工厂掩埋的物资、设备；一路参加地方武工队，配合大部队作战，完成战斗宣传任务；一路北撤滨海区，完成转移任务。报纸也暂时休刊。7月，鲁南军区司令部根据上级指

示，率军插回鲁南与敌人周旋，鲁南日报社机关转移人员也分三批陆续返回鲁南。同时随军的记者组一手拿笔一手拿枪出版战地小报，八九月间，敌人被迫撤出鲁南，记者组与报社机关会合。12月，《鲁南时报》第二次复刊。几个月后，为了适应人民解放军全面大反攻的需要，中央华东局决定将鲁南、鲁中、滨海三个区合并为鲁中南区，《鲁南时报》与《鲁中大众》合并出版《鲁中南报》，于是，《鲁南时报》于1948年2月15日停刊。

抗日战争胜利后，中共鲁中区委决定停刊《鲁中日报》，改出《鲁中大众》。1945年9月，《鲁中大众》在沂源县鲁村区舍庄出版了创刊号。

在改办《鲁中大众》时，区党委宣传部就要求报纸贴近人民群众。报纸要有鲁中地区特点，内容要准确充实，通俗易懂。遵照党委的要求，根据当时国民党当局不断侵袭解放区的形势，报纸报道内容确定以发展生产、支援前线为主线，重点报道群众的文化翻身、政治学习和普及日常生活常识等。如解放战争中的重大军事政治活动，鲁中地区各县农民一手拿枪、一手拿锄，劳武结合取得的新胜利，土地改革、生产备荒、支援前线以及群众学政治、学文化以及农村各类学校教育方面的动态，还有一些典型人物的事迹。全国劳动英雄朱富胜、孩子诗人苗得雨、学习模范高洪安等先进事迹在报纸上发表后，对当时开展生产救灾、促进农民文化学习都起到了重要作用。另外，报纸还开辟一些知识普及的小栏目，如“信箱”、“百事通”、“千里眼”、“小娱乐”、“生活常识”、“地理知识”和“庄户老师”等。

进入解放战争时期后，《鲁中大众》特别加强了军事报道，报纸大力宣传党中央、毛主席关于“不在乎一城一地的得失，而在于消灭敌人有生力量”的伟大战略思想，重点报道人民解放军在各个战场上取得的胜利，揭露国民党反动派的种种罪行。对于解放军在一些重要战役中取得的胜利，还采取发“号外”的形式，及时予以报道。如莱芜战役、孟良崮战役，都出过红字“号外”。

为了更好地服务群众，《鲁中大众》非常注意报纸的大众化。社长宫达非亲自编写了一本《大众化编辑工作》小册子，供编辑记者们学习。内容有“怎样写群众的思想、群众的感情”、“怎样运用大众化的语言”、“怎样编新闻的地方性”、“用群众自己的活动来教育群众”等等。在编辑工作中，编辑们把鲁中地区的方言与普通用语融为一体，成为一种读起来顺口、一听就懂的大众化语言。如在一篇介绍苏联军队的文章中写到：“苏联的陆军是世界上顶强大的，不管哪个国家都比不上。咱们都知道，美国的武器是很有名的，但是，若和苏联比起来，那就是潍县的地瓜一差得粗了。”“潍县的地瓜一差得粗”，是鲁中地区的歇后语，在文章中巧妙运用，使读者感到格外亲切。另外，当遇到一些生字、生词不易用地方用语代替时，就在“庄户老师”专栏里给予解释，帮助读者识字解意。由于报纸非常注意大众化，很受群众的喜欢，报纸发行量因此迅速增加，1946年发行5000多份，1947年末达到1万多份。

1947年初，《鲁中大众》为唤起“蒋管区”的人民团结起来求解放，受中共济南市委的委托，创办了以灰色面目出现的《晨钟报》、《民铎报》，通过党的地下组织发往蒋管区济南市。这两张报纸都是四开四版，不定期出刊。报纸经常刊载文章和一些幽默小品或明或暗地披露国民党军队在各战场上的失败及国民党政府的种种丑闻。如在一期《民铎报》上“春联”栏中，有一副供服装店用的对联写道：“领袖大小自我独裁，腰身肥瘦唯美是从”；一副供玩具店用的对联是：“坦克飞机大炮有美皆备，猪仔乌龟王八一一应俱全”（国民党政府于1946年11月15日召开“国民大会”，这期《民铎报》出版时，恰在所谓“国大”闭幕不久，故此联提的“猪仔”，明眼人一看便知为揭露“国大”的实质）。

《鲁中大众》十分重视做好工农通讯工作，以此加强党报与群众的联系。在《鲁中日报》时期，报社就响应党中央提出的“全党办报，群众办报”的号召，积极地在各级党政机关干部中和工农群众中发展通讯员，建立通讯网。通过建立通讯网，成立读报组，指导工农

通讯员办黑板报。同时通过工农通讯员来稿情况，了解基层动态，发现问题，及时上报，供领导参考。为了提高工农通讯员的文化水平和写作能力，报社要求对编辑对通讯员的每件来稿都要有处理意见，每封来信要有回信，通讯员在来稿中出现的错别字，要在回信中给予指正。“孩子诗人”苗得雨，就是这样培养起来的。报纸也经常刊登各地开展通讯工作的经验，这样一来，整个鲁中地区通讯工作蓬勃发展起来，通讯组星罗棋布，仅在册的通讯组就有1000多个。

蹲点采访，深入一线写报道，是《鲁中大众》记者工作的一大特点。记者一般都能做到蹲点采访，深入群众，深入工作全过程，开展报道。这样，报纸上一般的动态消息少了，典型报道多了；综合性报道少了，一人一事多了。当时，由新华社鲁中分社（与《鲁中大众》是一个机构）报道室编发的记者稿件，曾受到大众日报社社长匡亚明的表扬。他在1946年8月一次报告会上说：“各分社的工作，最近一般是有进步的，特别是鲁中分社……有些来稿，是超过总分社自己某些编辑水平的。这是很可喜的。”

随着解放战争的逐步发展，为了加强军事报道，《鲁中大众》以报道室为主组成新华社鲁中前线支社，携带发报机随军赴前线采访。他们既是记者，又是战斗员。莱芜战役打响后，记者乔子林在一次战斗中，活捉敌军一名，缴获手枪一支、子弹若干发。前线支社以《记者捉俘虏》为题播发了战地通讯。《鲁中大众》随即发表，并通报表扬。

1947年春，国民党军队向解放区发动进攻，鲁中地区形势发生急剧变化。为了配合对敌斗争，《鲁中大众》坚持出版。报社将病弱人员和部分妇女转移到渤海地区，留下不足百人坚持工作。同年7月24日，临朐战役打响，当晚大雨倾盆，解放军在大量歼敌后转移新阵地。报社全体人员在宫达非率领下，冒雨由临朐县包袱岭村出发，开始连续、紧急地夜行军。次日上午抵达益都县王坟，稍加休整，随即转战至博山和庄、莱芜县常庄。接着夜渡大疃河，强行穿过泰安范镇敌军防线，挺进徂莱山，在通过上述地区时，与尾随敌军相距不过1.5公里，有时与敌人擦肩而过，还有“还乡团”的骚扰和阻挠，但报社人员在解放军的掩护下，克服种种困难，胜利进入蒙山县垛庄，继而来到沂南马牧池，最后进驻沂源县马家河西村。这次急行军历时40多天，辗转十多个县，行程500多公里，报社人员无一掉队，无一伤亡。

《鲁中大众》报社迁至沂源县马家河西村后，由于鲁中地区遭受敌人重点进攻，农村经济受到极大破坏，救灾成当务之急，再加上群众作坊的手工制纸已大部停止，纸张奇缺。在这种情况下，中共鲁中区党委根据中共中央“三大方案”指示精神，决定停办《鲁中大众》，全力投入生产救灾。1948年2月，《鲁中大众》在马家河西村出了最后一期报。该报从1945年9月创刊到1948年2月停刊，共出版200多期。

《鲁中大众》停刊后，新华社鲁中分社仍然保留。这年6月，分社迁至沂中县贺庄，8月再迁古城，在此与鲁中南分社合并，成为新华社鲁中南分社。

抗日战争胜利前夕，《滨海农村》在莒南县诞生。日本侵略军投降后，形势发生了根本性改变。为了更好地发挥报纸在新时期的宣传作用，中共滨海区委（1946年改为滨海地委）充实了报社力量，扩大了印刷厂。社长由滨海军区政治部主任赖可可兼任，辛纯为总编辑。报纸于1946年元旦起由石印改为铅印，由八开二版三日刊改为四开四版二日刊。此时，滨海区已经全部解放，报纸的宣传中心主要围绕新区的反奸反霸、减租减息，老区则是“双减”复查、组织互助、发展生产、繁荣经济和文化展开。如在“双减”复查中发现一个村有些干部收发公粮时在秤上捣鬼，从中贪污，报纸就登了一条短消息，题目叫《放屁秤》，引起了强烈反响。针对当时在一些工农干部中存在的轻文化的现象，以“工农分子大老粗”为荣。报纸就在工农通讯员中抓典型，树榜样，进行大力宣传。农民通讯员王安友，雇工出身，本是文盲，翻身后走上了领导岗位。他深感没有文化之苦。担任区干部以后到县上开会，领导讲话、布置工作只能靠脑子记，结果回来只记住了几句话，无法贯彻，内心十分痛苦。报社开展工农通讯运动，他当上了通讯员，便下决心学文化。他经常夜晚独守油灯刻苦学文化练



习写作。一连给报社写了40多篇稿都没被采用，他也不灰心。报社通联科的同志为帮他学习，就把稿上的错别字改正过来再寄给他，供他对照学习。不久，他就成了得力的工农通讯员，后来还成了作家，写出了成名作《李二嫂改嫁》。报上经常刊登王安友的事迹，有力地推动了工农学文化的开展。

内战爆发后，《滨海农村》积极宣传中国共产党和平建国的基本方针，揭露国民党假和谈真备战和破坏“双十协定”和“停战协定”的行径，动员群众保卫解放区，保卫胜利果实，支援前线，打击进犯的敌人。如国共两党签订“双十协定”后，国民党的宣传工具大肆宣传共产党“破坏交通”，并借口“恢复交通”向解放区进攻。《滨海农村》针锋相对，及时报道了滨海区的交通建设成就，戳穿了国民党的谎言，新华社总社也马上给予广播。

1948年1月22日，由于机构调整，《滨海农村》随之停刊，完成了它的使命。

《鲁中南报》是中共鲁中南区党委机关报，1948年9月26日创刊，三日刊，四开四版，铅印，1950年1月16日改为二日刊，同年因区划调整，鲁中南区党委撤销，该报于4月20日停刊，共出版216期。

1948年7月17日，中共华东局根据党中央的决定，将鲁中、鲁南两个区党委合并，成立鲁中南解放区党委。

1948年三四月间，解放战争即将取得全面胜利，中共中央华东局为了便于统一领导，决定撤销中共鲁南区党委、鲁中区党委、滨海地委，成立鲁中南区党委。管辖范围东临黄海，西濒运河，南起陇海铁路，北至胶济铁路，纵横600余里，区间包括鲁中、鲁南、滨海及泰西地区，是当时山东的战略中心。其行政设置为：一地委（泰山区）、二地委（沂蒙区）、三地委（沂山区）、四地委（尼山区）、五地委（台枣区）、六地委（滨海区）、七地委（泰西区）和淄博特委，后来又增设了徐州市委、济宁市委和新海连特委。7月18日，在鲁中区党委驻地沂水县武家洼召开大会，宣布鲁中南区党委正式成立，鲁中南军区亦同时成立。

鲁中南区党委正式成立后，决定《鲁南时报》（中共鲁南区委机关报）和《鲁中大众》（中共鲁中区委机关报）合并，创办新的党委机关报《鲁中南报》。报纸在沂水古城村创刊。10月，搬到临沂城附近的曲沂。1949年7月，迁至临沂城内，不久又随鲁中南区党委进驻曲阜，直至1950年停刊。

报社成立之初，鲁中南区党委宣传部副部长于寄愚兼任社长、总编辑。原《鲁南时报》社社长赵宏弼任副社长，原《鲁中大众》报社社长官达非任副总编辑。鲁中南区党委书记康生题写了报头。

鲁中南区党委对报社工作非常重视，十分强调“报纸的党性”、“党的喉舌作用”。认为党委通过党报领

导工作，是一个很重要的手段。因此报社编辑部必须配合党的工作，起到集体的宣传作用和组织作用。《鲁中南报》创刊时，正值中共中央作出《关于宣传工作中请示报告制度的决定》，决定要求：“各地党报必须执行毛主席所指示的由各地党的负责人看大样制度。每天或每期党报的大样须交党委负责人或党委所指定的专人作一次负责的审查，然后付印。”因此，《鲁中南报》创刊号的大样和最初的几期大样，都由区委党委审查。报纸的社论，被认为是为党对地方工作指示的另一种形式。所以这些社论都要送党委审查，或由党委负责人撰写。社长兼总编辑于寄愚就经常撰写社论。有时为写好一篇社论，吃了晚饭就到报社，在小油灯下熬夜，太晚了就在报社住一宿。

《鲁中南报》创刊后，续承和发扬了《鲁南时报》、《鲁中大众》大众化、通俗化的传统。当时解放区党的工作重点仍在农村，承担战争和支前这两项艰巨而光荣任务的也都是农民。在农民中，文盲超过90%。一些干部和劳动模范，也不过粗识几个字，甚至只认识自己的名字。为了适应报纸读者对象的文化水平，编辑和记者写评论、消息、通讯，都提倡通俗化、口语化。编辑、记者的口袋里，经常装着一个本小本子，专记群众中的“庄户话”，供写作时参考。他们每次下

笔写稿、编稿，都尽量使读者能念懂、听懂。如有一篇报道，其中有“群众不禁潸然泪下”的句子，编辑反复思考，把它改成“大伙都难过得流泪了”。由于报纸文章通俗易懂，受到了广大农民群众的喜爱，被称为“庄户人的庄户报”。1949年“九一特刊”刊载的一封信读者来信《我爱鲁中南报》中写道：“鲁中南报能推动我的工作，如拔除高粱乌霉、抗旱、防涝、沤肥、度荒、检查代耕。我们年青不了解种庄稼的事，也不了解季节，看了报，对群众宣传有了本钱，同时也学会字的用法与讲法，个人感觉比今春上有些进步……。报上登的妇女要解放，须要参加生产劳动，我就用大字抄写下来，贴在高家沟的墙上，当日下午高为岭大爷念给妇女听。我又根据这个教育了妇女，打破了这村妇女普遍认为下田野劳动丢人的想法。妇女党员高秀兴领导妇女组织了两个互助组，共二十余人抗旱浇园，节省了好多男劳力，突击夏锄……。”

《鲁中南报》的通讯工作，也是在原三个报社（《鲁南时报》、《鲁中大众》、《滨海农村》）开展工农通讯工作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报社初建时，只《鲁中大众》一个报社就有工农通讯员2300多名，三个报社的工农通讯员加起来近5000名。多数工农通讯员都是村干部、劳动模范和学习模范。鲁中南区党委重视对工农通讯运动的领导，作为贯彻“全党办报”的重要一环。区委副书记高克亭专门为报社写了《进一步发展工农通讯运动》的文章。为了培养通讯员，报纸开设了“工农习作”专栏，发表工农通讯员的文章。提出“工农写，写工农”的口号，以激励工农通讯员积极写稿。如被誉为“孩子诗人”的苗得雨，被介绍为工农通讯员时，只是一个上了二年私塾、一年小学的14岁的少年，不到两年间，他就用打油诗、顺口溜的形式给报社写了几百篇稿子。淮海战役期间，他还用这种形式写了《支援淮海大战七章》，投到《鲁中南报》。其中有一首《碾米》写道：

吱咯吱，碾儿响，
家家碾米日夜忙。
推的推，簸的簸，
称的称，装的装，
簸得小米没有糠，
做饭保管扑鼻香。
忙忙忙，急忙送前方，
淮海大战灭蒋军，
我军眼看就要渡长江！
大军解放全中国，
人人都要献力量。



1949年春，全国第一次青年代表大会在北京（时称北平）召开，苗得雨以《鲁中南报》优秀工农通讯员、孩子诗人、学习模范等条件，被选为出席这次大会的代表。

《鲁中南报》一建立，即与新华社鲁中南分社一起办公，当时是一个机构两个牌子，官达非兼任分社社长。在选稿过程中，总编认为哪篇稿件有全国意义，即指定电发新华社。随着形势和工作的发展，分社也就有了自己的建制。当时正值解放军发起济南战役，在“一切为了前线”的口号下，分社到济南前线建立了前线支社，接着又派人去徐州建立了新华社徐州分社，并创办了《徐州日报》。

解放以后，1950年1月16日报纸改为二日刊。在“改版的话”中指出：“今后鲁中南报的任务，以乡村为主，并兼顾城市。在编辑方针上强调对实际工作的指导，与群众密切联系，加强指导性，力求大众化。”

1950年5月，中共中央山东分局作出关于撤销区党委并调整各地委的决定。《鲁中南报》奉命于4月20日停刊，完成了它的使命。

在解放战争时期，除各级党委办的报纸外，军队的报纸较有影响的有《前卫报》、《麓水报》。

《前卫报》由鲁中南军区政治部主办，1948年10月10日创刊，四开四版（有时出六版、八版），周二刊。

1948年年8月，鲁中军区和鲁南军区合并成立了鲁中南军区。原鲁中军区政治部的机关报《前卫报》也与原鲁南军区政治部的机关报《前进报》合并。鲁中南军区决定仍以《前卫报》为名，创办军区政治部机关报。鲁中南军区党委在《关于出版前卫报的决定》中指出：

“前卫报是区党委领导下军区军政工作建设的指导武器，是军区的机关报，是代表区党委与军区向全体指战员说话的。它宣传与贯彻毛泽东的建军思想与军事原则。它宣传与贯彻党的号召与政策。它宣传党委与军区的工作指示。这一切宗旨，必须加以研究切实执行。”

渡江战役后，全国形势发生了重大变化。军队的机构和干部也有所调整。1950年5月，因区划调整，鲁中南区党委和行署撤销，但鲁中南军区仍保留，并从曲阜迁到邹县。1952年6月，鲁中南军区奉命撤销，《前卫报》随之停刊。

《麓水报》由山东解放军第八师政治部主办，其前身为《前线通讯》，1946年12月13日纪念师长王麓水牺牲一周年时，改称《麓水报》，后为中国人民解放军华东野战军第三纵队党报、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十二军军报，1952年4月停刊。

1945年6月，鲁南解放军三团、五团及铁道队改建为第八师，王麓水任师长兼政委。八师建成后，师政治部于6月底出版了《前线通讯》八开油印不定期小报。1945年12月13日，在解放滕县战斗中，师长王麓水牺牲。1946年纪念王麓水牺牲一周年时，八师政治部决定将《前线通讯》改名为《麓水报》，陈毅题写了报头。1947年1月，以八师为骨干的七、八、九三个师组建华东野战军第三纵队，《麓水报》成为纵队党报。新华社华东分社同时成立，报社、分社是一个机构负责两项任务：出报纸和向新华社发稿。解放战争开始，报纸曾改为十六开，二三天一期。1949年2月16日，三纵改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十二军，《麓水报》成为该军军报。

此外，这一时期的报纸还有中共临沂县委创刊于1945年10月的《临沂通讯》报纸为八开四版，油印，周刊，停刊于1947年3月中旬，共出刊60多期，以及国民党临沂县党部1947年3月办的《辅民周报》等。

综上所述，在沂蒙大地上，从辛亥革命以来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诞生了大量的报纸，只有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军队创办的报纸成为这一时期的主流媒体，并随着革命的不断胜利得到长足的发展，起到了卓有成效的“组织、鼓舞、激励、批判、推动”的作用，在中国新闻史上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东海郯徐氏

唐士文

一、东海郡与郯县政区设置及演变概况

周武王姬发灭商建立西周（公元前1027年）后，封东夷族首领少皞（一作少昊，姓已名摯）的后裔于炎地，称炎国，不久改为郯国，为子爵。郯国国都设在今郯城县城北隅。鲁宣公四年（公元前605年），“宣公及齐侯平莒及郯”（《春秋左传·宣公四年》），郯国为鲁国之附庸。鲁襄公七年（公元前566年）“春，郯子来朝，始朝公也”（《春秋左传·襄公七年》）。晋烈公四年（前412年），“於粵伐郯，以郯子鹄归”（《竹书纪年》），郯国被於粵即越国灭亡，归越。周显王十四年（公元前355年），楚灭越，郯又归楚。秦始皇统一中国后，分天下为三十六郡，后增至四十多郡，郯郡为其中之一，郡治于“郯国故城”。西汉初期，郯郡仍在，高帝刘邦六年（公元前201年），“以碭郡、薛郡、郯郡三十六县立弟文信君交为楚王”（《汉书·高帝纪》）。不久，改郯郡为东海郡，并置郯县，郡、县同治。《汉书·地理志》记载东海郡“户三十五万八千四百一十四，口百五十五万九千三百五十七。县三十八：郯、兰陵、襄贲、下邳、良成、平曲、戚、朐、开阳、费、利城、海曲、兰祺、缙、南成、山乡、建乡、即丘、祝其、临沂、厚丘、容丘、东安、合乡、承、建阳、曲阳、司吾、于乡、平曲、都阳、阴平、郟乡、武阳、新阳、建陵、昌虑、都平。”唐代颜师古为《汉书》作注释，在东海郡下注：“高帝置，莽曰沂平，属徐州。应劭曰：秦郯郡。”在郯下注：“故国，少昊后，盈姓。应劭曰：音谈。”应劭，东汉汝南南顿（今河南项城西）人，著有《汉书集解音义》，颜注源于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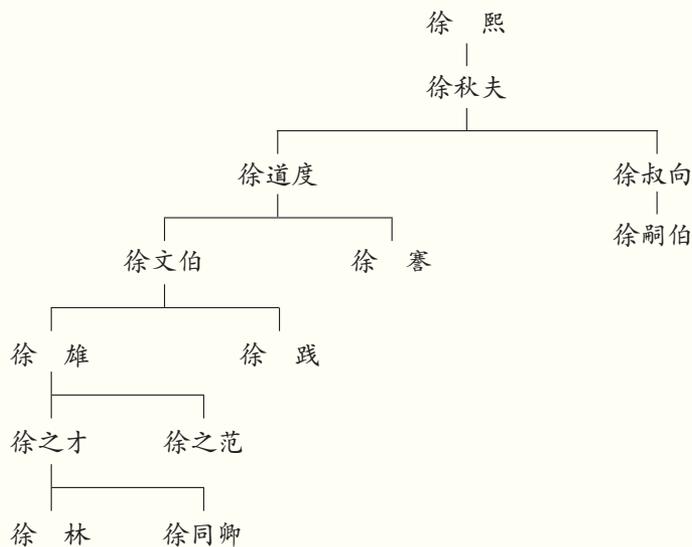
东汉时，东海郡政区范围缩小，辖郯、兰陵、戚、朐、襄贲、昌虑、承、阴平、利城、合城、祝其、厚丘、赣榆十三县，计148784户，706416人（《后汉书·郡国志》）。三国魏黄初年间（公元220—226年间），改东海郡为东海国，仍治于郯县。西晋初年，将东海国改为东海郡。晋惠帝时（公元290—306年），又改东海郡为东海国。

南朝宋时，改东海国为东海郡，辖郯、祝其、朐、襄贲、利城、赣榆、厚丘、兰陵、承、昌虑、合乡、戚十二县（《晋书·地理志》）。东魏武定八年（公元550年），改东海郡为郯郡，仍治于郯县。北齐废郯郡和郯县。北周大象元年（公元579年）恢复郯郡、郯县，治于原郯县。隋开皇初年（公元581年），废郯郡，郯县改属泗州。唐贞观元年（公元627年）撤销郯县并入下邳。元和年间（公元806—820年）置郯城县，属沂州。郯城称县，至今1200年左右。

二、徐氏起源及其世系

对于徐氏起源及其世系，《新唐书·宰相世系表》记载：“徐氏出自嬴姓。皋陶生伯益，伯益生若木，夏后氏封于徐，其地下邳僮县是也。至偃王三十二世为周所灭，复封其子宗为徐子。宗十一世孙章禹，为吴所灭，子孙以国为氏。章禹十三世孙诜，为秦庄襄王相。生仲，仲字景伯。生延，字方远。延生由，字智卿。由生该，字昌言。该生光，字子晖，汉下邳太守。光生

表二（东晋至北朝北周）：



三、东海郟徐氏名人事略（东晋至唐）

徐羨之

徐羨之（364—426年），字宗文，南朝宋大臣。祖父徐宁，字安期，“通朗博涉”、“真海岱清士”（《晋书·桓彝传》），仕东晋为尚书吏部郎，授江州刺史，未拜而卒；父徐祚之，东晋上虞县令（《新唐书·宰相世系表》称其字兴民，任秘书监）。徐羨之早年任太子太傅王雅主簿、刘牢之镇北功曹。东晋元兴元年（公元402年），他与后来的宋武帝刘裕同为抚军将军桓修的中兵参军，两人关系密切。是年，荆、江二州刺史桓玄率兵攻入建康，放逐太傅、会稽王司马道子，杀骠骑大将军、会稽王世子司马元显，专制朝政。次年，桓玄自称帝，改国号为楚。元兴三年，刘裕起兵讨篡晋之桓玄（西逃被益州兵杀死），恢复晋安帝皇位，表荐徐羨之为领军参军，后累官至鹰扬将军、琅邪内史。义熙十二年（公元456年），太尉刘裕率兵北伐后秦，以徐羨之为太尉左司马，作为左仆射刘穆之的助手，处理太尉府政务。当时，朝士多劝谏刘裕不要北伐，唯徐羨之沉默不语。有人问他为何，他说：“今二方已平，拓地万里，唯小羌未定，公寝食不安，何可轻预其议。”义熙十四年刘穆之去世，刘裕以徐羨之为丹阳尹，总知留任，加尚书仆射。

永初元年（公元420年）六月，刘裕代东晋建南朝宋，是为宋武帝。以徐羨之为镇军将军加散骑常侍，又为司空、录尚书事、扬州刺史，封南昌县公。徐羨之“起自布衣，又无术学，直以局度，一旦居廊庙，朝野推服，咸谓有宰臣之望。沉密寡言，不以忧喜见色。颇工弈棋，观戏常若未解，当世倍以此推之”。大臣傅亮、蔡廓称“徐公晓万事，安异同”（《南史·徐羨之传》）。

永初三年五月，刘裕病逝。司空徐羨之与中书令傅亮、领军将军谢晦、镇北将军檀道济同为顾命大臣。少帝刘义符继位后，耽于游乐，不理政事，徐羨之等谋废少帝。考虑废少帝后，依次当立刘裕次子庐陵王刘义真，而刘义真“多过，不任四海”，于是于元嘉元年（公元424年）以刘义真与太子左卫率谢灵运、员外常侍颜延之等煽动反对朝廷为借口，废刘义真为庶人，放逐于新安郡。同年五月，废少帝为营阳王，送到吴郡。立刘裕第三子刘义隆为帝。六月，徐羨之派人杀刘义符、刘义真。八月，刘义隆即帝位，是为宋文帝，改封徐羨之

为南平郡公，进爵为司徒。元嘉二年正月，徐羨之与傅亮归政于文帝，辞官回私宅。在其兄子吴郡太守徐佩之和吴兴太守王韶之等苦劝下，徐羨之又奉诏摄政。次年正月，宋文帝以徐羨之、傅亮和谢晦杀害少帝和刘义真之罪而诛杀他们。徐羨之得到消息后，乘内人问讯车出郭，步行至新林自缢而死，时年63岁。其子徐乔之，娶宋高祖刘裕第六女富阳公主，官至竟陵王文学，与弟徐乞奴被诛。《全宋文》存《徐羨之集》。

徐佩之·徐逵之

徐佩之（？—426年），南朝宋官员。系司徒徐羨之兄子。其父徐欽之，字真宇，位秘书监。徐佩之轻薄好利，因其弟徐逵之娶宋武帝长女会稽宣公主，刘裕考虑他系皇室姻戚，累加宠任，先后任丹阳尹、吴郡太守等职。景平初年（公元423年），徐羨之掌握朝中大权，徐佩之颇预政事，与王韶之、程道惠及中书舍人邢安泰、潘盛为党。当时领军将军谢晦久病，不能见客，徐佩之等人疑其托病有异图，与王韶之、程道惠同乘车拜见中书令傅亮，称徐羨之意，欲令作诏诛谢晦。傅亮说：“我等三人同受武帝顾命，岂可自相残戮。”徐佩之等乃止。元嘉三年（公元426年）正月徐羨之被诛，宋文帝特地宽恕了徐佩之，仅免官而已。同年冬，徐佩之谋反事泄被诛。

徐逵之（？—415年），字幼道，系徐佩之弟。东晋时，娶刘裕长女会稽宣公主刘兴弟，任振威将军、彭城沛二郡太守。刘裕诸子并幼。考虑他乃姻戚，将委以重任，想令其先立功。义熙十一年（415年）三月刘裕讨伐荆州刺史司马休之，使徐逵之统军为前锋，待攻克司马休之后授荆州刺史。在与竟陵太守鲁轨交战中，徐逵之阵亡。追赠为中书侍郎，有子徐湛之、徐淳之。

徐湛之

徐湛之（410—453年），字孝源，南朝宋大臣。系徐逵之长子。其母系宋武帝刘裕长女会稽宣公主刘兴弟。幼孤，为刘裕所爱。徐湛之幼而有识，及长，颇涉大义。年数岁时，与弟徐淳之坐牛车外出，牛奔车坏，左右的人跑来抢救，他让大家先救起弟弟，众人皆叹其幼而有识。“事祖母及母以孝闻”。他初任黄门侍郎，永初三年（公元422年），被封为枝江县侯。元嘉二年（公元425年），除著作佐郎、员外散骑常侍，并不就。元嘉六年，任太子洗马，转国子博士，迁奋威将军、南彭城沛二郡太守。迁黄门侍郎，不拜，复授南彭城、沛二郡太守，加辅国将军。迁秘书监，领右军将军，转侍中加骁骑将军。复为秘书监，加散骑常侍。

宋武帝刘裕未发迹时，十分贫寒，曾自往新洲伐荻，有纳布衣袄等，皆其妻臧爰亲自作。刘裕显贵后，以此衣付于长女刘兴弟说：“后世若有骄奢不节者，可以此衣示之。”徐湛之为彭城王、大将军刘义康所爱，与主持朝政的领军将军刘湛等“颇相附协”。及元嘉十七年刘湛获罪下狱被诛杀，株连徐湛之。宋文帝大怒，将严加惩处。徐湛之忧惧无计，以告其母。会稽公主即日入宫，见到宋文帝大哭，以锦裹盛刘裕纳衣，掷地以示文帝说：“汝家本贱贫，此是我母为汝父作此纳衣。今日有一顿饱饭，便欲残害我儿子。”文帝亦号哭，徐湛之由此得免。再迁太子詹事，寻加侍中。

徐湛之善尺牍，音辞流畅；贵戚豪强，产业甚厚，室宇园池，贵游莫及，伎乐之妙，冠绝一时。门生千余，皆三吴富人子，姿质端美，衣服鲜丽。每出入行游，途巷盈满。宋文帝每嫌其侈纵。当时安成公何勗，何无忌之子；临汝公孟灵休，孟昶之子，并名奢豪，与徐湛之以肴膳器服车马相尚，京都人为之言语曰：“安成食，临汝饰。”徐湛之美兼何勗、孟灵休。

元嘉二十二年（公元445年），彭城王刘义康和范晔等谋反，欲刺杀宋文帝，徐湛之被他们私下封为抚军将军、扬州刺史。刺杀文帝事败，刘义康被废为庶人，范晔、谢琮等被处死。有司以徐羨之关豫逆党，请免官削爵，付廷尉，文帝不许。元嘉二十四年，由丹阳尹加散骑常侍，转为中书令、太子詹事，出任前军将军、南兖州刺史。在郡善政俱肃，威惠并

行。在广陵（今江苏扬州）修整高楼，南望钟山。城北有陂泽，水物丰盛，他修建风亭、月观、吹台、琴室，招集文士，尽情游玩。元嘉二十六年，徐湛之入朝为丹阳尹、领太子詹事。元嘉二十八年，转尚书仆射，领护军将军。因与尚书令何尚之互相推诿，被御史中丞袁淑奏并免官。元嘉三十年正月，太子刘劭弑宋文帝，徐湛之同时被害，时年44岁。宋文帝第三子武陵王刘骏讨灭刘劭即帝位，是为孝武帝，追赠徐湛之为司空，谥曰忠烈公。《全宋文》存《徐湛之集》。其有三子：徐聿之、徐谦之被太子刘劭所杀；徐恒之娶宋文帝第十五女南阳公主，早卒，无子。

徐孝嗣

徐孝嗣（453—499年），字始昌，南朝齐大臣。祖父徐湛之为宋司空；父徐聿之（《南齐书》、《南史》均载，而《新唐书·宰相世系表》言其父为徐恒之，恐误）为著作郎。元嘉三十年（公元453年）正月其祖父、父被太子刘劭杀害时，徐孝嗣在孕，及生，小字遗奴。他8岁袭爵枝江县侯，见宋孝武帝，升阶流涕，帝甚爱之，娶康乐公主刘脩明，拜驸马都尉，后为司空、太尉二府参军，安成王刘准文学。昇明（477—479年）中，为萧道成骠骑从事中郎，带南彭城太守，转太尉咨议参军。萧道成代宋建齐后，为晋陵太守，太子中庶子，宁朔将军。迁尚书吏部郎，太子右卫率，累迁长兼侍中，再转御史中丞。齐武帝萧赜问尚书令王俭“谁可继卿”，王俭回答：“臣东都之日，其在徐孝嗣乎。”出为吴兴太守。

永明七年（公元489年）王俭去世，齐武帝征徐孝嗣为五兵尚书。次年，迁太子詹事。竟陵王萧子良对徐孝嗣很好。历任吏部尚书，右军将军，领太子左卫率，台阁事多以委之。永明十一年齐武帝去世，遗诏以徐孝嗣为尚书右仆射。隆昌元年（公元494年），郁林王萧昭业在帝位，任其为散骑常侍、前将军、丹阳尹。萧鸾谋废郁林王，徐孝嗣以废立之功，封枝江县侯，转左仆射。齐明帝萧鸾即帝位，进爵为公。建武四年（公元497年）尚书令王晏遭齐明帝猜忌被杀，由徐孝嗣任尚书令、开府仪同三司，让不受。时连年北魏军扰，国用虚乏，徐孝嗣上表议立屯田，认为“淮南旧田，触处极目，陂遏不修，咸成茂草”，“今边备既严，戍卒增众，远资馈运，近废良畴，士多饥食，可为嗟叹”。建议“使刺史二千石躬身履行，随地垦辟，精寻灌溉之源，善商肥确之异，州郡县戍主帅以下，悉分番附农”。如分兵屯田，做到“缘边足食，则江南自丰”，国家也就强盛了。由于齐明帝已患病，兵事未已，其议“竟不行”（《南齐书·徐孝嗣传》）。

建武五年，齐明帝临终前，加徐孝嗣中书监。永元初（公元499年），辅政于东昏侯萧宝卷，自尚书下省出住宫城南宅，不得还家。东昏侯失德，徐孝嗣不敢谏。及大臣江祐被杀，始安王萧遥光谋反平定，“群小用事，不能制也”。东昏侯进徐孝嗣为司空，他固让，求解丹阳尹，不许。虎贲中郎将许准有胆力，劝他废东昏侯，他“虽有此怀，终不能决”。群小憎恨徐孝嗣，劝东昏侯将其除之。是年冬，被赐毒药死于华林省。中兴元年（公元501年），齐和帝萧宝融赐徐孝嗣为太尉，次年谥曰文忠，改封余干县公。

徐孝嗣爱好文学，器量弘雅，不以权势自居，著有文集10卷，已佚。清人严可均《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辑其文4篇，明人冯惟讷《古诗纪》存其《白雪歌》一首。其长子徐演，娶齐武帝女武康公主，位太子中庶子；第三子徐况，娶齐明帝女山阴公主，并拜驸马都尉，俱被东昏侯所杀。另有子徐缙，仕梁，位侍中，太常，信武将军，谥曰顷子。

徐熙（附子徐秋夫，孙徐道度，曾孙徐文伯、徐睿、徐嗣伯）

徐熙，仕东晋为濮阳太守。好黄、老之术，隐于秦望山。有一道士经过求饮，留下一个葫芦对他说：“君子孙宜以道术救世，当得二千石。”徐熙打开，乃《扁鹊镜经》一卷。“因精心学之，遂名震海内”（《南史》卷三十二）。

徐熙子徐秋夫，工医术，仕至射阳令。曾夜间有鬼呻吟，声甚凄怆。徐秋夫问何须，答言姓某，家住东阳，患腰痛而死。虽为鬼痛犹难忍，请疗之。徐秋夫问如何为其治疗，鬼请作一刍人（草人），按孔穴针之。徐秋夫为刍人针灸四处，肩井三处，设祭埋之。第二天见

一人谢恩，忽然不见。“当世伏其通灵”。

徐道度，徐秋夫长子，南朝宋名医。其弟徐叔向亦精医学。徐道度有脚疾行走不便，宋文帝刘义隆令乘小舆入殿，为诸皇子疗疾，“无不绝验”。宋文帝把杜道鞠弹棋、范悦诗、褚欣远模书、褚胤围棋和徐道度疗疾，称为“天下有五绝”。徐叔向著作甚多，《隋书·经籍志》著录《徐叔向杂病方》六卷，《徐叔向杂疗方》22卷，《徐叔向疗脚弱杂方》八卷，《徐叔向少小百病杂方》37卷，可惜均已失传。

徐文伯，字德秀，徐道度子。善医术，兼有学行，倜傥不屈意于公卿。宋孝武帝路太后有病，徐文伯诊之曰：“此石搏小肠耳。”乃为水剂消石汤，病既愈。除鄱阳王常侍，遗以千金。宋明帝刘彧宫人患腰痛牵心，每至则气欲绝，众医以为肉症。徐文伯以为“此发症”，以油投之，即吐得物如头发，病愈。宋后废帝刘昱善疹，一次出乐游苑门，有一妇人育娠，诊之“此腹是女也”。问徐文伯，徐称“腹有两子，一男一女，男左边，青黑，形小于女”，后果如其言。徐文伯仕宋为东莞、太山、兰陵三郡太守（见《北史》卷九十）。

《隋书·经籍志》著录其《徐太山巾箱中方》三卷，《徐太山试验方》二卷，《徐太山堕年方》二卷，《徐文伯疗妇人瘕》一卷，《徐文伯药方》两卷等，均已散佚。

徐睿，字成伯，系徐文伯弟，善医药。慕容白曜平东阳时，他正在青州，被获之，送京师。北魏献文帝拓跋宏试验其能，置病人于帷幕中，让徐睿隔帷而脉，“深得病形，兼知色候。遂被宠遇”。为中散，不久迁内行长。文明太后时问经方，而不及李脩之见任用。徐睿合和药剂攻疗之验，比李脩之精妙。孝文帝元宏迁都洛阳后，适所宠爱冯昭仪有病，皆令徐睿治疗。除中散大夫，转侍御师。太和二十二年（公元498年），孝文帝巡视县瓠，患病，急召徐睿诊治，很快恢复。九月，车驾次于汝滨，设盛宴招待百官，特地让徐睿坐在上席，并下诏褒美，以徐睿为大鸿胪卿、金乡县伯，又赐钱绢、杂物、奴婢、牛马等。太和二十三年孝文帝去世，徐睿随梓宫还洛阳。徐睿年垂80，而鬓发不白，体力并未明显衰退。正始元年（公元504年），以年老为光禄大夫。卒，赠安东将军、齐州刺史，谥曰靖。其子徐践，字景昇，袭爵，历任兖州平东府长史、右中郎将、建兴太守。

徐嗣伯（此据《南史》卷三十二，《南齐书》作徐嗣），字叔绍，系徐叔向子。有孝行，善清言，位正员郎，诸府佐，为临川王刘映所重。当时直阁将军房伯玉服五石散十剂左右，无益，更患冷，夏天常穿厚衣。徐嗣伯为他诊断，说：“卿伏热，应须以水发之，非冬日不可。”至十一月，冰雪大盛，令二人夹着房伯玉，解衣坐于石上，取冷水从头浇之。房伯玉口噤气绝，家人啼哭请止。徐嗣伯又用水百斛浇之，房伯玉开始能动，而其背上有气，俄而起坐，曰：“热不可忍，乞冷饮。”徐嗣伯以水与之，一饮一升，病痊愈。自此常发热，冬天只穿单衣，体更肥壮。

有一老妇患滞冷，多年不愈。徐嗣伯为她诊之说：“此尸注也，当取死人枕煮服之乃愈。”于是往古墓中取枕，服之即愈。秣陵人张景，15岁，腹胀面黄，众医不能治疗，以此问徐嗣伯。他说：“此石虬耳，极难疗，当取死人枕煮之。”依语煮枕，以汤投之，得虬五升，病即愈。沈僧翼患眼疾，又多见鬼物，徐嗣伯认为是“邪气入肝，可觅死人枕服之，之后，可埋枕于原处”。如其言又愈。齐大臣王晏问徐嗣伯：“三病不同，而皆用死人枕而俱愈，何也？”他回答：“尸注者，鬼气伏而未起，故令人沉滞。得死人投之，魂气飞越，不得复附体，故尸注可愈。石虬者，久虬也，医疗既僻，虬虫转坚，世间药不能遣，所以须鬼物驱之然后可散，故令煮死人枕也。夫邪气入肝，故使眼痛而见魍魉，应须邪物以钩之，故用死人枕也。气因枕去，故令埋于冢间也。”

有一次，徐嗣伯春日出南篱门游玩，听到屋里有呻吟声，他说：“此病甚重，再过二日不疗必死。”于是往视，见一老妇称体痛，身上到处有黑疙瘩。他回去煮汤送来让其服下，服后痛势愈甚，跳投床者无数。但一会儿从她身上黑疙瘩处拔出肉钉，长寸许，以药膏涂于伤口，三日而恢复，云“此名钉疽也”。《隋书·经籍志》著录其《药方》五卷，《徐嗣伯

落年方》三卷，已佚。落，衰败之意，衰年，即老年。

徐勉（附子徐悱及妻刘令娴）

徐勉（466—535年），字修仁，南朝梁大臣，文学家。系南朝宋大臣徐羨之第六世孙。其祖父徐长宗，任宋武帝刘裕霸府行参军；父徐融，为南昌相。徐勉幼孤贫，及长，好学，本家叔徐孝嗣见之叹曰：“此所谓人中之骥驥，必能致千里。”徐勉18岁召为国子生，“下帷专学，精力无怠”。祭酒王俭每见，常目送之，说：“此子非常器也。”并称徐勉有宰辅之量。射策甲科，起家齐武帝萧赜第十子西阳王萧子明国侍郎，补太学博士。时每有议定，徐勉理证明允，莫能贬夺，同官咸取为则。累迁领军长史。

徐勉早年与萧衍长兄萧懿交游，萧衍对他十分赏识。永元二年（公元500年），任尚书令的萧懿被东昏侯萧宝卷赐药毒死，萧衍于同年十一月在襄阳起兵反东昏侯，次年攻逼京都建康，徐勉于新林（今江苏南京江宁区）谒见，萧衍使其管书记。及萧衍代齐建梁，徐勉拜中书侍郎，进领中书通事舍人，直内省。迁临川王萧宏后军咨议、尚书左丞。天监二年（公元503年），徐勉任给事黄门侍郎，尚书吏部郎，参掌大选。次年，迁侍中。天监四年，梁军北伐魏国，徐勉参掌军书，夙夜操劳，常数旬方能回家一次。回家时，群犬惊叫，他感叹说：“吾忧国忘家，乃至于此。若吾亡后，亦是传中一事。”天监六年，任给事中、五兵尚书，迁吏部尚书。他居选官，彝伦有序，既精于公文书函，又善于辞令，虽文案填积，坐客充满，但应对如流，手不停笔。他熟悉士族百家谱，写给士族之文告，皆能避其家讳。他选官坚持标准，拒绝私情。有一次与门人夜集，有一个叫虞皓的人，求詹事五官之职，徐勉正色说：“今夕止可谈风月，不宜及公事。”故时人服其无私。后历任后卫将军，领太子中庶子，侍于东宫；太子詹事，迁尚书左仆射；累迁至尚书仆射、中卫将军。常参与处理朝廷机要，从未泄露宫内政事，每有表奏，焚毁草稿，他博通经史，熟悉典章制度。受诏撰《五礼》（《嘉礼》、《宾礼》、《军礼》、《吉礼》、《凶礼》），于普通五年（公元524年）完成，共120秩、1176卷、8019条，于次年表呈朝廷，受到梁武帝赞赏，令按照执行。不久，任中书令。

普通三年（公元522年），梁武帝弟、始兴王萧憺去世，徐勉为其撰写碑文。碑文计3096字，现该碑仍立于南京市栖霞区栖霞镇甘家巷村西萧憺陵神道东侧。

徐勉虽居显职，不营产业，家无积蓄，俸禄分贍家族之贫困者。门人故旧劝他有所经营，他说：“人遗子孙以财，我遗之清白。子孙才也，则自致边耕；如不才，终为他有。”他在《戒子崧书》中言：“吾家世清廉，故常居平素，至于产业之事，所未尝言，非直不经营而已。”训导长子徐崧要“先物后己”、“见贤思齐”，不要贪于财货。中大通三年（公元531年），徐勉以疾自陈解职，移授特进、右光禄大夫、中卫将军。及去世，梁武帝闻而流涕，即日车驾临殡，赠开府仪同三司，谥曰简肃公。徐勉虽骨鯁不及范云，亦不阿意苟合，后知政者莫及，梁世之言相者称范云、徐勉。他善文，勤著述，虽当机务，下笔不休。撰《流别起居注》660卷，《左丞弹事》5卷，《选品》3卷，《太庙祝文》2卷，《会林》50卷，前、后《文集》50卷，《妇人集》10卷。清严可均《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辑其佚文15篇；《先秦汉魏南北朝诗》辑其诗8首，其中《采菱曲》脍炙人口：“相携及嘉月，采菱渡北渚。微风吹櫂歌，日暮相容与。采采不能归，望望方延佇。倘逢遗珮人，预以心相许。”

徐勉子徐崧，梁南徐州主簿；徐悱（494—524年），字敬业，梁诗人。幼聪敏，好学不倦。及长，善属文。初为著作郎，转太子舍人，掌东宫书记。累迁为太子洗马、太子中舍人，仍管东宫书记，与梁武帝太子萧纲在一起，任职历年。后因患足疾，出为湘东王萧绎友。迁晋安内史，卒于任。

徐悱励志修身，淡然于得失，喜怒不形于色，所交皆一时才俊。而立之年因病去世后，其父作《答客喻》云：“今吾所悲，亦悱始逾而立，孝悌之至。自幼而长，文章之美，得之

天然。好学不倦，居无尘染，多所著述，盈帙满筒。淡然得失之间，不见喜愠之容。”徐悱诗今存4首，或抒发建功立业的抱负，风格较为遒劲，有别于“齐梁体”的浮艳淫靡；或描写离别相思，情调缠绵又为“齐梁体”的上乘之作。其《白马篇》为拟古之作，虽在“儿女多情，风云气少”的齐梁诗坛，却写得豪迈慷慨，与曹植的《白马篇》相比，思想性、艺术性均“在尔时已为高响”（清人沈德潜《古诗源》评语）。《玉台新咏》收其《对房前桃树咏佳期赠内》诗，是徐悱任晋安内史时寄给留在京都建康的妻子刘令娴的。诗曰：“相思上北阁，徙倚望东家。忽有当轩树，兼含映日花。方鲜类红粉，比秦若铅华。更使增心忆，弥令想狭斜，无如一路阻，脉脉似云霞。严城不可越，言折代疏麻。”

其妻刘令娴，梁代文学家。系文学家刘孝绰三妹，世称刘三娘。所作《美人诗》，清人王夫之称“景中有人，人中有景，巧思遽于诸刘之上”。她原有文集3卷，已佚。《玉台新咏》存其诗8首。徐悱去世后，她作《祭夫文》悼念，其辞凄楚感人。徐勉本想为徐悱作哀词，见此文乃止。

徐悱有弟徐矩，有文学，善吏事，位至度支尚书。其子徐敬，任鸿胪卿。徐矩弟徐岳，初为后梁东阳王萧琮（后梁明帝萧岿子）师。萧琮被立为皇太子，授其为詹事。及萧琮嗣位，除其侍中、左民尚书，俄迁尚书仆射。跟从萧琮入隋，授上开府仪同三司，终于陈州刺史。其子徐凯，秘书郎。

徐摛（附子徐陵、徐孝克）

徐摛（474—551年），字士秀、士绩，南朝梁文学家。系徐逵之第五世孙。其祖父徐凭道，南朝宋海陵太守；父徐超之，仕梁官至员外散骑常侍。徐摛起家太学博士，迁左卫司马。天监八年（公元509年），梁武帝第三子晋安王萧纲任云麾将军，领石头戍军事，梁武帝令中书通事舍人周捨为萧纲寻找“文学俱长，兼有行者”的人当侍读，周捨推荐表弟徐摛，获梁武帝同意。天监十四年，任萧纲记室参军。天监十七年，萧纲为宣惠将军、丹阳尹，以徐摛为秣陵令。普通四年（公元523年），萧纲任雍州刺史，徐摛跟随，任晋安王咨议参军。大通初年（公元527年），徐摛兼宁蛮府长史，参赞萧纲戎政，教、命、军书，多由他拟定。中大通三年（公元531年），萧纲立为皇太子，徐摛转任太子家令，兼掌管记，又带领直。同年出任新安太守，为治清静，教民礼义，劝课农桑，期月之中，风俗便改。还朝任太子中庶子，加戎昭将军。后任太子左卫率。

徐摛“幼而好学，及长，遍览经史，属文好为转变，不拘旧体”；“文体既别，春坊（指太子东宫）尽学之，‘宫体’之号，自斯而起”（《梁书·徐摛传》）。所谓“宫体诗”，主要描写宫廷生活，内容多为闺情及女子情态、所用衣物等，风格浮艳。梁武帝听说东宫传说宫体诗，大为恼火，召徐摛进宫批评。当徐摛“应对明敏，辞义可观”时，梁武帝怒气顿消。接着问他《五经》大义、历代史、百家杂说及佛教，他应答如响，使梁武帝甚为叹异，于是宠遇日隆。

徐摛与子徐陵，庾肩吾与子庾信，同时出入于太子萧纲门下，“文并绮艳，故世号为徐庾体”（《周书·庾信传》）。尽管他们的诗内容空洞，思想性差，但由于其功底极深，遣词用典得当，写得华美艳丽，章节韵调工整，为世人推重。太清三年（公元549年），侯景叛军攻陷台城（宫城），太子萧纲时居永福省，叛军冲入殿内，侍卫奔散，唯有徐摛侍立不动。他平静地对侯景说：“侯公当以礼见，何得如此？”侯景不得不下拜。同年五月梁武帝去世，萧纲继位，是为简文帝，进徐摛左卫将军，固辞不受。大宝二年（公元551年）八月，侯景幽禁简文帝，徐摛不得朝谒，感气疾而死，时年78岁。赠侍中、太子詹事，谥曰贞子。

《全梁文》存《徐摛集》。《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辑其《胡人行》、《咏笔》、《咏桔》等诗5首。其二子：徐陵、徐孝克。

徐陵（507—583年），字孝穆，南朝梁、陈文学家。“八岁属文，十三通庄、老义。及长，博涉史籍，纵横有口辩”（《南史·徐陵传》）。其父任晋安王萧纲咨议时，他于普通

二年（公元521年）任萧纲宁蛮府参军。中大通三年（公元531年）萧纲被立为皇太子，他任东宫学士，为萧纲撰写的《长春殿义记》作序，在少傅府讲习《庄子》义。不久迁尚书度支郎，出任上虞县令，被弹劾免官。太清二年（公元548年），以通直散骑常侍身份出使北朝东魏，被扣留，直到天保六年（公元555年）北齐（东魏改称）送梁武帝萧衍长兄萧懿第五子萧渊明南归建康当“梁主”，徐陵得以随其南返。在东魏时，魏收负责接待。魏收自恃国强才高，想借天气炎热为题凌辱徐陵，说：“今日之热，当由徐常侍来！”徐陵当即回答：“昔王肃（系东晋开国丞相王导后代，仕南齐，永明十一年因父王奂被齐武帝萧赜所杀投奔了北魏）至，为魏始制礼仪；今我来聘，使卿复知寒暑！”弄得魏收张口结舌，无言以对。梁敬帝太平元年（公元556年），徐陵以贞威将军、尚书左丞身份，再次出使北齐，还任秘书监。陈立国后，任尚书左丞，加散骑常侍。天嘉四年（公元563年），迁五兵尚书，领大著作。天康元年（公元566年），迁吏部尚书，领大著作。他根据梁末以来朝内选授多失其所的情况，注重选贤授能，很有政绩。此后，封为建昌县侯，历任尚书左仆射、右光禄大夫、中书监、左光禄大夫、太子少傅等显职。于陈后主至德元年去世，谥曰章。

梁简文帝萧纲为太子时，好作艳诗，令徐陵编辑《玉台集》以大其体。所收录的作品，上起西汉，下迄于梁，时间跨度长达700多年。该书是我国古代继《诗经》和《楚辞》之后的第三部诗歌总集，对后世产生了深远影响。徐陵原有文集30卷，今存6卷，诗42首，文80篇。明代张溥《汉魏六朝百三名家集》中有《徐仆射集》。

徐陵“性又清简，无所营树”，屡居高位却不忘穷困亲友，“禄俸与亲族共之”。他不畏权贵，天嘉六年任御史中丞，陈文帝之弟陈项的门客“假王权威，抑塞词讼”，弄得朝野敢怒而不敢言。徐陵将其劣迹整理成奏章，以“服章严肃，若不可犯”的样子，面见文帝奏斥陈项，使文帝免除安成王陈项的职务。“自此，朝廷肃然”，吏治大为改观，徐陵任吏部尚书后，致书宣示自己的主张，要在用人上“简其才能，寻找门胄，逐其大小，量其官爵”，杜绝私人选授和“以官阶代于钱纳”的恶习，“众咸服焉”。其有四子：徐俭、徐份、徐仪、徐傅。

徐陵弟徐孝克（527—599年），少为《周易》生，有口辩，能谈玄理。及长，通《五经》，博览史籍，亦善属文。梁太清元年（公元547年）为太学博士。陈天嘉中（公元563年），任剡县令，因非其好，不久去职。太建四年（公元572年），征为秘书丞，不就，专心于佛学，昼夜讲颂《法华经》，陈宣帝甚嘉其操行。太建六年任国子博士，迁通直散骑常侍，兼国子祭酒。祯明元年（公元587年），入为都官尚书，次年为散骑常侍，侍东宫。陈亡后，徐孝克入隋。开皇十年（公元590年），长安发生病疫，隋文帝杨坚令他于尚书都堂讲《金刚般若经》，不久授国子博士。后侍东宫，讲《礼传》。徐孝克信佛教，精通经义，受业者甚众。于开皇十九年病卒，时年73岁。其子徐万载，仕至晋安王功曹史、太子洗马。

徐君蒨·徐昭佩

徐君蒨，字怀简，南朝梁诗人。系齐太尉徐孝嗣孙、梁侍中、太常、信武将军徐缙子。他幼年聪明好学，尤长于丁部书，问无不对。善弦歌，为梁湘东王萧绎镇西咨议参军。颇好声色，侍妾数十，皆佩金翠，曳罗绮，服玩悉以金银。他饮酒数升便醉，而闭门终日酣歌。有时载伎肆意游行，荆楚山川，靡不毕践。时襄阳鱼弘，亦以奢侈称。于是府中有谣云：“北路鱼，南路徐。”徐君蒨辩于辞令。湘东王萧绎曾出军，有人将妇从者。萧绎说：“才愧李陵，未能先诛女子；将非孙武，遂欲驱战妇人”。徐君蒨应声说：“项籍壮士，犹有虞兮之爱；纪信成功，亦资姬人之力。”他文冠一府，特有轻艳之才，新声巧变，人多讽习，竟卒于官。《玉台新咏》收录其《杂诗》二首、《别义阳郡》二首。杂诗《共内人夜坐守岁》。描写除夕夜不眠的情景：“欢多情未极，赏至莫停杯。酒中挑喜子，粽里觅杨梅。帘开风入帐，烛尽炭成灰。勿疑鬓钗重，为待晓光来。”其弟徐君敷（《南史》作徐君整；此据《陈书》），仕陈，宣帝时为散骑常侍、御史中丞。

徐昭佩（？—549年），梁湘东王萧绎妃。系徐君蒨妹。她于天监十六年（公元517年）被

湘东王萧绎纳为妃。其因形貌、资质平平，萧绎不喜欢她，两三年入其房中一次。萧绎盲一目，每当萧绎欲留宿她处，就化妆半面脸迎候，称作“半面妆”，萧绎见后愤怒离去。徐昭佩嗜酒，萧绎到其房中，常呕吐在他衣服上。其嫉妒心强，对不受萧绎宠爱之妾，恩礼相待，交杯接坐。发现有怀孕者，便加以刀刃。她生性淫乱，与荆州瑶光寺和尚智远私通。萧绎身边有一人名暨季江，形貌皆佳，徐昭佩又与他来往。暨季江叹道：“徐娘虽老，犹尚多情。”成语“徐娘半老”，言年纪虽大而尚存风韵之妇女，即源于此。她还与贺徽幽会于普贤寺，并写情诗相赠。中大通二年（公元530年），王贵嫔生贞惠世子萧方诸，不久王氏去世，萧绎怀疑系徐昭佩所害，于太清三年（公元549年）逼其自尽，她投井而死。萧绎将其尸体还给徐缙家，谓之“出妻”，葬于江陵瓦官寺。徐昭佩生萧绎长子萧方等和益昌公主萧舍贞。

徐伯阳

徐伯阳（516—581年），字隐忍，南朝陈官员。其祖父徐度之，南朝齐南徐州议曹从事史；父徐僧权，南朝梁东宫通事舍人，领秘书，以善书知名。徐伯阳敏而好学，年15，以文笔称。学《春秋左传》。家有史书，所读者近三千余卷。试第高第，补梁河东王萧誉国右常侍、东宫学士、临川嗣王萧正义府墨曹参军。梁大同（535—545年）中，出为侯官令，甚得民和。太清年间侯景叛乱时，徐伯阳浮海南至广州，依于萧勃。萧勃平后还朝，仍将家属之吴郡。陈天嘉二年（公元561年），诏侍晋安王读。不久除司空侯安都府记室参军事，侯安都早闻其名，见之，降席为礼。太建初（公元569年），中记室李爽、记室张正见、左民郎贺徽、学士阮卓、黄门郎萧诜、三公郎王由礼、处士马枢、记室祖孙登、比部贺循、长史刘删等为文会之会友，这些“一时之士”遊宴赋诗，辑成诗集，徐伯阳为其作序，“盛传于世”（《陈书》卷三十四）。后任新安王陈伯固府中记室参军，兼南徐州别驾，带东海郡丞。鄱阳王陈伯山为江州刺史，徐伯阳曾奉使前往。有一次鄱阳王陈伯山带领王府官员与徐伯阳一起登庐山，并在山上举行宴会。酒酣之际，鄱阳王命赋剧韵20种，徐伯阳和祖孙登二人最先作成，受到鄱阳王的赏赐。后徐伯阳任临海王府限外咨议参军、新安王府咨议参军。太建十三年，其姐病故，他悲恸发病而卒，时年66岁。

徐俭·徐份·徐仪

徐俭（528—588年），又名徐众（此据《陈书》，《南史》作徐报），南朝陈官员。系陈大臣、文学家徐陵长子。徐俭幼年勤学有志操，汝南人周弘正重其为人，妻以女。梁太清元年（公元547年），徐俭起家豫章王萧综王府行参军。太清二年侯景发动叛乱时，他携老幼避乱于江陵。湘东王萧绎闻其名，召为尚书金部郎中。及西魏军队攻陷江陵，还于京师。陈霸先代梁建陈国，徐俭于永定初（公元557年）为太子洗马，迁镇东从事中郎。天嘉三年（公元562年），迁中书侍郎。太建元年（公元569年），广州刺史欧阳纥反，徐俭持节前往宣谕圣旨。后任监军，前去征讨。欧阳纥乱平，迁鄱阳王陈伯山咨议参军，兼中书舍人。累迁国子博士、大匠卿。不久又迁黄门侍郎，转太子中庶子，加通直散骑常侍，兼尚书左丞，以公事免。不久起为中卫始兴王陈叔重限外咨议参军，兼中书舍人，又为太子中庶子，迁贞威将军、太子左卫率，舍人如故。陈后主继位，授其和戎将军，累迁寻阳内史。徐俭为政严明，盗贼静息。迁散骑常侍，袭父爵建昌县侯，入朝为御史中丞。徐俭性公平，无所阿附。尚书令江总望重一时，亦被他纠劾。陈后主“深委任焉”，又领右军，于祯明三年去世。

徐份（550—570年），南朝陈官员。系徐陵次子。少有父风，9岁时作《梦赋》，其父见之，对亲人们说：“吾幼属文，亦不如此。”起家秘书郎，转太子舍人，累迁豫章王陈叔英主簿、太子洗马。出任海盐令，甚有治绩。秩满，入为太子洗马。徐份孝悌，其父患病甚笃，他烧香泣涕，跪颂《孝经》，昼夜不息，如此者三日。父疾豁然而愈，亲戚皆称是徐份孝感所致。太建二年（公元570年）卒，时年仅21岁。

徐仪（？—608年），南朝陈、隋官员。系徐陵第三子。少聪警，以《周易》生举高第为

秘书郎，出为乌伤令。祯明初（公元587年），迁尚书殿中郎，不久兼东宫学士。陈亡入隋。开皇九年（公元589年）隐于钱塘之赭山，炀帝召为学士，不久任著作郎。于大业四年去世。

徐之才

徐之才（493—572年），字士茂，北朝北魏、东魏、北齐医学家。系东晋濮阳太守徐熙第六世孙。其祖父徐文伯，《南史·张邵传》称为“东海”人，然《北史》、《北齐书》称徐之才为丹阳（今江苏南京）人，当系迁徙而致。徐文伯子徐雄，乃徐之才之父，仕南朝齐为奉朝请、员外散骑侍郎，“医术为江左所称”（《北史》卷九十）。能清言，多为贵游所善。事母孝谨，母死，毁瘠几至灭。俄而兄死，扶杖临丧，抚膺大哭，遂以哀死。

徐之才幼时聪慧，5岁能诵《孝经》，8岁略通义旨，13岁召为太学生，精通《礼》、《易》。文学家刘孝绰、裴子野、张嵎等每与其论《易》及《丧服》仪，应答如流，有“神童”之誉。梁普通五年（公元524年），豫章王萧综出镇江都，授徐之才为王国左常侍，又转萧综镇北将军主簿。次年，他随萧综驻彭城，总督各军。六月，萧综投降于北魏。当三军散走时，徐之才退至吕梁，桥断路绝，遂为北魏统军石茂孙所阻。萧综在北魏收纳僚属，访知徐之才在彭泗一带，向魏孝明帝推荐，说徐之才大善医术，宜于诏征。孝昌三年（公元526年），徐之才应召赴洛阳，敕居南馆，礼遇甚优。他药石多效，又博涉经史，发言辩捷，朝贤竞相引用，一时声誉大振。孝武帝时，被封为昌安县侯。东魏孝静帝天平（公元534—537年）中，征徐之才赴晋阳，常在內馆，礼遇甚厚。武定四年（公元546年），自散骑常侍转秘书监。高洋为相时，普加黜陟，杨愔以徐之才为南土之人，不堪典掌机务，转授金紫光禄大夫，以魏收代之，徐之才怏怏不平。他通天文、图讖之学，看到丞相高洋独专朝政，有篡位之心，和馆客宋景业假借图讖参校吉凶，预言“午年必有革易”。高洋于东魏武帝八年废孝静帝自立为皇帝，改国号为齐，史称北齐。高洋对徐之才愈加亲密，寻拜侍中，封池阳县伯。见文宣帝政令转严，乃求出，任赵州刺史。

皇建二年（公元561年），徐之才任西兖州刺史，未到任。武明皇太后有疾，他为太后诊治，“应手便愈”。次年春，武明太后又病，徐之才诊断后认为，太后只能活到四月，太后果然于四月一日去世。当时有人患脚后跟肿痛，他诊断为长期乘船入海、垂脚水中所致。用刀割治，很快痊愈。天统四年（公元568年），武成帝高湛因酒色过度，神志恍惚，体弱多梦。徐之才说：“此色欲多，大虚所致。”即处汤方，连服数剂，疾竟痊愈。此后，高湛每遇病发，经徐之才针药所加，应时而愈。是年秋，中书监和士开奏请武成帝，让徐之才出任兖州刺史。帝以尚书右仆射胡长仁代徐之才为尚书左仆射，和士开为尚书右仆射。十月，帝旧病复发，痛苦至极，对和士开说：“浪用之才外任，使我辛苦。”十月八日，派快骑召徐之才。结果高湛于十月十日去世，次日徐之才方赶到，令其回州。武平元年（公元570年），北齐后主高纬重拜徐之才为尚书左仆射。他对后主宠爱的和士开及宫内女侍中陆令萱阿谀逢迎，两家如有病人，百般救护。迁尚书令，封西阳郡王。武平三年，任侍中、太子太师。同年去世，时年80岁。赠司徒公、录尚书事，谥曰文明。

徐之才著有《徐王八世家传效验方》10卷，《徐氏家传秘方》2卷，《徐王方》5卷，《隋书·经籍志》著录，皆失传。其长子徐林，字少卿，太尉司马；次子徐同卿，太子庶子。之才弟徐之范，亦以医术见知，位太常卿，袭其兄爵西阳王。入北周，授仪同大将军，至隋开皇（公元581—600年）中去世。

徐则

徐则，南朝陈、隋隐士。幼沉静，寡嗜欲。受业于周弘正，善玄学，精于议论，“声擅都邑”。他认为不能为名而世，于是隐入缙云山（今浙江缙云境），不娶妻，常服巾褐。陈太建年间（公元569—582年），应召宿于至真观，数月后又隐入天台山（今浙江天台北），绝谷养性，所资唯松水而已，虽隆冬严寒，不服棉絮。栖隐灵岳50多年。陈太傅徐陵为其刊山立颂。

隋晋王杨广镇守扬州时，徐则已81岁。杨广知其名，手书召之，遂诣扬州。翌年某日，命侍者取香火，如平常朝礼之仪，至五更而死。肢体柔弱如生，停留数旬，颜色不变。晋王遣使送至天台山安葬。其时自扬州至天台，在道多见徐则徒步，云得放还。至其旧居，取经书道法分遗弟子，然后跨石梁而去，不知所之。须臾，其灵柩至，方知其灵化。

徐有功

徐有功（641—702年），字弘敏，唐代大臣。其祖父徐文远，又名徐旷，于南朝梁亡时被俘虏到长安，后在偃师（今属河南省）落户，为隋末唐初学者。他博通《五经》，尤明《左氏春秋》。讲解经书，偏举先儒，议论分明，是非乃出，新意折衷，“听者忘倦”。隋大业初（公元605年）任国子博士；仕唐，仍为国子博士。唐高祖李渊到国学察看，对徐文远的博学很佩服，封为东莞县男。

徐有功通过举明经步入仕途。他为官清正，秉公办事，深得人心。累转蒲州司法参军。

“为政不忍杖罚，人民服其德”。蒲州老百姓相互约定说：“凡是违犯徐参军的法令而受到处治的人，大家必定要共同训斥他。”徐有功任职期间，无一人受辱，社会秩序安定。天授元年（公元690年），徐有功提升为司刑丞，入朝作官。武则天将国号唐改为周后，害怕大臣们声讨她，派周兴、来俊臣、丘神勣和王弘义等人，设立很多监狱，搜捕反对她的大臣。周兴、来俊臣等酷吏无法无天，造成许多冤假错案，弄得喊冤叫屈者，天天不断。而“朝野震恐，莫敢正言”。唯有徐有功多次向武则天进谏，并对所发现的错案一一予以纠正。

博州刺史王冲“坐逆”，魏州人告颜余庆参与王冲之事，武则天命来俊臣处理此案。有司认为颜余庆应当流放，侍御史魏元忠却认为颜应处死。武则天同意侍御史意见。徐有功感到处死不当，在武则天面前力陈颜余庆不该处死的理由，最终颜免死。当徐有功据理争辩时，百余名官员、卫杖皆一言不敢发，而他神情自若，使武则天由“大怒”而慢慢平静下来。徐有功有胆有识，谨慎办案，赢得大家的敬佩。

韩纪孝，曾任徐敬业的“伪官”。此人去世后，推事派顾仲琰没收韩家所有财产，事得武则天同意。徐有功认为，谋反者该杀头，但人死就没必要再去追究其罪，武则天同意他的意见。凤阁侍郎任知古、冬官尚书裴行本等七人被酷吏诬告，准备处死。武则天为表现自己宽宏大量，对大臣们说：“古人用杀止杀，我今以恩止杀，释放任知古等人，你们看行吗？”酷吏来俊臣为诛异己，坚持处死任知古等人。徐有功奏道：“来俊臣有意违犯皇上旨意，这样，陛下何以取信于天下呢？”任知古等被释放。道州刺史李仁褒及弟榆次令李长莎被人诬告谋反，徐有功经过调查，此事纯属诬陷，主张无罪释放被告。武则天对想推翻她政权的人恨之入骨，错杀了李氏兄弟。酷吏周兴利用此事上奏武后，诡称“徐有功故意要释放谋反之人，应该处死罪”。武则天罢免徐有功之职。不久，他被起用，任左台侍御史。徐有功再三推辞，武后不许。

润州刺史窦孝悫妻庞氏被其仆人诬告缉拿，给事中薛季昶用严刑将庞氏屈打成招，定为死罪。庞氏之子窦希诚为母上书申冤。徐有功查证后，确定系冤案。薛季昶上奏徐有功徇私情，袒护庞氏，应罢官并杀头。那天，徐有功正在处理公务时，令史流泪将此事告诉他。徐有功笑着说，“难道只有我一个人死，而诸人长久不死吗？”然后若无其事的迈出门。武则天召徐有功去责问：“你长期断案，多次错放人，这是什么原因？”他答道：“出现失误，是我的小过错，好生，是圣人的大德。”结果，庞氏免死，徐有功被废为庶人。不久，起用为左司郎中，又被提升为司刑少卿——负责国家司法的副官长。他敢于直言，曾多次与武则天进行声色俱厉地辩论。武则天曾多次怒不可遏，命令将他推出午门斩首，但临刑前又将他释放。武则天对于徐有功的刚正不阿更加敬重，转任司仆少卿。酷吏对他切齿痛恨。长安二年（公元702年），徐有功去世，时年62岁。被追封为司刑卿。神龙元年（公元705年），唐中宗李显即帝位后，加封徐有功为越州都督，派使臣吊祭。会昌年间（公元841—846年），被追封为“忠王”。鹿城主簿潘好礼称赞徐有功超过汉朝的于定国和张释之；起居舍人卢若

虚评论徐有功称：“徐公当雷霆之震，而能曲全仁恕，虽千载未见其比也。”《新唐书·宰相世系表》记载其子徐伦，字坚，岐、庆二王司马（《旧唐书》卷八十五作“徐愉，累迁为申王府司马”）。徐伦子徐珏，字和玉，袭东莞男，安定太守；徐珏子徐涛，字浚源，侍御史；徐涛子徐宰，字舜钧，大理评事（《旧唐书》卷一百七十九徐涛作徐陶）。

徐商（附子徐彦若）

徐商，字义声，又字秋卿，系司仆少卿徐有功第六世孙，客居新郑，故称新郑人。幼隐中条山，大中十三年（公元859年）进士及第，为秘书省校书郎，累迁侍御史，改礼部员外郎。不久知制诰，转郎中，召充翰林学士。拜中书舍人、户部侍郎判本司事，检校户部尚书、襄州刺史、山南东道节度使等。入为御史大夫。咸通初年（公元860年），以刑部尚书为诸道盐铁转运使，迁兵部尚书，封东莞子。咸通四年，以本官进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咸通六年罢相，检校右仆射、江陵尹、荆南节度使。入为吏部尚书，累迁太子太保，卒。

徐彦若，系“天后朝大理卿有功之裔。曾祖宰，祖陶，父商，三世继登进士科”（《旧唐书》卷一百七十九）。徐彦若于咸通十二年（公元871年）及进士第。乾符末（公元879年），以尚书郎知制诰，拜中书舍人。唐昭宗李晔继帝位，迁御史中丞，转吏部侍郎，检校户部尚书，代李茂贞为凤翔节度使。李茂贞不受代，复为御史中丞，改任兵部侍郎，同中书门下平章事，进加中书侍郎，累兼左仆射、监修国史，加开府仪同三司、守司空。乾宁初（公元894年）封齐国公，太清宫、修奉太庙等使，加弘文馆大学士。进位太保、门下侍郎。时崔胤专政，以徐彦若位在己上，不悦。乾宁二年九月，以徐彦若检校太尉、同平章事、广州刺史、清海军节度使、岭南东道节度使，卒于镇。其弟徐彦枢，位至太常少卿。徐彦若子徐绶，天佑初年（公元904年）历司勳、兵部二员外，户部、兵部二郎中。



徐氏祠堂

沂水纪王崮春秋墓主初探

李 沅



—

据《齐鲁晚报》4月23日报道，对沂水纪王崮春秋墓主究竟是谁，省考古研究所原所长张学海先生和省博物馆研究员、古文字学家王恩田先生，都根据考古资料提供的信息及以往的考古经验，发表了重要的意见。张学海先生根据纪王崮顶春秋墓与1975年沂水县刘家店子春秋墓的規制、陪葬品、人殉等有共同之处，断定该墓主的身份为莒国国君。王恩田先生根据墓葬出土青铜器铭文，断定墓主名叫中段（通遯）氏，但中段氏是哪个时代、哪个国族的人，没有明示。我认为，沂水纪王崮顶春秋墓主到底是何方人士，还是个需要继续研究讨论的问题。

由于张学海先生的判断、意见非常肯定，本文就张先生的观点做一些分析和讨论，以求教于张先生。本人对考古学一窍不通，只因写过《探寻寿光古国》一书，对东夷古国历史略知一二，但对考古学问题所言，纯粹是门外之见。

张学海先生根据墓主随葬的鼎、鬲、敦青铜器，马车四辆（可能原有十辆）及成组的乐器，并将古墓修到了崮顶，判定墓主不是“一般的城邑或地位低的统治者”，因此是诸侯国君，而且是“莒国国君”。

判定该墓主为诸侯级的君主，这是正确的，但这位墓主一定是莒国国君，似乎还缺乏直接的、过硬的根据。

该报道称：“既然是莒国国君，为什么不葬在莒国国都，即现在莒县县城一带？”张学海说：“以往考古发现中，莒国国君的墓葬多是如此。譬如沂水县西南部院东头春秋莒国墓距离国都

约40公里，莒南县大店春秋古墓约40公里。此次发现的崮顶春秋墓，距离莒国国都的直线距离为50公里左右，可见莒国国君墓离都城都比较远。因此，不能说隔得远就不是莒国国君的墓。”

这里有几个问题需要讨论：

断定墓主的主要考古和历史根据是什么？

刘家店子墓出土一铜戈，上有铭文“莒公”二字；莒南大店墓出土“莒叔仲子平钟”，从而断定这两墓墓主为莒国国君墓。但纪王崮顶墓的铜器铭文为“中段氏”，因此根据出土物的铭文现在还无法判定该墓就是莒国国君墓。

正因为如此，张先生主要是根据墓制和随葬品做的判断。但墓制、随葬品等能大致地判断出该墓的年代和文化类型，却很难就此断定墓主是哪国国君，因为同属于东夷的莒国与其它各国，其墓葬文化有很多共同性，很难据此来判定墓主身份。关于人殉，《中国考古学·西周卷》载：“春秋早期的鲁故城M202，春秋中期的莒南大店M2和春秋晚期的大店M1等皆有殉人。”关于墓葬制，该书曰：其中有“三重葬，即重椁一棺或一椁重棺，此种葬现象见于薛故城M9、M5、M3，沂水刘家店子M1，长岛王沟M10，章丘宇家埠M137和女郎山M1，莱芜戴鱼池战国墓。”（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中国考古·两周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年版）由此看出，春秋时期东方各国族的墓葬制度有很多共同点，因此单由墓葬制度来判断为那国国君很不可靠。

第二、莒国国君墓葬在距莒国都城50公里的东北山区的根据是什么？

张先生举例分析了莒南大店和沂水院东头春秋墓后说：“可见莒国国君墓离都城都比较远。”这两处莒国君主墓，一处都在都城的南方莒南，而莒南在春秋时也是莒国地，“南莒”是莒国的另一都城；一处都在都城的西方，沂水县地。今莒南县、莒县及沂水县东南部，都在古莒国的势力范围内。但沂水县东北的纪王崮就不同了。到春秋晚期或者按张先生说的“春秋”时期，莒国的周边环境和自身的政治地位已发生了根本性变化。

公元前693年，“齐师迁纪邢、鄆、郟”；公元前691年秋，“纪季以酈入于齐”；公元前690年夏，“纪侯大去其国”。至此，纪国的领土已被齐国占有，纪国首领纪侯已远走他乡，实际上纪国已经灭亡。

纪国灭亡后，莒国领土就直接暴露在齐国面前。纪邢，杜预注：“纪邑，在东莞临朐县东南。”临朐县东南，已经是沂水、沂源地了，这里已经成为齐国的势力范围了。

纪国灭亡后，齐国开始征伐周边小国。公元前686年夏，“师及齐师围酈。酈降于齐师”。公元前684年冬十月，“齐师灭谭，谭子奔莒。”这对莒国不是个好兆头。紧接着，公元前675、674年，“夫人姜氏入莒”，与齐襄公私通的鲁夫人两次入莒，入莒的目的虽然史无考，但对莒似乎也不是利好消息。齐桓公时，实行近交远攻，虽然对莒没有下手，但已不放在眼里。《管子·小问》载：“楚灭莒，莒君使人求救于齐，桓公将救之，管仲曰：君勿救也。……莒君小人也，君勿救。桓公果不救，而莒亡。”《晏子春秋·内篇》言：“景公问晏子曰：当今之时，诸侯孰危？晏子对曰：莒其先亡乎！公曰何故？对曰：地侵于齐。”管仲、晏子都是在齐国说话算数的人物。

在这种政治形势下，莒国君薨后，将其葬在离国都50公里外的齐国势力范围内，这是不可想象的。

第三、纪王崮顶是墓地还是都城？

如果纪王崮顶春秋墓是莒国国君墓的话，纪王崮顶就是墓地，墓地就是墓地，它是死人的居所；墓地不会是城廓，城廓是活人的居所。但《齐鲁晚报》载：“省博物馆研究员、古文字学家王恩田提出一个惊人的观点：纪王崮顶存在中国最早的城堡式国家。”纪王崮顶是不是城堡，是不是个国家，暂且不论，根据现存建筑遗迹判断，这里确实是座具有防御功能的微型壁堡。这里当年似乎有殿堂或者是居屋，有很多人在这里生产、生活。从出土大量

的车马、青铜器、乐器、玉器及各种生活用器证明，纪王崮顶是一个群体，而且是一个贵族群体的生活、生产和防御之所，墓葬只是个万不得已的辅助功能，总之，它绝不是个单纯的墓地或者陵园。

纪王崮顶上居住着一个特殊的贵族群体，是因为某种政治原因万不得已住在这里的一个贵族群体。在莒国国都完好、国土完整的情况下，莒国贵族没有理由居住在这偏远荒凉而十分危险的崮顶上。因此，纪王崮顶与莒国君无涉。

二

沂水纪王崮春秋墓的墓主是谁？我个人认为是纪国贵族。

根据目前已掌握的资料，可以判断，纪王崮顶上居住着一个群体，而且是一个贵族群体。根据这里的特殊地形地貌和崮顶门道的特殊改建布局，还可以判断，这个贵族群体，是个逃难、逃亡的群体，是个万不得已在这里落脚和居住的群体。

这个贵族群体属于哪个国族？答案是纪国族。为什么？

当时在纪王崮周边落难的国族可能有二，一是谭国，二是纪国。

《左传·庄公》十年（公元前684年）《经》载：“冬十月，齐师灭谭。谭子奔莒”；《传》载：“冬，齐师灭谭，谭无礼也。谭子奔莒，同盟故也。”这些记载表明，谭国被齐国灭亡后，谭子（谭国国君）奔莒，因谭、莒为盟友，因此莒君肯定留谭子居都城，不会让他到深山老林里。

纪国的情况就与谭国不同了。齐、纪两国矛盾很深，纪离齐国都城临淄不到十里，纪国对齐国的威胁、防碍太大，因此齐对纪的征伐，不仅是对领土的占领，而且还要把整个纪国臣民驱逐出境。《春秋经》载：庄公元年（公元前693年），“齐师迁纪邢、鄆、郟”。《正义》曰：“齐人迁此三邑——故知齐欲灭纪，故徙其三邑之民而取其地也。”名曰“迁”，实为“驱逐”。把“三邑”之民赶走，把“三邑”之地攫为己有。“纪三邑”是位于纪国南部临胸的纪邢，位于纪国东南部安丘的纪鄆和位于纪国东北部昌邑的纪郟。“三邑”之民，以数万计，从此沦落为难民。

《春秋经》：庄公三年（公元前691年）秋，“纪季以鄆入齐”，杜预注：“季，纪侯弟。鄆，纪邑，在齐国东安平县。齐欲灭纪，故季以邑入齐为附庸，先祀不废，社稷有奉。”这是在齐军压境，彻底灭亡纪国前夕，纪侯为了“先祀不废，社稷有奉”采取的一个重要义举。虽然其弟和鄆邑成为了齐国的附庸，但他对祖宗社稷，总算有了个交待。

纪侯采取的第二个行动就是“大去其国”。《春秋经》载：庄公四年（公元前690年）“三月，纪伯姬卒”，“夏，纪侯大去其国”。杜预注：“以国与季，季奉社稷，故不言灭。不见迫逐，故不言奔。大去者，不反之辞。”对“大去其国”经学家有不同的解读，有的释为“不留一人之辞也”，有的释为“永不再返”。但无论那种解释，“纪侯大去其国”都是无比惨烈的壮举。从此，数十万的纪国臣民跟随纪侯告别故土，远走他乡，走上了一条艰难的、不知所终的大逃亡、大迁徙之路。

纪国臣民去了何方？这是个复杂的问题。但据后来纪姓（纪姓，以国为姓）人主要分布在江苏、浙江、福建、广东、台湾判断，当时纪国臣民的主体是沿弥河向南行，从今日照沿海逐步到了江苏、浙江、福建、广东。尤其是潮、汕地区，纪姓人特别集中。

在这个纪国族人大迁移、大逃亡中，纪侯率部分臣民，落脚到了纪王崮。

纪侯为什么要落脚到这里？纪侯是位贤人义士，是个行有礼言有道懂谋略的国君。在齐国侵城掠地，称霸诸侯，势力和野心高速膨胀的背景下，纪国虽有兄弟之国莱国和莒国，婚姻之国鲁国，但都不能去投靠。因为无论投靠谁，都会把齐国的战争之火引过去，连累对方。

第二，纪侯不能去太远的地方，因为他有牵挂。纪鄗那里还有自己的亲弟弟和供奉着的天地社稷和祖宗，自己的夫人伯姬刚刚去世，不管如何安葬的，对他都是挥之不去的牵挂。

第三，纪王崮远离都邑和平原发达地区，是深山，是荒野，在那个年代属于无人区。交通闭塞，与世隔绝，对逃亡者来说，是个相对安全的地带。

第四，纪国紧靠弥河，沿弥河南行，（古人远行一般都沿河上下），进入临朐地，过冶源后，南行至后峪，到了弥河的源头。再往南就是沂山。翻过沂山，不走河道，右拐到深山里就是纪王崮。纪国贵族对纪国—临朐—沂水这条南北通道是熟悉的。《春秋经》载：隐公八年“九月辛卯，公及莒人盟于浮来”。杜预注：“纪邑，东莞县北有邳乡，邳乡西有公来山，号邳来间。”叶圭绶：“沂水县，周纪浮来邑（一作包来，作邳来）。”（叶圭绶：《续山东考古录》）今沂水县西南有纪邑，即纪国的附庸。纪鄗是纪国的另一个附庸，纪鄗在今日照安东卫。由纪到浮来，由纪到日照，这是纪人非常熟悉的路线。

第五，根据最新的发掘报告，墓中出土大量青铜器、乐器、玉器：“南边箱则出土铜鼎、铜鬲、铜豆、铜罍各7件、铜敦3件。”“北边箱出土铜罍于2件，甬钟一套10件，铸钟一套4件，钮钟一套9件，石磬一套10件，舟4件，甗、壘、壶、盘、匜、瑟各1件。另外还有铜剑、钺、斤、箭头、凿等。”另外还有祭天祭地的玉璧、玉琮。（《山东商报》2012年4月17日）纪国是商周时的大国，我在《探寻寿光古国》中，用了大量的文献和金文资料来证实，从夷王烹齐哀公后，在整个西周和春秋早期，纪国与王室和关系比齐国密切，纪国的政治影射和政治实力比齐国强大。齐国的强大和称霸，那是从齐桓公用管仲实行改革以后开始的。纪国有大量宝器，因此齐国曾千方百计攫为己有。《竹书纪年》载：“齐国佐来献玉磬，纪公之献。”《左传·成公》二年，“齐侯使宾媚人赂齐师，以纪甗、玉磬与地。”杜预注：“甗、玉磬皆灭纪所得。”

那么，该墓埋藏的是纪国贵族中的哪一位呢？

在纪王崮居住的这个逃难群体中，能得到就地埋藏这种高规格待遇的只有三种人，一是纪侯，二是纪侯的两位夫人伯姬和叔姬，三是纪侯的卿大夫。从目前发掘已得到的信息看，似乎不是纪侯。不是纪侯，那么是夫人墓还是卿大夫墓？从已出土的一些装饰物判断，墓主似乎是位夫人。如果是夫人墓的话，墓主不是伯姬就是叔姬。

纪夫人伯姬，鲁国女。叔姬，伯姬之妹，纪侯之媵妾。纪侯夫人伯姬和叔姬，在春秋史上是有名的贤义之女。春秋时期，有七位诸侯夫人，但在春秋经传里记载其卒、其葬的只有三人，即纪伯姬、纪叔姬和宋共姬。因此，吕祖谦曰：“内女不书葬，而书葬者三，宋共姬、纪伯姬与叔姬，皆非常也。”之所以书这三人，乃褒其贤。

关于伯姬：

庄公元年冬十月，“齐师迁纪邢、纪鄗、纪郟”。庄公三年秋，“纪季以鄗入齐”。庄公四年三月，“纪伯姬卒”。

纪国、纪侯，在四年中出了三件大事：齐师迁“三邑”，可以说齐灭纪国之战已经开始，并且齐国已经取得了决定性胜利。“三邑”归齐后，纪国已失去半壁江山，而且齐灭纪已成定局，纪侯求救鲁公、求救周王都无效果，纪国的彻底灭亡也已成为定局。因此，为保全祖宗社稷，纪侯将纪鄗拱手让给了齐国，即“纪季以鄗入齐”，“纪之宗庙、社稷皆迁之于鄗，承祀如本。”（《左传正义·释例》）在纪国、纪侯惶惶不可终日时，纪夫人伯姬卒。伯姬卒，是纪侯大去其国的直接动因。

纪夫人伯姬卒，如何安葬？当时有两种选择，一是安葬在纪国，二是安葬在已属齐国管辖的纪鄗。在纪国安葬，也就是由纪侯亲自安葬，一切将按部就班、顺理成章。但在齐国大军压境的危险时刻，把伯姬埋藏在纪国，纪国灭亡后，将遭“封其墓，毁其庙”的国难。如果安葬在纪鄗，纪侯必须以投降者的身份，进入齐国，这等于给齐侯下跪，为维护纪国、纪侯的尊严，这步棋万万走不得。在这种情势下，纪侯采取断然举措，“大去其国”。

《春秋经》：庄公四年春，“三月，纪伯姬卒”，“夏，纪侯大去其国”，“六月乙丑，齐侯葬纪伯姬。”这就是说，纪侯率纪国臣民大去其国后，齐国马上就安葬了纪伯姬。纪伯姬肯定是安葬在纪侯弟守候的纪鄆。纪侯未能亲自安葬夫人伯姬，是他终生的遗憾。如果该墓最终未能发现尸骨，断定该墓为衣冠冢的话，该墓很可能就是埋藏伯姬的衣冠冢。

如果该墓最终发现女性尸骨的话，该墓墓主就可能是纪叔姬。

关于纪叔姬：

纪侯大去其国之后，纪侯就从文献上彻底消失了。但对叔姬，《左传》中还有如下记载：

《春秋经》：庄公十二年春，“纪叔姬归于鄆”。杜预注：“纪侯去国而死，叔姬归鲁。纪季自定于齐，而后归之，全守节义，以终妇道，故系纪之。”按经学大师杜预之说，庄公十二年，也就是纪侯大去其国后的第八年，纪侯去世了。也预示着纪侯在纪王崮居住生活了八年。在这八年中，纪侯与叔姬的行踪，史上一片空白。但很有可能这八年中，纪叔姬是陪伴在纪侯身边，或者很多时间是陪伴在纪侯身边。纪侯去世后，纪叔姬归鲁，回娘家，但“纪叔姬归于鄆”，就如杜预说的“而后归之，全守节义，以终妇道。”

《春秋经》：庄公二十九年“冬十有二月，纪叔姬卒”。

庄公二十九年，也就是纪侯去世后的第17个年头了。这17年中，叔姬的生活和行踪，史无载。但她有四个可能的去处或者说是四个生活居住地，一是娘家鲁国，二是已归齐的纪鄆，三是纪王崮，四是齐国给纪国留下的最后一个邑地，位于今日照安东卫的纪鄆。

叔姬死在何地？根据史料判断，死在纪鄆。

《春秋经》：庄公三十年，“秋七月，齐人降鄆。八月癸亥，葬纪叔姬”。

庄公二十九冬十二月，纪叔姬卒；庄公三十年秋，齐人将纪国的最后一个附庸国纪鄆占领，八月，实际也是秋，即占领后立即安葬纪叔姬。所以由此可以断定，纪叔姬晚年生活在纪鄆，最后死在纪鄆，安葬在纪鄆。纪叔姬安葬时，已经是纪侯大去其国后的第26个年头了，也是纪侯去世后的第18个年头了。当年跟随纪侯的左右，大部分也已作古了，因此再把纪叔姬迁葬到纪王崮的可能性极小。但也不能不完全排除纪国后人将纪叔姬迁葬到纪王崮的可能。如果纪王崮顶上能确证有纪叔姬墓，可以肯定地说，纪侯墓也在此处。

关于纪王崮春秋墓的葬制有很多“怪”，即与传统相悖。考虑到纪侯为亡国之君，纪侯为仁义之君，与他逃难到纪王崮的人和物（车、马等各种器物），对他来说，都是有功之“臣”，都是救命“恩人”。他对这些物的埋藏，不像当国皇帝那样当做陪葬品，而是怀着感恩和敬畏之心去埋藏，因此就必然不符传统规制。



考古发掘现场

攻克莒县

本编

1944年11月14日，在山东军区统一组织指挥下，山东军区独立第一旅、特务团和滨海、鲁中军区部队各一部共同发起莒县战役。在伪莒县保安大队大队长莫正民率部反正的配合下，攻克莒县县城并解放莒县全境。此役历时半个月，共歼灭日伪军200余人，反正伪军3500余人，使滨海、鲁中两根据地连成了一片。



攻克前的敌人碉堡



战士按手印表决心



巷战进行中



滨海军区主力部队强攻莒县县城



攻克莒县后战士们登上城楼



老百姓欢庆胜利



一一五师战士剧社在城门前合影



山东文协会长张浚青为烈士致悼词



莒县伪军保安大队长莫正民率部3500余人反正

“体育歌后” 韦唯

石 头

韦唯，原名张菊霞，为流行歌手、作曲人，国家一级演员。籍贯苍山县向城镇鄆城前村，出生在内蒙古呼和浩特市，由于妈妈是广西柳州人，随母姓韦，自然也成了壮族。

韦唯4岁时就显现出歌唱舞蹈的天赋，6岁从师学习歌唱技艺，8岁始舞蹈表演训练，开始活跃于舞台上，14岁被铁路文工团选中来到北京。1986年，韦唯在第二届全国歌手电视大奖赛上演唱郭峰创作的《让我再看你一眼》、《生活的节奏》，夺得专业组通俗唱法第二名。1986年5月10日，韦唯参加纪念国际和平年发起并组织第一届百名歌星演唱会，同时担任主题歌《让世界充满爱》的领唱之一。作为中国首次国家选派的代表，韦唯还参加波兰第24届索波特国际音乐节，并一鸣惊人，获得了演唱特别奖和最上镜小姐双奖。也是这一年，23岁的韦唯成为国家一级演员。1990年又以一曲《亚洲雄风》一举成为内地歌坛天后级的人物。

韦唯可以说是当代中国最杰出的女歌手之一。媒体把韦唯称为“中国的惠特妮·休斯顿”、“中国的玛丹娜”和“中国的席琳迪翁”等等。根据估计她的音乐专辑仅仅是在中国销售就达到1.2亿张，她也是世界上最卖座的歌手之一。她还可以演唱英文歌曲，在中国及海外与中国相关的大型活动仪式和电视节目经常受邀出席演出，她也常常获邀代表中国出席参与一些国际性的活动。

1994年，韦唯在美国亚特兰大举办音乐沙龙，演唱《为了爱》、《年年此夜》、《小河淌水》等歌曲，被美国亚特兰大奥运会组委会相中，盛情邀请韦唯代表五环中的一环——亚洲，在奥运会举办时的奥林匹克公园举办百年奥运庆典演出。1995年1月12日，美国亚特兰大奥委会召开新闻发布会，宣布中国歌手韦唯被选为亚洲代表，献唱亚特兰大奥运会。1996年5月25日，韦唯参加奥运会100周年金牌之夜演唱会欢送会在人民大会堂举行，中宣部、文化部、统战部、全国青联、国家体委等部门200多人到会祝贺韦唯。韦唯刚到美国亚特兰大，美国最大的新闻电视CNN便特派专题小组到韦唯家采访，在CNN反复播放。7月16日，《北京青年报》刊登韦唯参加奥运会100周年金牌之夜演唱会需要寻找巨大国旗的文章，不过5天时间，





国旗便送到了在美国亚特兰大的韦唯手上。8月3日，原定在美国亚特兰大奥林匹克公园剧场举办的五环音乐会作了调整，改为欧洲、非洲和亚洲三场独唱音乐会，韦唯应邀代表亚洲专场，在前两天出现了奥林匹克公园中心舞台边上发生大爆炸的不利情况下，韦唯不顾个人的安危，怀着为国争光的心愿，按期举行个人演唱会，受到6万多名观众的热烈欢迎，向世界展示了中国人民的坚强性格，为祖国赢得了良好声誉。

2007年3月北京奥运会倒计时500天晚会，韦唯作为中国唯一独唱的女歌手，压轴演唱奥运宣传歌曲《神采飞扬》。2007年5月，韦唯在巴塞罗那球队诺坎普球场完成了新歌《Go girl go》MV的上半部分录制。此歌是为9月在中国打响的女足世界杯献礼。2008年2月韦唯在央视春晚上登台，领唱为迎接2008年北京奥运会到来的体育歌曲。2008年8月15日，中国足协在昆仑饭店举行了新闻发布会，宣布由韦唯担任中国女足的形象宣传大使。2008年8月24日北京奥运闭幕式，韦唯演唱了2首歌曲，第一首是同孙楠一起演唱的《超越》，第二首是同成龙、刘德华、容祖儿、汪峰等一同演唱的《远方的客人请你留下来》。

2009年10月16日第十一届全运会开幕式演唱会歌《共圆精彩》再次由韦唯唱响，这位被广大体育迷亲切称誉为“体育歌后”的歌坛巨星总与体育有着解不开的情缘。

🔴 **全国方志期刊工作座谈会代表来临沂考察。**7月3日，中国地方志指导小组主办的2012年全国方志期刊工作座谈会在济南召开。4日，指导小组办公室处长、《中国地方志》杂志主编于伟平在省史志办公室副主任郭永生的陪同下，率全国史志系统座谈会代表共50余人来临沂市考察。市政府副秘书长秦鸿伟、市史志办主任朱海涛、总编辑王瑞柱陪同代表先后参观了银雀山汉墓竹简博物馆、临沂市城市规划展馆、书法广场和市容市貌，向代表介绍了临沂改革开放以来取得的巨大成就，汇报了市史志办在《沂蒙史志》编辑等方面的工作，受到代表们的一致好评。赵爱华副市长接见了与会代表。

🔴 **《中共临沂市委党校志(1942~2012)》正式出版。**2012年5月，《中共临沂市委党校志(1942~2012)》由山东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该志的编纂工作始于2010年6月，2011年10月进入初编阶段，2012年2月形成征求意见稿。全志设12章，另设概述、大事记、附录和编后记，共60万字。采用述、记、志、图、表、录等体裁，翔实记述了70年来中共临沂市委党校的发展历程。

🔴 **《临沂市荣军医院志(1982~2012)》通过终审。**2012年7月初，《临沂市荣军医院志(1982~2012)》志稿通过市史志办的终审。该志稿篇目设置比较科学，观点正确，内容丰富，记述语言精练。上限为1982年，下限为2012年5月。体裁以志为主，述、记、传、录、图、表综合运用。全志共8章，另设概述、大事记等。全面系统地记述了临沂市荣军医院历史与现状。

🔴 **市史志办领导到涝子峪村视察调研工作。**5月23日，市史志办党组书记、主任朱海涛带领市史志办副县级以上领导干部，到沂南县双堠镇涝子峪村看望“第一书记”工作组，慰问联系户，调研挂职帮扶工作。

🔴 **市史志办召开《沂蒙革命根据地志》初稿座谈会。**6月6日，市史志办召开《沂蒙革命根据地志》初稿座谈会。与会人员对初稿的框架结构与内容给予了肯定，并就资料补充运用、内容调整、行文规范等方面存在的问题，提出了修改意见和建议，明确了下一步工作任务。

该志书自2011年开始组织编纂，聘请了专家学者对沂蒙抗日革命根据地和沂蒙解放区的历史资料进行

挖掘、整理。经全体专家学者的共同努力，至2012年5月底，初稿基本完成，共118万字。

🔴 **《沂水县志(1991~2008)》出版。**5月，沂水县地方史志编纂委员会编纂的《沂水县志(1991~2008)》由中华书局正式出版。《沂水县志(1991~2008)》是沂水县继1997年出版首部社会主义新方志后，编纂出版的第二部县志，同时也是临沂市出版的第一部二轮志书。全志共设29编，125章，另设概述、大事记、人物、附录等，共计104万字。

🔴 **费县启动第二轮县志编修工作。**6月20日上午，费县召开第二轮县志编修工作动员会议，安排部署费县新一轮地方志编修工作。县委副书记、县长刘飞出席会议并讲话，要求全县各级各部门要提高认识，切实增强做好地方志编修工作的责任感，配备专门人员、办公场所、经费等，保障编修工作的顺利开展；要强化编写人员培训，按照求真、求精、求新、求特的要求，高质量、高水平的做好编修工作；要明确责任，强化领导，确保按时完成第二轮县志编修工作。

🔴 **《临沂市志》编修工作简报(七)。**7月3日，市史志办召开市志业务工作会议，总结前段工作，安排部署下一阶段任务。2012年1~6月，市人大常委会办公室、环保局、旅游局、宣传部、临沭县史志办、费县史志办、临沂市园林局、临沂报业集团等单位报送了市志初稿。至6月底，共有60个单位完成或基本完成市志初稿。市志编辑人员加强对已报送志稿的审查验收和编辑工作，市委老干部局、党史研究室、政务大厅的志稿初编工作基本完成，临沂市中级人民法院、市委宣传部、市委政研室、市直机关工委的志稿初编完成工作量的二分之一。会议要求各修志单位务于年内完成初稿修改总量的四分之一，并督促未完成任务的单位完成资料长编和市志初稿。